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文學批評史

二

羅根澤 著



中 華 書 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文學批評史

二

罗根澤 著



中華書局



中國文学批評史

二

罗根澤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兴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8印張・180,000字
(原古典文学版印27,000册)
1962年10月新1版
1962年10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数：501—8,300　定价：(7) 0.85元
統一書号：10018・81　57.12.原古典型

目　录

第四篇　隋唐文学批評史

第五篇　晚唐五代文学批評史

第 四 篇

隋唐文學批評史

第一章　詩的对偶及作法(上)

一　对偶說的興起

我們知道中国的詩歌是以唐代为最盛的，又知道唐代的詩歌，其古詩只是承繼，律詩与絕句詩才是那时的創造。律詩与絕句詩的創作方法，最主要的是对偶。

唐代之講求詩的对偶及其他方法，其历史之来源，自然出于周顒沈約及以后的四声八病說。在第三篇第五章第一节，我曾經說："沈約等所定的文学上的音律，分积极建設与消极避忌兩方面。积极建設的是四声，消极避忌的是八病。"四声的作用，在建設"宮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則后須切响"的詩文；八病的作用，則在破除与此相反的毛病。惟周沈以至其后的六朝时人，对消极避忌方面，已能定出具体的方法；对积极建設方面，則始終只有"若前有浮声，則后須切响"的籠統原則。直到差不多二百年以后的唐人，才发明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偶。自然我們沒有忘記六朝也有对偶說，如文心雕龙麗辭篇云："麗辭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詳三篇八章五节)但对偶說与声病說各不相侔，未能打成一体。(刘勰提倡自然的声律，对八病从未提及)至唐代才混而一之，其所謂对偶，不惟有"义"的作用，且有"声"的作用。"义"的作用是虛实自对，"声"的作用是平仄互对。

至六朝时人所以只能发明避忌的具体方法，而不能发明建設的具体方法者，以无論任何事务与学术，消极的破坏易，积极的建設难，所以在文化的轉变之前，例先有破坏，随后才有建設。我們明白了这种历史演进的路程，則六朝时人的四声八病說之只能完成消极的避忌，未能完成积极的建設，是很自然而不足奇异的了。

消极避忌一方面，其屬于"声"者，六朝时人已說得纖悉周备，所以唐人不用再来饒舌；假設饒舌，也大半是反面的冷嘲热諷——如皎然詩式詆"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而講求避忌者，則大半由"声"病，又推及"形"病、"义"病。关于这，已在第三篇第五章提前論述了。

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指导，至唐人所以順受而不逆攻者，自然是由于唐代的社会經济与政治制度。唐高祖太宗兩世，內而削平群雄，外而攘伐羌夷。据新唐書外国傳贊："北擒頡利，西灭高昌焉耆，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未有也。"社会經济由日趋稳定，而日趋繁荣。尤以貞观永徽之盛，史家至比之三代。朝廷之上，优游无事，天子群臣，詩酒倡和，其所产生的"閣台体"的詩歌，当然要句酌字斟的講明对偶及其他格律。加之以詩賦取士，詩賦为士人的唯一出路，而应試的作品，又大半考究形式，不多管內容。由是六朝所傳下来的声病說，遂在这种情形之下，成了时髦的学問；青胜于藍，不仅承受了六朝的"前有浮声，后須切响"的籠統原則，又发明了虛实自对、平仄互对的具体方法。

六朝的声病說，固重在詩（那时所謂文），亦及于文（那时所謂笔）；对偶說更是詩文并重。唐人的对偶說与病犯說則大体只限于詩，尠及于文。这是因为六朝时的詩与文，虽各有自己的途路，而文漸同于詩；唐代則詩日趋于对，文日趋于散，对偶与病

犯的巨手，自然不易伸展到文的园地了。

二　对偶及其他格律説的史料

初盛唐講对偶的格律，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講体势比兴的格律，只有中唐以提倡社会詩的緣故，对格律不甚重視。以今所知，只有几种講賦的書，如張仲素（宪宗时翰林学士）賦樞三卷，范傳正（宪宗时光祿卿）賦訣一卷，浩虛舟賦門一卷（以上見新唐書艺文志文史类），白行簡賦要一卷（見宋史艺文志文史类），紇干俞（元和中进士）賦格一卷（見宋志及崇文总目文史类、通志艺文略文史类）。另外就是白行簡制朴三卷（同上），刘蘧（不知是否中唐詩人）应求类二卷，大概是講科举文的。至講詩者，只有开晚唐五代詩格先声的姚合詩例一卷和賈島詩格一卷（見新唐志）。以上諸書，今皆散亡。至行世有賈島二南密旨一卷（詳五篇三章一节），白居易金針詩格三卷（同上三节）、文苑詩格一卷（同上四节），都是后人伪作。所以較之初盛唐的人談对偶，晚唐五代的人談詩格，相差远甚。（惟秘府論引有佚名的調声术，詳下章二节）所以初盛唐是講对偶的时代，中唐是講詩的社会使命的时代，晚唐五代以至宋初是講詩格的时代，这是我們应当首先划清楚的。

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講求詩格，俟后詳論（詳五篇二、三兩章），現在只述初盛唐的講求对偶。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东卷論对类所述有二十九种对，大半都是唐人之説。序云：

> 或曰：文詞妍丽，良由对屬之能；笔札雕通，实（疑此下夺一字）安施之巧。若言（疑夺一而字）不对，語必徒申；韵而不切，烦詞枉費。元氏云：“易曰，‘水流濕，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圣作切对之例。况乎庸才凡調，而对而不求切哉？”

余覽沈陆王元等詩格詩式等，出沒不同。今弃其同者，撰其异者，都有二十九种对，具出如后。其"賦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与此一名；或"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賦体"；或以"重字"屬"联綿对"。今者开合俱举，存彼三名。搜覽达人，莫嫌煩冗。

所称王蓋即王昌齡，元蓋即元兢（所引元氏說蓋亦即元兢說），都是唐人。至沈陆似指沈約陆厥，但沈約陆厥皆无詩格詩式書。且一則那时揣研声势，不另講对偶。二則那时以"文"名"詩"，不应以"詩格"名書。新唐志載元兢宋約詩格一卷，宋志文史类只題"元兢詩格"，无"宋約"二字。宋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別集类則有沈約詩格一卷㊀，不列六朝詩集之中，而列唐人李洞集賈島句图之后，似系后人譜的沈約詩的格律，不是沈約所作詩格。新唐志宋約詩格的"宋"字如是"沈"字之誤，則作者为元兢。以沈例陆，当亦后人所作。就是这种推测不对，无論如何，沈約陆厥不会有講对偶的詩格書；講对偶的詩格書，大概作始于唐人吧？

此序虽言及笔札，而篇中所論，实只限于詩（偶尔及于文，但极少）固然他提到"文詞"，但那是因为欲尽"对屬之能"，所以不得不以"笔札雄通"，对"文詞妍丽"耳。

二十九种对的目录上，"十二曰平对"右旁，注云："右十一种，古人同出斯对。""十八曰鄰近对"右旁，注云："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腦。""二十六曰切側对"右旁，注云："右八种出皎公詩議。""二十九曰总不对"右旁，注云："右三种出崔氏唐朝新定詩格。"合計共二十八种，其"总不对"一种，无所附丽。初疑古人同出斯对的十一种，为十二种之誤。后知不然者，十二曰平对，十三曰奇对，二者相反相成，当同出元兢髓腦，才比較合理；若以"奇对"

㊀ 文史类倘載有沈約文苑一卷。

屬元兢，以"平对"屬泛指的古人，那不惟是拆散鴛鴦譜，且恐不合事实。以故还是不自作聰明，妄事推測，讓"总不对"无所隶屬吧！

沈約陆厥旣沒有講对偶的詩格書。則所謂"古人"大半都是唐人，而元兢、皎公、崔氏，或亦在內。惟旣标为"古人同出"，則元兢、皎公、崔氏，皆不得据为私有，而其产生的时代，或者比元兢、皎公、崔氏还早些，所以他們能以承用。

三　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

十一种对的名称及解釋如下：

一、的名对——"又名正名对，又名正对，又名切对。""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上句安南，下句安北；上句安正，下句安斜；上句安远，下句安近；上句安傾，下句安正：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或曰：天地、日月、好惡、去来、輕重、浮沈、長短、进退、方圓、大小、明暗、老少、兇儜、俯仰、壯弱、往还、清濁、南北、东西：如此之类，名正对。"（引号內为秘府論原文，下同。）

我于前节說同出十一种对的古人，或者也包括元兢、皎公、崔氏，于此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証明，就是秘府論引元兢曰："正对者，若'堯年''舜日'。"且据此知名"的名对"为"正对"者，元兢就是其中的一人。

二、隔句对——"隔句对者，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且看他所举的詩例：

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蘭；今朝逾嶺易，拖笑入長安。

再看他的解釋：

第一句"昨夜"（原作昨日，疑誤）与第三句"今朝"对，"越溪"与

"逾嶺"是对；第二句"含悲"与第四句"掩类"是对，"上蘭"与"長安"对，并是事对，不是字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

此种对，后世又名为"扇对"，所以严羽滄浪詩話称"扇对"又名"隔句对"。

三、双拟对——"双拟对者，一句之中所論，假令第一字是秋，第三字亦是秋，二秋拟第二字；下句亦然：如此之类，名为双拟对。"此亦須看他的詩例及解释：

夏暑夏不衰，秋阴秋未归，炎至炎难卸，凉消凉易追。

释曰：

第一句中兩"夏"字拟一"暑"字，第二句中兩"秋"字拟一"阴"字，第三句中兩"炎"字拟一"至"字，第四句中兩"凉"字拟一"消"字：如此之法，名为双拟对。

但双拟对似乎有三种，上所述者是最普通的一种，另一种如他所举詩例：

可聞不可見，能重复能輕。

又云：

議月眉欺月，論花頰胜花。

释曰：

上陈二"月"，隔以"眉欺"；下說双"花"，櫚諸"頰胜"；文虽再讀，語必孤来，拟用双文，故生斯号。

最普通的一种是一句之中，第一第三同字，以拟第二字；此所举例，前者是第一第四同字，后者則是第二第五同字。

还有一种是他引有界說的："或曰，春树春花，秋池秋日；琴命清琴，酒追佳酒；思君念君，千处万处：如此之类，名曰双拟对。"此所列例句皆四言，未悉只以此講明何謂双拟对，抑双拟对亦可施用于"文"？社会是連鎖的，任何一种轉变，都不能自某一年代或某一时期，戛然去旧而布新。以故唐初的对偶說，当然为詩

而設，但文亦不妨偶尔采用。惟吾人若据此謂唐人的对偶説，亦同于六朝的声病説，施及一切詩文，便犯了以偶概常的錯誤了。

四、联綿对——“联綿对者，不相絕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卽名为联綿对。但上句如此，下句亦然。”所引詩例，有：

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听蟬蟬响急，思卿卿别情。

第二字第三字固是重字，但第二字上屬，第三字下屬，中間斷而复續，所以説“不相絕也”。惟“或曰：朝朝、夜夜、灼灼、菁菁、赫赫、輝輝、汪汪、落落、素素(泽案，当为索索)、蕭蕭、穆穆、堂堂、巍巍：如此之类，名联綿对。”則联綿对有兩种說法：前者是“不相絕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后者則凡重字皆曰联綿对。所以他所引詩例，还有此下一种：

霏霏斂夕雾，赫赫吐晨曦，軒軒多秀气，奕奕有光仪。

序文云，“賦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又云，“或以重字屬联綿对。”（見前节）但二十九种对中，有賦体对、双声对、叠韵对，而无重字对。盖重字对或以單为一种，或以入賦体对，“或以重字屬联綿对。”如“霏霏斂夕雾，赫赫吐晨曦”之类，实是重字对，惟以“或以重字屬联綿对”，所以联綿对遂有了兩种，而重字对遂省掉了。

五、互成对——“互成对者，天与地对，日与月对，麟与凤对，金与銀对，台与殿对，楼与榭对，兩字若上下句安，名的名对；若兩字一处用之，是名互成对，言互相成也。”詩例如下：

天地心間靜，日月眼中明，麟凤千年貴，金銀一代榮。

則所謂“天与地对，日与月对”云云者，是天与地相連自对，日与月相連自对，而又天地与日月兩句相成，所以名互成对。

六、异类对——“异类对者，上句安天，下句安山；上句安云，

下句安微；上句安鳥，下句安花；上句安风，下句安树：如此之类，名异类对；非是的名对，异同比类，故言异类对。"此对意义甚明，不必选录詩例了。

"元氏云：'异对者，若"来禽去兽，殘月初霞"，此来与去，初与殘，其类不同，名为异对。异对胜于同对。'"据此，元兢不名为"异类对"，而名为"异对"。名此为"异对"，与名"的名对"为"正对"，正相对也。

元兢謂此对"胜于同对"（同对詳五节），秘府論亦云："但解如此对，并是大才，籠罗天地，文章卓秀，才无拥滯。不問多少，所作成篇，但如此对，益詩有巧。"而于的名对則云："初学作文章，須作此对，然后学余对也。"的确"天"对"地"，"山"对"谷"的的名对是很容易的，同时也很推板的；异类对，类旣不同，又須要对，所以困难，非"大才"莫办，参錯成章，难能可貴，故覺別有风味了。

七、賦体对——"賦体对者，或句首重字，或句首叠韵，或句腹叠韵，或句首双声，或句腹双声：如此之类，名为賦体对。似賦之形体，故名賦体对。"此所言虽只五种，例所示則有九种；重字、叠韵、双声各有句首、句腹、句尾三种：

1．句首重字：裹裹树惊风，丽丽云蔽月，皎皎夜蝉鳴，朧朧曉光发。

2．句腹重字：汉月朝朝暗，胡风夜夜寒。

3．句尾重字：月蔽云丽丽，风惊树裹裹。

4．句首叠韵：徘徊四顧望，悵悢独心愁。

5．句腹叠韵：君起燕然戍，妾坐逍遙楼。

6．句尾叠韵：疎云雨滴瀝，薄雾树朦朧。

7．句首双声：留連千里宾，独待一年春。

8．句腹双声：我陟崎嶇嶺，君行嶢崅山。

9．句尾双声：妾意逐行云，君身入暮門。

釋云："上句若有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为犯病也。但依此对，名为賦体对。"

八、双声对

九、叠韵对

序文云："賦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与此一名；或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賦体；或以重字屬联綿对。今者开合俱举，存彼三名。"知重字、双声、叠韵，都是賦体的一种。有的人，"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賦体。"而秘府論則"开合俱举，存彼三名。"但既在賦体对里解释了何謂双声对与叠韵对，則虽仍以双声对与叠韵对各为一类，不过只是"存名"而已，不必再叠牀架屋的解釋。所以秘府論对此二类只有例詩与釋例，沒有界說；实則在賦体对里已經举了詩例，則这里的例詩与釋例，也可以从省了。

叠韵对下引笔札云："徘徊、窈窕、眷恋、彷徨、放暢、心襟、逍遙、意气、优游、陵胜、放曠、虛无、𩡧酌、思惟、須臾，如此之类，名曰叠韵对。"笔札作者不可考。地卷六志类下注云，"笔札略同"，亦未标作者。就論叠韵与六志（詳五篇三章）而言，大概是唐初人所作。

十、迴文对——此种亦未列界說，所举詩例如下：

情亲由得意，得意遂情亲。新情終会故，会故亦經新。

釋曰：

双"情"著于初九，兩"亲"繼于十二，又"情"头"新"尾，故还标上下之"故""新"，列字也；文施已周，迴文更用，重申文义，因以名云。

十一、意对——此亦无界說，所举詩例云：

岁暮临（版行所本作望）空房，凉风起坐隅，寝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釋曰：

“岁暮”“凉风”，非是屬对；“寝兴”“白露”，罕得相酬；事意相因，文理无爽，故曰意对耳。

則意对者，不必文字的虛实相对，只要“事意相因，文理无爽，”就成了。

四 上官儀的六种对及八种对

文鏡秘府論載有元兢、皎公、崔氏三人的对偶說，李淑的詩苑类格載有上官仪的对偶說。上官仪生于隋大业（六〇五——六一七）时，卒于唐麟德元年（六六四）。元兢字思敬，新唐志总集类芳林要覽下标注集者，有上官仪，亦有元思敬，可見与上官仪同时。但旧唐書文苑傳上載其总章时为协律郎（詳三篇五章七节），知年事較晚。皎公的生年不可知，其卒年在貞元六年或七年（七八九或七九〇，据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傳）。崔氏疑卽崔融（詳三篇五章八节），生于永徽四年（六五三），卒于神龙二年（七〇六）。四人的时代，以上官仪为最早，元兢次之，崔融又次之，皎公最晚。故今先叙上官仪的对偶說。

詩苑类格已佚，据詩人玉屑卷七引載上官仪說詩有六对：

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

三曰連珠对，“蕭蕭”“赫赫”是也。

四曰双声对，“黃槐”“柳綠”是也。

五曰叠韵对，“徬徨”“放曠”是也。

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又說詩有八对：

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

二曰异类对，"风織池間树，虫穿草上文，"是也。

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蘭，"是也。

四曰叠韵对，"放蕩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

五曰联綿对，"残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

六曰双拟对，"議月眉欺月，論花頰胜花，"是也。

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宋四庫闕書目文史类載上官仪笔花九梁二卷，六对与八对之說，当出此書，可惜亡佚已久，不然也許有更好的材料。就詩苑类格所逐录，双声、叠韻、双拟，三对重出，的名就是正名，所以实止十对。十对中的正名、双声、叠韵、双拟、异类、联綿、回文、隔句八种，与文鏡秘府論所載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相同，其所举例証，亦往往不异。如的名对下所举"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亦見于秘府論，且有釋曰：

"迎""送"詞翻，"去""来"义背，下言"西北"，上說"东南"，故曰正名也。

异类对下所举的"风織池間树，虫穿草上文，"亦見于秘府論，惟彼"树"字作"宇"字，"草"字作"叶"字。有釋曰：

"风""虫"非类，附对是同；"池""叶"殊流，而寄巧归一。或双声以酬叠韵，或双拟而对迴文，別致同詞，故云异类。

双声对下所举"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蘭，"亦見于秘府論，有釋曰：

"佳菊"双声，系之上語之尾；"丽蘭"双声，陈諸下句之末。秋朝非无白露，春日自有淸风。气侧音諧，反之不得。"好花""精酒"之徒，"妍月""奇琴"之輩：如此之类，俱曰双声。

叠韵对下所举"放蕩千般意，迁延一介心，"秘府論作："放暢千般意，逍遥一个心。"下边还有兩句："漱流还枕石，步月复彈琴。"釋曰：

"放暢"双声，陈之上句之初；"逍遥"叠韵，放諸下言之首。双道二文，其音自叠；文生再字，韵必重来。"曠望"、"徘徊"、"綢繆"、"眷恋"，例同于此，何借煩論？

联綿对下所举"殘河若帶，初月如眉，"秘府論作"殘河河似帶，初月月如眉，"且上多"嫩荷荷似頰"一句。釋曰：

兩"荷"連讀，放諸上句之中；双"月"并陈，言之下句之腹。一文再讀，二字双来，意涉連言，坐生兹号。

所謂联綿对者，本来是"不相絕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詩人玉屑所引詩苑类格，大概是每句漏掉一字。

双拟对下的"議月眉欺月，論花頰胜花，"秘府論亦举此例，已見前节，兹不再列。

迴文对所举"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秘府論作："情亲由得意，得意遂情亲，"虽有小异，实是大同。至其解釋，也詳于前节。

隔句对下的"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秘府論同，有釋曰：

兩"相"对于二"空"，隔以"沾衣"之句；"朝朝"偶于"夜夜"，越以"空歎"之言。从首至末，对屬間来，故名隔句对。

至連珠对，虽不見于秘府論，然就其所举的"蕭蕭""赫赫"的例証观之，或者卽同于賦体对的重字对，也就是或以重字解釋的联綿对。

由此知上官仪的十种对，有九种是与古人同出的对偶說相同的。由此知这些对偶說，在唐初已形成普通知識，不是上官仪一人所創造。——九种中或者不无上官仪的創造，但决不会都

是他的創造，否則秘府論应当标为上官仪說，不应标为古人所同出。上官仪的生年，远在隋文帝大业年間，則隋代是否已有对偶說，虽无从推断，而入唐之初，似卽有了对偶的詩說了。

上官仪的十种对，除上述九种外，其余一种是同类对。此在秘府論謂为元兢之說（詳六节）。元兢晚于上官仪，所以似乎应当說是作于上官仪，述于元兢；但前九种旣不一定都是上官仪的創造，則此种是否創于上官仪，也不便輕下断語了。

五　元兢的六种对

文鏡秘府論的二十九种对，其第十二至第十七，共六种，注明出"元兢髓腦"。中国史志只載有元兢詩格，无髓腦（詳三篇五章七节）。就秘府論所引看来，与他家詩格書相类，似髓腦卽詩格异名。

一、平对——"平对者，若青山綠水，此平常之对，故曰平对也。他皆放此。"

二、奇对——"奇对者，馬頰河，熊耳山；馬熊是兽名，頰耳是形名，旣非平常，是为奇对。他皆放此。""又如柒沮四塞，柒与四是数名。""又兩字各是双声对。""又如古人名，上句用曾参，下句用陈軫，参与軫者同是二十八宿名：若此者出奇而取对，故謂之奇对。他皆放此。"

唐初的一般人的意見，率以双声对独为一种，或者算为賦体对之一，元兢則認为也是奇对。的确，以"兩字各是双声对"，"旣非平常"，所以是奇对。則傳下来的确知是元兢的对偶說虽只六种，但如依一般人的見解，以双声对别为一种，則实是七种了。

三、同对——"同对者，若大谷广陵，薄云輕霧；此大与广，薄与輕，其类是同，故謂之同对。""同类对者，云霧、星月、花叶、风

烟、霜雪、酒觴、东西、南北、青黄、赤白、丹素、朱紫、宵夜、朝旦、山岳、江河、台殿、宮堂、車馬、途路。”由此知同对就是同类对，而上官仪的“花叶草芽”的同类对，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四、字对——“或曰：字对者，若桂楫荷戈，荷是負之义，以其字草名，故与桂为对。不用对，但取字为对也。或曰：字对者，謂义别字对是。”

此既注明出“元兢髓腦”，而于界說又迭引或曰，自然这也不妨是元兢原引的“或曰”，但秘府論中的“或曰”太多，似乎有出于遍照金剛的嫌疑。且側对的界說，发端卽标明“元氏曰”（詳下），以彼之絕对出于元兢，益知此不一定出于元兢。大概注明“出元兢髓腦”的六种对，其名称及定义，当然采自元兢髓腦，而解說則未必不参考他書，尤其是皎公詩議、崔氏唐朝新定詩格。同样注明“出皎公詩議”的八种对，“出崔氏唐朝新定詩格”的三种对，其情形亦当然与此相仿，也未必沒有滲入元兢及他人的解說。

我且囘来說字对吧：只就兩个或曰的界說，还不很明了，他举的詩例是：

山椒架寒霧，池篠韵涼飆。

釋云：“山椒卽山頂也，池篠傍池竹也，此义别字对。”又举例云：

何用金扉敞，終醉石崇家。

釋云：“金扉石家是。”又举例云：

原风振平楚，野雪被長菅。

釋云：“卽菅与楚为字对。”

观此三例，参彼界說，知字对并不是平常的字与字对，而是以字的别义相等，所以說“字别义对”。

五、声对——“或曰：声对者，若曉路秋霜，路是道路，与霜非对，以其与露同声故。或曰：声对者，謂字义俱别，声作对是。”

这还不甚明晰，再看他所举的例子及解說，便可徹底瞭然了：

形骝初惊路，白簡未含霜。

釋云："路是途路，声卽与露同，故將以对霜。"

六、側对——"元氏曰：側对者，若馮翊（地名，在右輔也）龙首（山名，在西京也），此为馮字半边有馬，与龙为对；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此为側对。又如泉流赤峯字，其上有白与赤为对。凡一字側耳，卽是側对，不必兩字皆須側也。以前八种切对，时人把笔綴文者多矣，而莫能識其徑路。于公义藏之于篋笥，不可弃，示于非才，深秘之，深秘之。或曰：字側对者，謂字义俱別，形体半同是。"

此对不用举例，亦可明瞭。文云："于公义藏之于篋笥，不可弃，示于非才。"則元兢的造对偶說，似得之于公义；可惜不知其人。但据此知唐初的对偶說，甚是普遍，盖已形成一种风气，造成一种潮流，所以差不多是人談对偶，家吐格律了。律詩的完成于唐初，与此当然有最大关系。自然这些对偶說所指示的格律，严之又严，細之又細，未免斲喪自然。不过假使承認律詩在文学上有地位的話，則这些对偶說的价値，亦未可一笔抹煞了。

秘府論列側对为第十七种，所謂"以前八种切对，"假如是就秘府論而言，則所指除出于元兢的六种以外，須添上古人同出的迴文对与意对。这似乎不很合理，因为不应无端的拉入古人同出的二种。故知此节是元兢髓腦的原文，而"以前八种切对"云云，是指髓腦所列的八种。然則元兢的对偶說，不只六种，而且也許不只八种。秘府論旣就沈陆王元的詩格，"弃其同者，撰其异者，"則元兢的对偶說，似乎出不了秘府論的二十九种对，而所謂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中，当然有元兢之說。不过旣与其他古人同出，

所以元兢不得專有。实則就是“出元兢髓腦”的六对，元兢也不得專有，大体是他的詩說而巳。此对下注有“崔名字側对”五字，可見“或曰：字側对者，謂字义俱别，形体半同是”，乃取之崔氏，其非元兢所專有，尤为明显。

元兢的对偶說，所进于古人同出的对偶說及上官仪的对偶說者，不惟彼較平凡，此較新奇。最不同者，从一方面言，可以說是益进于严密；从另一方面言，也可以說是轉返于寬泛。如“义别字对”的字对，“字义俱别，声作对”的声对，“字义俱别，形体半同”的側对，若故意制对，則較他对更严密，更困难；如他对不得，以此为代替的方法，則又較他对寬泛容易了。至就創对而言，古人同出的对偶說及上官仪的对偶說，都因較平凡，所以容易发現，容易創立；此則因較新奇，所以发現不易，創立亦难。就历史而言，彼是初期的对偶說，此則是中期的对偶說了。

六　崔融的三种对

我曾經疑惑作唐朝新定詩格的崔氏是崔融（詳三篇五章二、八兩节）。崔融是早于皎然的（詳四节）。今秘府論以皎然的八对列为第十八至二十五，崔氏的三对列为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假使他是依时代先后叙次的，則崔氏又似不是崔融。惟秘府論是“横”的詩文方法書，对“縱”的历史先后，不甚計較。就說論对一篇吧：所列皎公八对，都是最繁瑣的；崔氏三对，还比較齐整重要。且所有三对，都似对于元兢說的补充：故就对偶說的历史而言，也应先有崔氏說，后有皎公說。崔氏三对如下：

一、切側对——“切側对者，謂精异麁同是。”引的詩例是：

浮鐘霄响徹，飞鏡曉光斜。

釋云：“浮鐘是鐘，飞鏡是月，謂理别文同是。”理旣有别，本不能

对，惟文既相同，所以可对；不是正面相对，所以称为切側对。

二、双声側对——“双声側对者，謂字义别，双声来对是。”举詩例云：

> 花明金谷树，叶暎首山薇。

釋云：“金谷与首山字义别，同双声对。”盖切側对，理别而文同；此則字义皆别，所以能用为对者，只側取双声一点，故称为双声側对。

三、叠韵側对——“叠韵側对者，謂字义别，声名叠韵对是。”我們明白了双声側对是側取双声一点，則叠韵側对当然是側取叠韵一点。所举詩例云：

> 自得优游趣，宁知圣政隆。

釋云：“优游与圣政，义非正对，字声势叠韵。”观此，更可以明瞭了。

崔氏的对偶說，其作用与元兢的字对、声对、側对相仿，都是一面似严密，一面又似寬泛。但元兢只提出“字义俱别，形体半同”的側对，而此則益以切側对、双声側对、叠韵側对三种，显然較元兢益臻严密，益轉寬泛，其时代当在元兢以后无疑。

七 皎然的八种对

对偶說的历史，盖源于唐初，而成于元兢崔融。元崔以前，普通的对偶，已泰半次第完成，至他倆又創立許多較新奇的对偶，由是对偶說遂至登峯造极的地位。以故同时而稍后的沈佺期（？——七四一）宋之問（？——七一二），便能以完成“研練精切，稳順声势”（白居易与元九書）的律詩。但一方面益臻严密，另一方面亦轉返寬泛，由是以后的对偶說，遂益返于寬泛。这种益返寬泛的对偶說，現在可以見到的，就是秘府論所引的皎公的

八对：

一、鄰近对——詩曰：

死生今忽异，欢娛竟不同

釋云："上是义，下乃名。此对，大体似的名；的名窄，鄰近寬。"可見鄰近对，是为补救的名对的太窄而設的。

二、交絡对——賦詩曰：

出入三代，五百（原作有、誤）余載。

釋云："或曰此中余屬于載，不偶出入，古人但四字四义皆成对，故偏举以例焉。"

賦是介于詩文之間的文学，加之唐代以詩賦取士，所以詩的格律，有时移植于賦。皎然的交絡对及当句对，都举賦为例，且称之为"賦詩"，可以給我們以充分的証明了。

三、当句对——賦詩曰：

薰歇爐灭，光沈响絕。

四、含境对——詩曰：

悠远長怀，寂寥无声。

五、背体对——詩曰：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右三种皆无解釋，而观名与例，其义已明。含境对只取意境相对，眞是寬泛极了。

六、偏对——詩曰：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釋云："謂非极对也。"非极对而可对，我們可以称之为解放的对偶。又举三例云：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日月光太淸，列宿曜紫微。

亭皋木叶下，隴首秋云飞。

釋云："全其文彩，不求至切，得非作者变通之意乎！若謂今人不然，沈給事詩亦有其例。"举詩曰：

春豫过灵沼，云旗出凤城。

釋云："此例多矣，得天然語。今虽虚，亦对实，如古人以芙蓉偶楊柳。亦名声类对。"这眞是"天地自然"的对偶，也可以說是反对偶的对偶。

七、双虚实对——詩曰：

故人云雨散，空山来往疎。

釋云："此对当句义了，不同互成。"可見皎然也有互成对，不知是否与古人同出者相同？此对以"云雨"实字，对"来往"虚字，不挺板的实对实，虚对虚，也是以天然的对偶，代替人工的对偶。

八、假对——詩曰：

不献胸中策，空归海上山。

釋云："或有人以'推薦'偶'拂衣'之类是也。"此对意义不甚明晰，或者本来非对，姑且假借为对，如"推薦"那能对"拂衣"，但姑借"拂衣"为对。如此推测不錯，眞是最寬泛的对偶了。

八 總不对与首尾不对

总不对，不知作始何人，就其性質而言，当为皎然同时或稍后之作，因为虽名为对，而实在不对；充其量也是不对之对，純是晚期的对偶說。他举詩云：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釋云："此总不对之詩，如此作者，最为佳妙。"較皎公更为解放。

又秘府論在叠韵侧对后，有此下一段文字，另行書写，自非

叠韵对的解释，不知是否出于皎然？其文云：

夫为文章詩賦，皆須屬对，不得令有跛眇者。跛者，謂前句双声，后句直語，或复空談，如此之例名为跛。眇者，謂前句物色，后句人名，或前句語风空，后句山水，如此之例名为眇。何者？风与空則无形而不見，山与水則有蹤而可寻，以有形对无色，如此之例名为眇。或曰：景风心色等，可以对虛，亦可以对实。今江东文人作詩，头尾多有不对，如：俠客倦艰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关吏，鷄鳴起戍人。露鲜花劍影，月出宝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孙宾。

釋云："此卽首尾不对之詩，其有故不对者，若之。"此虽提倡对，而謂首尾可以不对。总不对是不对之对，此是首尾不对；彼是全詩的不甚澈底的解放，此是首尾的部分解放。唐代以至后世的律詩，本来是首尾可对可不对，而此便是首尾可对可不对的理論与方法了。

总前所述，对偶說的历史如下：

分期		初期	中期	晚期
时代	公元	六〇〇——六五〇	六五一——七〇〇	七〇一——八〇〇
	中历	高祖武德初至太宗貞觀末	高宗永徽初至武后長安末	中宗神龙初至德宗貞元末
作者及其对偶說		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 上官仪的十种对	元兢的六种对 崔融的三种对	皎然的八种对 不知名的总不对及首尾不对
特点		最平凡	由新奇而漸趋寬泛	最泛寬

第二章　詩的对偶及作法（下）

一　元兢的調声三术

自古人同出的十一对至不知名的首尾不对，都是"义对"；"义对"之外还有"声对"。秘府論天卷調声类引有元氏的調声三术，所举各家例証都标出姓名，惟引兢蓬洲野望詩，名而不姓，知元氏为元兢。他説"調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換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兹依次条举于下：

一、换头——举元兢蓬洲野望詩云：

飄飖宕渠城，曠望蜀門隈(泽案，疑为限之誤)。水共三巴达，山随八陣开。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烦迴。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

释云："此篇第一句头兩字平，次句头兩字去上入，次句头兩字去上入，次句头兩字平，次句头兩字又平，次句头句(泽案，句字疑衍)兩字去上入，次句头兩字又去上入，次句头兩字又平。如此輪轉，自初以(?)終篇，名为双换头，是最善也。若不可得如此，即如篇首第二字是平，下句第二字是用去上入，次句第二字又用去上入，次句第二字又用平。如此輪轉終篇，唯换第二字，其一字与下句第一字用平不妨，此亦名为换头，然不及双换。又不得句头第一字是去上入，次句头用上去入，則声不調也，可不慎歟！"

二、护腰——"护腰者，腰謂五字之中第三字也。护者，上句之腰不宜与下句之腰同声。然同去上入則不可用，平声无妨

也。"举庾信詩云:

誰言气盖代，晨起帳中歌。

釋云:"气是第三字，上句之腰也，帳亦第三字，是下句之腰，此为不調，宜护其腰，愼勿如此也。"

三、相承——"相承者，若上句五字之內去上入字則(泽案，疑为甚字之誤)多而平声极少者，則下句用三平承之。用三平之术，向上向下二途，其归道一也。"据知相承又有兩种:

(1)向上承——举謝康乐詩云:

溪壑斂瞑色，云霞收夕霏。

釋云:"上句唯有溪一字是平，四字是去上入，故下句之上用云霞收三字承之，故曰上承也。"

(2)向下承——举王中書詩云:

待君竟不至，秋鴈双双飞。

釋云:"上句唯有一字是平，四去上入，故下句末双双飞三字承之，故云平向下承也。"

换头是兩句的首二字平与上去入相对，护腰是中一字平与上去入相对，推知尾二字也应平与上去入相对，和习用的平仄譜已相差无几。但相承一术云:"若上句五字之內去上入字甚多而平声极少，則下句用三平承之，"知还沒有完成整齐的律譜；因依据整齐的律譜，不会一句中"去上入甚多而平声极少"也。

二 佚名的調声术

秘府論調声类还引有或曰:"凡四十字詩，十字一管，卽生其意，头边二十字一管亦得。六十七十百字詩，二十字一管，卽生其意。語不用合帖，須直道天眞宛媚为上。且須識一切題目义，最要立文多用其意，須令左穿右穴，不可拘檢。作語不得辛苦，

須整理其道格(原注"格，意也")，律調其言，言无相妨，以字輕重清濁間之，須穩。至如有輕重者，有輕中重，重中輕，当韵之即見。且庄(泽案，庄俗字)字全輕，霜字輕中重，瘡字重中輕，床字全重。如清字全輕，靑字全濁。詩上句第二字重中輕，不与下句第二字同声为一管，上去入声一声一管。上句平声，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下句平声；以次平声，以次又上去入；以次上去入，以次又平声。如此輕(泽案，当为輪)迴用之，宜至于尾，兩絃管上去入相近，是詩律也。"(关于輕重清濁的解釋，詳六节)

"管"的意义，不甚了了，平与上去入必須相对，則极为明显。他就五言七言，列有二律：

一、五言平头正律勢尖头

二、七言尖头律

都沒有解釋。五言平头正律勢尖头下举皇甫冉詩一首、錢起詩二首。皇甫冉詩头二句为"中司龙节貴，上客虎符新。"其声律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錢起献岁归山詩头二句为"欲知愚谷好，久別与春还。"其声律为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又五言絕句詩头二句为"胡风迎馬首，汉月送娥眉。"其声律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三詩的头二句都正正經經的平与上去入相对。七言尖头律下举皇甫冉二詩，第一首的头二句为"閑看秋水心无染，高卧寒林手自栽。"其声律为平平(看亦有仄声)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第二首的头二句为"自哂鄙夫多野性，貧居数亩半临淄。"其声律为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二詩的头二句都非正正經經的平与上去入相对。然則平头正律或是头二句就須正正經經的平与上去入相对，尖头律头二句还可模糊一点，正同于义对的可以首尾不对，也未可知。果眞如此，則五言平头正律下的"勢尖头"三字当是衍文或注文。大

概佚名的原文，五言平头正律以外，还列有五言尖头律，七言尖头律以外，还列有七言平头正律，遍照金剛为了減省篇幅，参錯的徵列二种，注明还有二种，故于五言平头正律之下，塡写“势尖头”三字耳。（势字仍疑有誤）

二律以外，还有“齐梁調詩”一种，所举例詩为張謂題故人別业詩和何遜伤徐主簿，都是近似律詩的。

作者不可考，据引及大历十才子的錢起詩，知不能前于大历；遍照金剛卒于太和九年（八三五），知不能后于太和；虽姓名失傳，而年代蓋当中唐。

三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

“义对”“声对”都是詩的字句方法，目的是在追求詩句的工整秀丽，由是有“秀句”的編集。新旧唐書俱載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詳三篇五章七节），宋史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俱載僧元鑒續古今詩人秀句二卷。可惜二書全亡，无由稽覽。皎然詩式云，“疇昔国朝协律郎吳兢，与僧元鉴集秀句，”知續古今詩人秀句係吳兢和僧元鉴合撰。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类引有或曰的論秀句一文，疑是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因为这一类的材料太少，全录如下：

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与刘孝綽等撰集文选，自謂毕乎天地，悬諸日月，然于取捨，非无舛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論之。至如王中書“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則使气飞动，后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艺之眉目，弃而不紀，未見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丘迟抄集，略而无当。此乃詳擇全文，勒成一部者，比夫秀句，措意异焉。似秀句者，抑有其例。皇朝学士褚亮，貞观中奉勅与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为一卷。至如

王粲"灞岸",陆机尸卿,潘岳悼亡,徐干室思,并有巧句,互称奇作,咸所不录。他皆效此,难以胜言。借如謝吏部冬序羈怀,褚乃选其"风草不留霜,冰池共明口"(泽案,集作"冰池共如月"),遺其"寒灯耻宵夢,淸鏡悲曉髮。"若悟此旨,而言于文,每思"寒灯耻宵夢",令人中夜安寢,不覺惊魂;若見"淸鏡悲曉髮",每暑口鬱陶,不覺霜雪入鬢。而乃捨此取彼,而(泽案,疑为亦)不通之甚哉?褚公文章之士也,虽未連衡兩謝,实所結駟二虞,岂于此篇,咫尺千里?良以箕毕(泽案,疑为筆)殊好,风雨异宜者耳。余以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軍,与文学刘袆之、典籤范履冰,書(泽案,疑为屬)东閤已建,斯(泽案,疑为思)竟撰成此录。王家書旣多缺,私室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从,果諧宿志。常与諸学士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詮其秀句,諸人咸以謝"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为最。余曰:諸君之議非也。何則?"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誠为得也,抑絕唱也。夫夕望者莫不鎔想烟霞,鍊情林岫,然后暢其淸調,发以綺詞,俯行树之远阴,瞰云霞之异色,中人以下,偶可得之;但未若"落日飞鳥还,忧来不可极"之妙者也。观夫"落日飞鳥还,忧来不可极,"謂捫心罕屬,而举目增思,結意惟人,而緣情寄鳥,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則忧共飞来,美哉玄暉,何思之若是也!諸君所言,窃所未取。于是咸服,恣余所詳。余于是以情緒为先,其(泽案,其疑为直之衍誤)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綺錯为末,助之以質气,潤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詞調双举,有一于此,罔或于遺。时历十代,又將四百,自古詩为始,至上官仪为定,刊定已詳,繕写斯毕,实欲傳之好事,冀(泽案,疑脫一字)知音,若斯若斯,而已而已矣。

所以知是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者:元兢总章中为协律郎(詳三篇五章七节),此言自龙朔元年(六六一),历十年未終兩卷,龙朔总章都是高宗年号,时代恰相値,一也。詩人秀句二卷,此亦言兩卷,二也。元書以外,集秀句者惟有僧元鑒和吳兢的續古今詩人

秀句二卷，彼續元書，应当言及元書，今未言及，知非彼書，而为元書，三也。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序云："貧道幼就表舅，頗学藻丽；長入西秦，粗听余論。……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异同，卷軸虽多，要樞則少，名异义同，繁穢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單号。"知他只是削"复"存"單"，有"述"无"作"。并且他的"述"是不好标注来源的，天卷中的四声論，是刘善經的四声指归(詳三篇四章九节)；西卷中的文笔十病得失，是佚名的文笔考(詳三篇五章九节)；与此文同列南卷論文意类的陆机文賦、殷璠河嶽英灵集序，有的还冠以"或曰"二字，有的連"或曰"二字也沒有。以彼例此，当然也是抄的，不是作的；既是抄的，当然以元兢書序的可能性最大，四也。

文中言褚高曾于"貞观中，奉敕与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为一卷，"知"似秀句者"，还有这样一書，新旧唐志不載，知早已亡佚。玉海卷五十四載瑤山玉彩五百卷，注云："龙朔元年，命宾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师、中書侍郎上官仪、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采摘古今文章英詞丽句，以类相从，号瑤山玉彩，凡五百篇。"其采摘的标准也是"英詞丽句"。不过既云"凡五百篇"，則所采摘的或者是全篇，不是零句。至秀句集的作用，或者如秘府論同卷同类下所引王昌齡的話云："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处，以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須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四　李嶠評詩格

"义对""声对"是字句方法，字句方法外还有篇章方法。講篇章方法的，以今所知，有李嶠的評詩格、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議和詩式。自然这些書也講及字句方法，但以篇章方法为主，

不似“义对”“声对”的只講字句的对偶。

李嶠（六四四——七一三）的評詩格，有蔡傳的吟窗杂录、胡文煥的詩法統宗、顧龙振的詩学指南三种本。四庫提要斥为伪書（卷一九七，詩文評类存目，吟窗杂录下），但皆引見秘府論，知恐非伪書；就是伪書，也是唐人伪作。

首言詩有九对：一曰切对，即正名对，秘府論列于古人同出十一对。二曰切側对，秘府論列于崔氏三对。三曰字对，四曰字側对，秘府論列于元兢六对。五曰声对，釋云：“謂字义别，声名对也。”似为七曰双声側对之衍誤。一則“字义别，声名对，”正是双声側对。二則所列各对都是在某种对之后，繼以某种側对，不应多出声对一种。六曰双声对，八曰叠韵对，秘府論列于古人同出十一对。七曰双声側对，九曰叠韵側对，秘府論列于崔氏三对。

又云詩有十体，和秘府論地卷的十体类大致相同：

一、形似（秘府論有体字，下九种同）——“謂貌其形而得其似也。”（秘府論尙有“可以妙求，难以麁測”二句）

二、質气——“謂有質骨而依其气也。”（“依其”秘府論作“作志”）

三、情理——“謂叙情以入理致也。”（秘府論“叙”作“抒”）

四、直置——“謂直書其事可置于句也。”（秘府論作“謂直書其事置之于句者”）

五、雕藻——“謂以凡目前事而雕妍之也。”（秘府論作“謂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妍丽”。）

六、影帶（秘府論“影”作“映”）——“謂以事意相愜而用之也”。（秘府論同）

七、宛轉——“謂屈曲其詞，宛轉成句也。”（秘府論同）

八、飞动——釋缺。(秘府論作"詞若飞騰而动"。又秘府論七、八互易)

九、清切——釋缺。(秘府論作"詞淸而切者")

十、精华——釋缺。(秘府論作"謂得其精而忘其麁者")

五　王昌齡詩格一——十七勢

新唐書艺文志文史类載王昌齡詩格二卷，至陈振孙直齋書录解題卽改載为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斥为伪書。但秘府論地卷論体勢类的十七勢，南卷論文意类最前所引或曰四十余則，皆疑为眞本王昌齡詩格的殘存。

十七勢发端卽称"王氏論文云:'詩有学古今勢十七种，具出如后。'"知十七勢的作者姓王。遍照金剛以前的硏究詩格詩勢而姓王的，只有王昌齡一人。宋史艺文志載有王維詩格一卷，不見新旧唐志，疑出后人伪作。篇中引及王維詩，也引及王昌齡詩，对王維則姓名全举，对王昌齡則名而不姓，知作者是王昌齡，不是王維。

他的十七勢，可分为七組:

第一組——第一直把入作勢，第二都商量入作勢，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勢，第四直树二句第三句入作勢，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勢，第六比兴入作勢，可以归为一組，都是講明詩之如何入作的。他所謂"入作"，就是鍾嶸所謂"发端"，指一首詩之起始数語而言。他以为入作的方法有四种。一是直把入作勢，二是都商量入作勢，三是直树几句入作勢，四是比兴入作勢。直树几句入作勢，又分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勢，直树二句第三句入作勢，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勢三种。

1."直把入作勢，若賦得一物，或自登山临水，有閑情作，或

送别，但以题目为定，依所定题目，入头便直把是也。”盖与賦比兴的賦体差不多，就是直接叙起的方法。

2.“都商量入作势者，每詠一物，或賦贈答寄人，皆以入头兩句平商量其道理，第三、第四、第五句入作势，”就是用泛論引起的方法。

3.直树几句入作势，如“直树一句者，題目外直树一句景物当时者，第二句始言題目意是也。”直树兩句第三句入作势，与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可以类推。此种方法，以今語释之，就是以写景襯起。他認为此种方法，直树一句至三句都可，再多便不好了；“亦有第四、第五句直树景物，后入其意，然恐爛不佳也。”

4.“比兴入作势者，遇物如本立文之意，便直树兩三句物，然后以本意入作比兴是也。”此所謂“物”，与直树几句入作势所謂“景物”之“物”，其作用微有不同；彼可任意的描写当时的景物，此則須“物如本立文之意”，故与賦比兴的比体相像。原始的賦比兴，是質量不同的三种作詩方法，但后人往往仅以量的差别分析比与兴，由是比与兴沒有多大的区分，而王昌齡遂以比兴同为一种方法了。

第二組——第七諷比势与第九感兴势，可归为一組，都是講明詩之含蓄的作法的。第一組所講明的入作的方法虽不同，而最后都要鮮明的說出題意，就是比兴入作势，发端虽是“遇物如本立文之意，便直树兩三句物，”而最后仍須“以本意入作”。此諷比势与感兴势，則始終仅是暗示題意，而不明言題意。

1.“諷比势者，言今詞人不悟有作者意依古势。”此釋恐有脫誤，意不明瞭。他举他的送李邕之秦詩云：

別怨秦楚深，江中秋云起。天長夢无隔，月映在寒水。

前二句下注云:"言别怨与秦楚之深远也。别怨起自楚地，既别之后,恐長不見，或偶然而会，以此不定，如云起上騰于青冥，从风飄蕩，不可复归其起处，或偶然而归尔。"后二句下注云:"虽天長(文笔眼心抄作天虽長),其夢不隔，夜中夢見，疑由相会,有如别,忽覺,乃各一方,互不相見。如月影在水,至曙,水月亦了不見矣。"則譴比势是借外物映写內心的方法；內心的意思,不肯直說,由是譴出而借外物比說。

2."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說,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則这种感兴是由內及外的心灵感兴，而不是由外及內的景物感兴。所以他举常建詩云:"泠泠七絃遍,万木澄幽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极言感物的力量之大。

第三組——第十含思落句势与第十七心期落句势，可归为一組。第一組是講明一首詩之如何入作的，此組則是講明一首詩之如何落句的。

1."含思落句势者,每至落句,常須含蓄,不令語尽思穷。或深意堪愁,不可具說,卽上句为意語，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愜便道。仍須意出成感人始好。"前者是普通所謂含蓄不尽;后者大概是以景物的狀态，象征詩主的心情。所以他举自己的送别詩云:"醉后不能語,乡山雨雰雰,"便是以"乡山雨雰雰",象征醉后的样子。

2"心期落句势者,心有所期也。"他举自己的詩云:

青桂花未吐,江中独鳴琴。

注云:"言青桃花吐之时期得相見；花既未吐,卽未相見,所以江中独鳴琴。"合而观之,便可瞭然矣。

第四組——第八下句拂上句势与第十一相分明势，可以归为一組,都是講明一联兩句之相互关系的。

1."下句拂上句势者，上句説意不快，以下句势拂之，令意通。"例引古詩云：

夜聞木落叶，疑是洞庭秋。

則下句拂上句势，是上句故留未尽之意，以下句补足之。

2."相分明势者，凡作語皆須令意出，一覽其文，至于景象，恍然有如目击。若上句説事未出，以下句助之，令分明出其意也。"关于前者，例引李湛詩云：

云归石壁尽，月照霜林清。

关于后者，例引崔曙詩云：

田家收已尽，蒼蒼为白茅。

前者一联兩句虽互相关照，而語意各明；后者則非合而观之，其意不显。前者与下句拂上句势相差較远；后者則几于相同，不过下句拂上句势故意以下句拂上句，此則以下句补明上句的意思而已。

第五組——第十四生煞迴薄势独为一組，是講明詩意之前后拂救的。

"生煞迴薄势者，前説意悲凉，后以推命破之，前説世路矜騁榮寵，后以至空之理破之入道，是也。"据此，知其作用与下句拂上句势有相同者，都是前后相拂相救；惟彼所以明句意，此所以見作意，彼仅求句之显豁，此則在拂救詩意不使太偏耳。

第六組——第十二一句中分势与第十三一句直比势，可以为一組，都是講明句法的。

1."一句中分势者，海靜月色眞。"

2."一句直比势者，相思河水流。"

王氏对此二势，皆以例代释。就例观之，一句中分势者，大概是一句中上半与下半分写，如"海靜"为一种景象，"月色眞"又为一

种景象；惟二者当然要有联属关系，惟其"海静"，所以"月色真"。一句直比势者，大概是句内自为比况，如以"河水流"比况"相思"。

第七組——第十五理入景势与第十六景入理势，可归为一組，都是講明景与理的相互关系的。

1."理入景势者，詩不可一向把理，皆須入景，語始清味。理欲（泽案，疑当作語）入景势，皆須引理語入地及居处所在，便論之。其景与理不相愜，理通无味。"

2."景入理势者，詩一向言意，則不淸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須景与意相兼始好。凡景語入理語，皆須相愜，当收意，紧不可正言，景語势收之便論，理語无相管攝。方今人皆不作，意愼之。"

二者合而观之，知王氏的意思，大概謂只是說理，或只是写景，都不算好詩；"事須与景相兼始好"。惟引理入景，須与景相愜；写景入理，亦須与理相愜。否則"景与理不相愜，理通无味"，景好也不是佳作。

六　王昌齡詩格二——格律論

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类引或曰右旁，注有"王氏論文云"五字，十七势中有生煞迴薄势，此亦云："夫詩有生煞迴薄，以象四时，"故知作者亦为王昌齡。又云："古人格高，一句見意，則'股肱良哉'，是也。其次兩句見意，則'关关雎鳩，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詩四句見意，則'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远行客，'是也。"又見詩中密旨，知密旨假中有眞，而此之出于王昌齡詩格，也益有佐証了。

这里所討論的主題是"意"和"声"，故云：

凡作詩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則格高，声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調。用意于古人之上，則天地之境，洞为可观。

十七势也常說到意，但側重意的表現方法，此則側重意的搜求方法。如云：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須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則便來，來即作文；如其境思不來，不可作。

又云：

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詞，精練意魄。所作詞句，莫用古語及今爛字旧意。改他旧語，似頭換尾，如此之人，終不長进，为无自性，不能專心苦思，致見不成。

又云：

凡詩立意皆傑起險作，傍若无人，不須怖惧。古詩云："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及"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是也。

知其对于立意主冥搜苦探，力求新奇。至于声則主張辨析清濁。如云：

凡文章体例，不解清濁規矩，造次不得□□，□□不依此法，縱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

調清濁的要点，一在詩句，二在詩韵。如云：

夫用字有数般，有輕有重，有（泽案，有字原无，依上下文义校增）重中輕，有輕中重，有虽重濁可用者，有輕清不可用者，事須細律之。若用重字，即以輕字拂之便快也。夫文章以第一字与第五字須輕清即穩也；其中三字，縱重濁亦无妨。如"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若五字并輕，規脫略无所止泊处；若五字并重，則文章暗濁；事須輕重相間，仍須以声律之。如"明月照积雪"，則"月""雪"相撥；及"罗衣何飄颻"，則"罗""何"相撥，是也。

这是詩句的調清濁法。又云：

今世間之人，或識清而不知濁，或識濁而不知清。若以清为韵，余尽須用清；若以濁为韵，余尽須用濁；若清濁相和，名为落韵。

这是詩韵的調清濁法。詩句的調清濁法，言及輕重，但以"輕清"与"重濁"对举，知輕重仍是清濁，輕中重为次清，重中輕为次濁。所举"明月照积雪"的"月""雪"二字，据广韵，月、魚厥切（卷五，十月），屬疑紐，韵鏡列为次濁；雪、相絕切（卷五，十七薛），屬心紐，韵鏡列为全清，确是清濁相撥。所举"罗衣何飄颻"的"罗""何"二字，罗、魯何切（卷二，七歌），屬来紐，韵鏡列为次濁；何、胡歌切（同上），屬匣紐，韵鏡列为全濁，并非清濁相撥，不知是否由于王的讀音与广韵不同，或分清濁与韵鏡不同。

第二节所述佚名的声調术，也論到輕重清濁，謂"莊字全輕，霜字輕中重，瘡字重中輕，床字全重。又如清字全輕，青字全濁。"莊字注側羊反，霜注色莊反，瘡注初良反，床注士莊反，与广韵全同。据韵鏡，莊照紐全清，霜审紐全清，床透紐次清，瘡穿紐次清，除莊外，都不合。清、广韵七情切（十四清），青、仓經切（十五青），韵鏡皆清紐次清，亦不合，不知何故。

文中也論及对偶。如云："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卽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故梁朝湘东王詩評曰：'作詩不对，本是孔（泽案，疑为札）文，不名为詩。'"

不过虽講清濁，但仍以意为主，故云："詩有意好言真，光今絕古，卽須書之于紙，不論对与不对，但用意方便，言語穩，卽用之。若語势者有对，言复安穩，益当为善。"

七 王昌齡詩格三——今本詩格及詩中密旨

今本詩格中有起首入兴体十四，一曰感兴入兴，二曰引古入

兴，三曰犯势入兴，四曰先衣帶后叙事入兴，五曰先叙事后衣帶入兴，六曰叙事入兴，七曰直入比兴，八曰直入兴，九曰托兴入兴，十曰把情入兴，十一曰把声入兴，十二曰景物入兴，十三曰景物兼意入兴，十四曰怨調入兴。又有常用体十四，一曰藏鋒体，二曰曲存体，三曰立节体，四曰褒貶体，五曰賦体，六曰問益体，七曰象外体，八曰象外比体，九曰理入景体，十曰景入理体，十一曰紧体，十二曰因小用大体，十三曰詩辨体，十四曰一四团句体。和十七势頗有同者，知伪中有眞。

至密旨的伪中有眞，已詳前节。又中有詩六病例，一曰齟齬病，二曰長擷腰病，三曰長解鐙病，四曰叢杂病，五曰形迹病，六曰反語病，皆見秘府論西卷論病类(詳三篇五章二节)。又有犯病八格，一曰支离病，二曰缺偶病，見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类，已詳前节。又見西卷論病类，詳第三篇第五章第二节。三曰落节病，四曰叢木病，五曰相反病，六曰相重病，亦見秘府論西卷論病类，亦詳第三篇第五章第二节。七曰側对病，釋云："凡詩字体全別，其义相背"知就是側对。八曰声对病，釋云："字义全別，借声类对，"知就是双声側对。皆見秘府論东卷論对类，詳本篇第一章第五、六兩节。不过秘府論引为元兢崔融說，認为是一种对偶方法而提倡之，此認为是一种病犯而反对之罢了。

又說詩有九格，俱見秘府論地卷十四例类，惟彼多此少，恐此有殘缺，兹校列于左：

一曰重叠用事格——举詩曰："淨宮連博(原作薄，据秘府論校改)望，香刹对承华。"秘府論同，釋云："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之。"

二曰上句立兴下句是意格——举詩曰："明月照高楼(原作台，据秘府論校改)，流光正徘徊。"秘府論为第三，作"立兴以意

成之例”。

三曰上句立兴下句是比格——举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远行客。”秘府論为第四，作“立双兴以意成之例”。

四曰上句体物下句狀成格——举詩曰:“朔风吹飞雪(秘府論作雨)，蕭条江上来。”秘府論为第七。

五曰上句体时下句狀成格——举詩曰:“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淸輝。”秘府論为第八。

六曰上句体事下句意成格——举詩曰:“虽无玄豹姿，終隐南山霧。”秘府論为第九。

七曰句中比物成語意格——举詩曰:“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秘府論为第十一，作“立比成之例”。

八曰句中叠語格——举詩曰:“旣为风所开，还为风所落。”秘府論为第十三，作“叠語之例”。

九曰句中輕重錯繆格——举詩曰:“天子忧征伐，黎民常自怡。”秘府論为第十四，无“句中”二字，例詩缺。

秘府論所多五例为:二、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之例；五、上句古，下句以即事偶之例；六、上句意，下句以意成之例；十、当句以物色成之例；十二、复意之例。虽秘府論未注明引自王昌齡詩格，但一則秘府論本来大半采自中国書，又大半不注出处；二則秘府論在中国旧无流傳，当然系彼鈔此，非此鈔彼；而密旨的伪中有眞，又可得到証明了。

詩格中除二十八体外，还有物境、情境、意境三境，生思、感思、取思三思，言志、劝勉、引古、含思、歎美、抱比、怨調七落句体，立意、有以、兴寄三宗旨，高格、古雅、閑逸、幽深、神仙五趣向，好勢、通勢、爛勢三語勢，勢对、疎对、意对、句对、偏对五对

例，淵雅、不難、不辛、飽腹、用事、一管六式，傑起、直意、穿穴、挽打、出意、心意六例，用事不如用字、用字不如用形、用形不如用气、用气不如用势、用势不如用神五用。密旨除上述外、还有高、下二格；得趣、得理、得势三格，因为眞伪莫辨，姑列其名，不举其釋。

八 皎 然 詩 議

新唐志文史类載皎然詩式五卷，詩評三卷，詩式俟下节論次，兹先述詩評。新唐志和通志艺文略都作三卷，宋四庫闕書目別集类和宋志文史类都作一卷，陈录文史类无詩評，卻有詩議一卷，秘府論也引及詩議，評議义近，盖即一書。吟窗杂录、詩法統宗及詩学指南都收有詩議一卷，指南还另外有評論一卷。

詩議中有八种对，和秘府論所引符合，可知并非伪書。又"詩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一条，也引見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类，但只标为或曰，兩相校覈，此略彼詳，可証秘府論此段系引自詩議，又可証今本詩議，已有殘缺。

至評論一卷，是后人割裂詩議詩式湊成的。第一条云：

>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者，病于丽（秘府論作儷，下同）詞。予曰：不然。先正詩人，时有丽詞。"云从龙，风从虎，"非丽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丽邪？但古人后于語，先于意。

第二条云：

> 或曰：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于天眞。此甚不然。固当繹慮于險中，采奇于象外，狀飞动之趣，写眞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驪龙之頷，況通幽名变之文哉？

第三条云：

古人云：具体惟子建仲宣，偏善則太冲公干，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鮮能兼通，況当齐梁之后，正声寖微，人不逮古，振頹波者，或有賢于今論矣。

都見秘府論，和引自詩議者相連屬，知原出詩議。后面还有几条，又都見五卷全本詩式。所以知評論是割裂詩議詩式湊成的，今仍拆还詩議詩式。

詩議詩式都是皎然所作，相通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論其差别，則詩議偏于評議格律，詩式偏于提示品式。

詩議中的八对，已詳前章第七节。此外还有六格，实即六对：一曰的名对，二曰双拟对，三曰隔句对，四曰联綿对，五曰互成对，六曰异类对（見今本詩議），秘府論列于古人同出的十对。皎然的对偶說是一种修正論，所以一方面詮解极平常的六对，一方面創造极寬泛的八对，另一方面又反对律家的拘泥对偶云：

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必不得已，則削其俗巧与其一体。一体者，不明詩对（秘府論不上有田字，詩議对上有体字），未皆大通（詩議作未阶大道）。若国风雅頌之中，非一手作，或有暗同，不在此也。……夫累对成章，高手有互变之势，列篇相望，殊狀更多，若句句同区，篇篇共轍，名为貫魚之手，非变之才也（数句詩議缺）。俗巧者，由不辨正气，习俗师弱弊之过也（詩議作"习弱师弊之道也"）。……夫境象不一，虛实难明，有可覩而不可取，景也；可聞而不可見，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貫众象，而无定質，色也。凡此等，可以对（詩議作偶，下同）虛，亦可以对实。（今本詩議，又秘府論）

又指摘詩对詩詞的俗卑云：

至如渡头浦口，水面波心，俗对也；上句青，下句綠，上句爱，下句憐，下对也；句中多著映帶傍伴等語，熟字也；制錦一同，仙府黃

綫、熟名也；淡濛水堺（？ ）山脊山肋，俗名也。（秘府論）

可是旁人攻击儷詞，他又不以为然，前引为儷詞辨护的一条，秘府論所引，在“先于意”下，还有“意因成語，語不使意，偶对則对，偶散則散，若力为之，則見斤斧之跡。故有对不失渾成，縱散不关造化，此名手也”数句。提倡自然对，反对造作对的意思，尤为显明。

提倡自然对，并不是听任自然，而是追求自然，所以反对“詩不要苦思”，却希望“成章以后有易，貌若不思而得也”（秘府論）。还有作詩的目的是抒情意，所以謂“后于語，先于意。”又云：

古今詩人，多称丽句，关意为上，反此为下。（秘府論）

又云：

夫詩工創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經，然后清音韵其風律，丽句增其文彩，如揚林积翠之下，翹楚幽花，时时間发，乃知斯文，味益深矣。（同上）

所以是重意而不輕詞的詩論。

九 皎 然 詩 式

詩式各本只殘余一卷，惟陆心源輯十万卷叢書二編本还为五卷。盧文弨跋云：“此書世有鐫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备者，从兩汉及唐詩人名篇丽句摘而录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体，此所以謂之式也。若世間本則虛張其目而已，岂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五格是反用事的：

不用事第一，

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

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貶居第三），

有事无事第四(此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

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无事可知也)。

十九体所括示的是詩之外彰的风律及內蘊的体德:

高(風韵切暢曰高),

逸(体格閑放曰逸),

貞(放詞正直曰貞),

忠(临危不变曰忠),

节(持节不改曰节),

志(立志不改曰志),

气(風情耿耿曰气),

情(緣情不尽曰情),

思(气多含蓄曰思),

德(詞温而正曰德),

誡(檢束防閑曰誡),

閑(性情疏野曰閑),

达(心迹曠誕曰达),

悲(伤甚曰悲),

怨(詞理悽切曰怨),

意(立言曰意),

力(体裁勁健曰力),

靜(非如松風不动,林狖未鳴,乃謂意中之靜),

远(非謂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謂意中之远)。

而皎然所最推崇者,則是"高"与"逸"兩种,不惟以"高"与"逸"列十九字之首,且序言云:

夫詩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則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举体便逸。

又明势条云: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覿三湘鄢郢之盛,縈回盤礴,千变万态;或

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屬；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狀：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

此外他又謂詩有三格四品。跌宕格二品：

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鶴临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

二曰駭俗。其道如楚有接狂，魯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內藏达人之度。

漏沒格一品：

曰淡俗。此道如夏姬当壚，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虽俗而正。

調笑格一品：

曰戏俗。……此一品非雅作，足为談笑之資矣。

最上的跌宕格的越俗品是"貌逸神王"，也是在提倡"逸"。

"高""逸"的方法，有四不：

气高而不怒，怒則失于風流；力动而不露，露則偏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則蹶于拙鈍；才贍而不疏，疏則損于筋脉。

有四深（詩人玉屑卷五引同，他本作源，下同）：

气象氤氳，由深于体势；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

有二要：

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气足而不怒張。

有二廢：

虽欲廢巧尙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廢詞尙意，而典麗不得遺。

有四离：

虽期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經史，而离书生；虽尙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輕浮。

有六迷：

以虛誕而为高古，以緩漫而为冲澹，以錯用意而为独善，以詭怪而为新奇，以爛熟而为隱約，以气少力弱而为容易。

有七至（原作六至，据吟窗杂录、詩法統宗、詩学指南各本及詩人玉屑引校改）：

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跡，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狀易。（第七至原无，据詩法統宗諸書校增）

有七德（一作得）：

一識理，二高古，三典麗，四風流，五精神，六質干，七体裁。

大体都是"叩其兩端"，希望"恰到好处"，也就是普通所謂"慘淡經营，出之自然。"詩式总序云：

夫詩者众妙之华实，六經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淵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局須难，虽取由我里，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眞挺拔之句，与造化爭衡，可以意会，难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今从兩汉已降，至于我唐，名篇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並見全唐文卷九一七）

可見他的教人"坐致天机"，是要"放意須險，定局須难"的。取境条云：

"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須至难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靜神王，佳句縱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此种言論，亦略見于前节所引的詩議，据知他的詩法是：取境时要險难，成篇后要自然。这样，詩的风格才能"高""逸"。

为什么皎然独提倡"高""逸"，大概由于他是方外僧人，性耽禪悅。詩式中序云：

貞元初，余与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諠喧，非禪者之意，……岂若孤松片云，禪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峯，与松云为侶，所著詩式及諸文字，并寢而不紀。至壬申夏

五月，会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負謳遇恩，再移为湖州長史，初与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請益焉。……他日言及詩式，余具陈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簡出草本一覽。……公欣然因請吳生相与編录，有不當者公乃点而竄之，不使瑯玕与碔砆齐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观矣。（兼見全唐文卷九一七）

可見他的志趣在“禪者之意”，为他編录点竄的李公洪也“精于佛理”。“禪者之意”的应用于詩，当然是“高”“逸”。文章宗旨条云：

康乐公早岁能文，性穎神徹，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嘗与諸公論康乐为文，眞于性情，尙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庆云从風，舒卷万狀，詩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声諧？

更鮮明的謂詩的格高由于“通內典”，得助于“空王之道”；則“通內典”，得助于“空王之道”的皎然，当然提倡“高”“逸”的詩了。

十　佚名的詩文作法

我在前章第一节云：“唐人的对偶說与病犯說大体只限于詩，尠及于文。”“尠及于文”，不是“不及于文”，皎然的对偶說已举及賦例（前章第七节）。此外，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类云：

假令一对之語，四句而成，便用四言以居其平，其余二句，杂用五言六言等。或經一对兩对已后，仍須全用四言。旣用四言，又更施其杂体（杂原作雖，盖形誤也），循环反复，务归通利。

显然指騈文而言，非指律詩而言。秘府論引于皎然詩議之后、殷璠河嶽英灵集敍之前，共有三則，审其文义，似是一人所作，可惜作者姓名，已无从考証。第一則謂文章有六体云：

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門；人心不同，文体各异。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淸典焉，有綺艳焉，有宏壯焉，有要約焉，有切至焉。夫模範經誥，褒述功业，淵乎不測，洋哉有閑，博雅之体也。敷演情志，宣照德音，植义必明，結言唯正，淸典之致也。体其淑姿，因其壯观，文章交映，光彩傍发，綺艳之則也。魁張奇緯，闡□□灵，使气凌人，揚声駭物，宏壯之道也。指□□心，断辞趣理，微而能显，少而斯洽，要約之旨也。舒陈哀憤，献納約戒，言唯折中，情必曲尽，切至之工也。至于称博雅則頌論为其标，語淸典則銘讚居其极，陈綺艳則詩賦表其华，□宏壯則詔檄振其响，論要約則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則箴誄得其实。凡斯六义，文章之通义焉。苟非其宜，失之远矣。博雅之失也緩，淸典之失也輕，綺艳之失也淫，宏壯之失也誕，要約之失也闌，切至之失也直。体大义疏，□□声滞，緩之致焉。理入于浮，言失于淺，輕之起焉。体貌違方，逞欲过度，淫以兴焉。制伤迂闊，辞多詭异，誕則成焉。情不申明，事有遺（原作貴，誤）漏，闌因見焉。体高專□，文好指斥，直乃行焉。故詞之作也，先者文之本体，（原註"謂上所陈文章六种，是其本体也。"正文本原作大）随而用心，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辞成鍊覈，动合規矩。而近代作者，好尙互舛，苟多一涂，守而不易，至今摛章綴翰者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体制之未該也。

这是在講文体，同时也是在講作法，所以說"至今摛章綴翰者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体制之未該也。"的确必先瞭解文体，然后才能講論方法，因为方法是因体制宜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第三則云：

凡制于文，先布其位，犹夫行陈之有次，阶梯之有依也。先者，將作之文，体有大小；又者，所为之事，理或多少。体大而理多者，定制宜弘；体小而理少者，置辞必局。須以此义，用意准之，随所作文，量为定限；既已定限，次乃分位；位之所据，义别为科；众义相因，厥

功乃就。故須以心揆事，以事配辞，总取一篇之理，析成众科之义。其为用也，有四术焉：一者分理务周，二者叙事以次，三者义須相接，四者势必相依。理失周則繁約互殊，事非次則先后成乱，义不相接則文体中絕，势不相依則諷讀为阻。若斯者，文章所尤忌也。故自于首句，迄于終篇，科位虽分，文体終合，理貴于圓备，言資于顺序，使上下符契，先后弥縫，擇言者不覺其孤，寻理者不見其隙，始其宏耳。又文之大者，藉外而申之；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申之則繁，合之則約。善申者虽繁不得而减；善合者虽約不可而增。合而遺其理，疏穢之起，实在于兹。皆在于义得理通，理相惬故也。（此句疑有誤）

"分理务周"，"叙事以次"，"义須相接"，"势必相依"，是各体文的共同作法；"申"是長篇文的作法；"合"是小品文的作法。

第一、三两則講的体裁与作法，第二則講的構思。首言："凡作文之道，構思为先，亟將用心，不可偏执。"末言："心或蔽通，思时鈍利，来不可遏，去不可留。若也情性煩劳，气由寂寞，强自催逼，徒成辛苦。不若韜翰屏笔，以須后图，待心虑更澄，方事連緝。非止作文之至术，抑亦养生之大方耳。"略同于刘勰的养气說（詳三篇八章五节），并沒有新的識解，故不詳述。

第三章　詩與社会及政治

一　陈子昂的提倡風雅詩

初唐的詩論，側重对偶格律的提示；中唐的詩論，側重社会政治的作用。以現在的术語說来，前者是艺术文学的方法，后者是人生文学的理論，絕对的相反不同；而交替轉变則在于盛唐。盛唐一方面有王昌齡和僧皎然等的作“詩格”“詩式”，一方面有稍前的陈子昂和同時的李杜的提倡风雅詩和社会詩。这是国家社会的矛盾危机，盛唐已逐漸暴露的反映。

我在第一篇第一章第六节曾說：“盛中唐的人生文学理論自以元稹和白居易为集其大成，而序幕的揭开，則始于元白以前的陈子昂（六五六——六八九）。”又引陈子昂与东方左虬修竹篇序云：

>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傳，然而文献有可徵者。僕尝暇时观齐梁間詩，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邐迤（一作逶迤）頹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又引喜馬参軍相过醉歌序云：

> 吾无用久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隱身。……日月云迈，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可見他反对“彩丽竞繁”的齐梁詩，提倡“以义补国”的比兴詩。此外，又于座右銘云：

詩礼固可学，郑卫不足听。（全唐文卷二一四，后簡称“文”）

上薛令文章启云：

然則文章薄伎，固弃于高賢，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其实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虽有劳人之歌，悵尔詠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丽，名陷俳优，長为童子之群，无望壯夫之列。（同上）

本来初唐以天下太平，优游无事，朝廷之上，君臣倡酬（詳一章一节），由是一时的詩人，都竞作韵美之詞，藉为媚君之資。在陈子昂看来，“跡荒淫丽，名陷俳优，”“文章薄伎”“为道之薄”。不过自己也是詩人，頗有同流合污之嫌，自己自恨“長为童子之群，无望壯夫之列。”实則他的目的是“論道匡君”㊀，“以义补国”，所以虽也学习詩礼，但不听郑卫淫声；虽也努力作詩，但注重风雅比兴。而其对于詩的观念，当然是元白的社会詩論的先河了，所以元白都对他称贊不已。（詳四章一节）

至陈子昂的所以有这种論調的原因，固由于他的志趣使然，而志趣的形成，虽与性格有关，却大半由于陈子昂时的君已須匡，国已須补，此在第一篇第一章第六节已有詳論，現在无庸复述了。

二　李白的提倡古風

唐代詩歌本背有兩重历史，一是南朝的綺靡緣情，一是北朝的質直言志；而唐代則由对立而逐漸融合，使北朝的素朴佳人，涂上南朝的香馥的脂粉，成功豪壯而华美的律詩。此种豪壯华美的律詩，自其产生的背景而言，是盛世元音；自詩歌的表現而

㊀ 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云：“以身許国，我則当仁；論道匡君，子思报主。”虽以“論道匡君”期崔融，实亦自吐胸臆耳。

言，則不免流于粉飾太平。（詳拙編中国詩歌史，第十二章，唐初之揉合南北的詩歌）到了陈子昂和李白的时代，已不复是完美无缺的盛世，使他們逐渐厌弃粉飾太平的詩歌，而思恢复到質直言志的故道。

关于陈子昂，已詳上节，兹再述李白（七〇一——七六二）。李白与陈子昂不甚同，他虽厌弃粉飾太平的律詩，而一因經过开元的中兴，比較的可做太平迷夢；二因他是"兴圣皇帝九世孙"（新唐書本傳），家世富有，养成十足的公子哥儿的生活意識，对于社会政治虽也拂光掠影的关照，但远不及陈子昂的切实，所以結果只是有意无意的衝出律詩的樊籬、提倡古风而已。他有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云：

>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楊馬激頹波，开流蕩无垠。廢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淪。自从建安来，綺麗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貴清眞。群才屬休明，乘运共跃鱗。文質相炳煥，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笔于获麟。（全唐詩三函四冊一卷，后簡称"詩"）

又第三十五首云：

> 醜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鄰；寿陵失初步，笑杀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眞。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頌声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风（原作斧，依李太白集校改）斤。（同上）

陈子昂的提倡风雅，大体怵于时代喪乱，欲"論道匡君""以义补国"；李白的提倡古风，虽亦由于"古风变太古，道喪无时还"（古风第三十首），"頌声久崩淪"，"我志在删述"，但大半为矯正当时的句酌字斟的律詩。所以謂："圣代复元古，垂衣貴清眞。"所以

謂："醜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鄰。寿陵失初步，笑杀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眞。"所以陈子昂要使詩有比兴的功用，李白則要使詩不失元古的清眞；陈子昂是为社会政治而改革詩，李白則为詩而改革詩。所以陈子昂不必提出詩的作法，而李白則为矯正講求格律的斲喪天眞，提倡"一揮成风斤"的自由抒写法。他的草書歌行云：

>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書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魚，笔鋒杀尽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数廂，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繩床，須臾扫尽数千張。飘风驟雨惊颯颯，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惊，时时只見龙蛇走。左盤右蹙如惊电，狀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来几許浪得名。張顚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渾脫舞？（詩三函四册七卷）

这是講草書，也是"一揮成风斤"的注脚。在古风里主張"复元古"，在这里又主張"不师古"，好象是自相矛盾，实則正是相反相成。李白的励行詩国的复古运动，和韓愈的励行文苑的复古运动一样，——都是以复古为革新。李白的复古在矯正"約句准篇"的律詩，韓愈的复古在矯正"枝对叶比"的駢文。所以李白提倡复古，却力主自由抒写；韓愈提倡复古，却力主"戛戛独造"（詳七章三节）。我們如只看到"古"字的表面意义，便說他們是开倒車，是文学逆流，那他們眞要在地下叫冤了。

韓愈的复古运动是提倡古文，李白的复古运动是提倡古詩。古詩的产生当然在律詩之前，但"古詩"的名称則在律詩之后，古詩的提倡則在矯正律詩。这一点也不奇怪。古文的产生也前于駢文，但标名为"古文"而提倡之，也是駢文发达后的一种

反响。 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云:“沈(佺期)宋(之問)之流,研練精切,稳順声势,謂之律詩”(全唐文卷六五四)。知沈宋时代已有“律詩”的名称。至“古詩”的名称,則李白以前,尙不多見。自然我沒有忘記文选有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有古詩八首,鍾嶸詩品首列古詩,刘勰文心雕龙明詩篇說,“古詩佳丽”。但那題为“古詩”的原因,和乐府中的所謂“古辞”一样,因为它是不知作于何人的古代詩歌,并不是用以括示它的体裁。李白虽沒有明确的标出“古詩”一名,但題名他自己的一部分作品为“古风”,而所謂“古风”,又恰是“古体”,不是“律体”,在那里又极力提倡复古。其他詩中,如东武吟亦云:“好古笑风俗,素聞賢达风”(詩三函四册四卷)。翰林讀書言怀呈集賢諸学士亦云:“观書散遺帙,探古穷至妙”(詩三函六册卷二十三)。 孟棨本事詩也引他的話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將复古道,非我而誰?”可見确是在努力使詩解脫声律的羈絆,恢复古时的自由抒写,而后来的“古詩”的名称,大概源于他的所謂“古风”了。

三 杜甫的兼取古律及倡導社会詩

杜甫(七一二——七七〇)与李白自是最好的詩友。但一則李白的年龄較長,其活动的时代大半当开元中兴;杜甫的年龄較晚,其活动的时代大半在天宝之乱。二則李白是翩翩公子;杜甫則“少貧不自振”,“衣不蓋体,尝寄食于人,窃恐轉死溝壑”(新唐書本傳)。三則李白是騁才的作家,而杜甫則特别講求功力:因之二人对詩的主張不甚同。李白的冲出律詩,提倡古风,杜甫似不以为然。春日暮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細論文!”(詩四函二册九卷)显然有弦外余音。所以杜甫对于古律之爭,主張兼收并蓄,不可偏廢。集中此种言論甚多,且看他的専为論詩

而作的戏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横；今人嗤点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楊王盧駱当时体，輕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廢江河万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騷；龙文虎脊皆君馭，历块都过見尔曹。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誰是出群雄！試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淸詞麗句必为鄰；且攀屈宋宜方駕，恐与齐梁作后塵。

未及前圣更勿疑，遞相祖述复先誰？别裁伪体亲风雅，轉益多师是汝师。（詩四函三冊十二卷）

再看解悶十二首中的論詩几首：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原注：水部郎中薛据），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滄浪学釣翁。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原注：校書郎云卿）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見古人詩。

复忆襄阳孟浩然，淸詩句句尽堪傳。即今耆旧无新語，漫釣槎头縮頸鯿。

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詩改罢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学阴何苦用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最傳秀句寰区滿，未絕风流相国能。（詩四函四冊十五卷）

再看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汉道盛于斯。前輩飞騰入，余波綺麗为；后賢兼旧列，历代各淸規。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鄴中奇。（詩四函

四册十五卷)

就人言,“不薄今人爱古人”,“轉益多师是汝师”。就时代言,挹取周秦汉魏,也不菲弃六朝隋唐,“后賢兼旧列,历代各清規”。就詩言,固然于秦州見敕三十韵,慨歎“大雅何寥闊”(詩四函三册十卷),但又于又示宗武云,“覓句新知律”(詩四函四册十六卷),遣悶戏呈路十九曹長亦云,“晚节漸于詩律細”(詩四函四册十九卷)。知对于古律問題,他是主張并存不廢的。

不过杜甫虽主張古律并存,但他的偉大成就,却尤在律詩。所以元稹給他作墓志銘,——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虽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專,”但尤贊其“鋪陈終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詞气豪迈,而风調清深,屬对律切,而脫弃凡近”(引詳四章一节)。这是技术方面。至实質方面,則見称于白居易与元九書的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同上)的等等社会詩。

技术方面的有偉大成就,固基于他的天才与学力,可也基于他的作詩方法;实質方面的走向社会詩,固基于他的环境使然,可也基于他的詩学观念。

他的作詩方法,有点近于楊雄的作賦方法;楊雄的作賦方法是“賦神”(詳二篇三章三节),他的作詩方法可以說是“詩神”。所以他在苏端薛复筵簡薛华醉歌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詩四函一册二卷)。八哀詩中的汝阳王璡一首云,“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詩四函二册七卷)独酌成詩云,“醉裹从为客,詩成覺有神。”(詩四函三册十卷)游修覺寺云,“詩应有神助”(詩四函三册十一卷)。

神是怎么来的?一由于素养,二由于感兴,三由于陶冶,四

由于鑽研。奉贈韋左丈丞二十二韵云，"讀書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詩四函一册一卷)。可見"下笔如有神"，基于"讀書破万卷"；"讀書破万卷"，就是学有根柢，文有素养。上韋左相二十韵云，"感激时將晚，蒼茫兴有神"(詩四函二册九卷)。可見神也靠兴而动，兴則待感而发。至感的来源多得很：坐对云山可以发兴，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云，"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詩四函一册一卷)。进到隐士的幽居也可以发兴，如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入門高兴发"(詩四函二册九卷)。凭高望远也可以发兴，如題郑县亭子云，"郑县亭子澗之濱，戶牖凭高发兴新"(詩四函三册十卷)。看見梅花也可以发兴，如和裴迪登蜀州东亭見寄云，"东閣观梅动詩兴，还如何遜在揚州"(詩四函三册十一卷)。总之，有感就可以发兴，发兴就可以作詩。所以至后云，"愁极本凭詩遣兴"(詩四函三册十三卷)。遣兴之詩，便可以"蒼茫有神"。秋日夔府詠怀云，"登临多物色，陶冶賴詩篇"(詩四函四册十五卷)。可見他也注重陶冶。感兴的作品偏于动趣，陶冶的作品偏于靜趣。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云，"靜者心多妙，先生艺絕倫，草書何太苦，詩兴不无神。"(詩四函三册十卷)可見从事于靜的陶冶，也可以使"詩兴不无神"。素养、感兴、陶冶三种方法是古律一样的，鑽研則比較偏于律詩。这是因为律詩之所以为律詩，就在較古詩更有規律。前引偶題云，"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又示宗武云，"寻句新知律"。遣悶戏呈路十九曹長云，"晚节漸于詩律細"。此外桥陵詩三十韵亦云，"遣辞必中律"(詩四函一册一卷)。可見他对于詩律是很有研究的。对于詩律有研究，也可以使詩有神。所以敬贈郑諫議十韵云，"思飄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詩四函二册九卷。上兩段探自罗膺中先生少陵詩論，見經世季刊一卷二、三期合刊)

至詩学观念，虽找不到他的明确的言論，然如求賢敷厥讜議云：

頃之擧孝秀，取备寻常之对，忽經济之体。考諸詞学，自有文章；在策以征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征，貴切时务而已。

进雕賦表云：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数子；至于沈鬱顿挫，随时敏捷，而楊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

前者虽謂貴切时务者是策，而以"貴切时务"的观念为詩，則当然不会作弄风月、述恩怨的个人詩歌；后者自謙謂"不足以鼓吹六經"，正見其以"以鼓吹六經"为重。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韵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讀書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賦料楊雄敌，詩看子建亲；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可見他在夢想"賦料楊雄敌，詩看子建亲，"便可"致君堯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見他虽以自己"經济慚長策"（偶題），不是政治人才，因未彰明較著的提出詩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然其詩則許多是在伤悼社会，諷詠政治，則其不主張个人詩歌，而主張社会詩歌，已隐約可見了。

四　元結的反对声律与提倡規諷詩

陈子昂李白之对于声律，虽暗示菲薄，而未明白反对；明白反对者，是古文家而兼詩人的元結（七二三——七七二）。他的篋中集序云：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声病，喜尙形似，且以流动为辞，不知喪于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时物，会諧絲竹，与歌儿舞女，生汙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文三八一）

消极破坏的是声律，积极建設的是风雅。又刘侍御月夜讌会序云：

> 于戏！文章道喪，盖亦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誰道是邪？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規范，今夕岂不能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詩四函六冊元結卷二）

在这里譏貶时之作者，不足“系之风雅”，在篋中集序也慨歎“风雅不兴，几及千岁。”可見他在企望以风雅詩代替当时的“拘限声病，喜尙形似”的詩。陈子昂的提倡风雅虽似以风雅有美时刺时的功用，然未明言用以規諷；元結則旗帜鮮明的提倡风雅，以規諷时君。二风詩論云：

>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风詩何也？”曰：“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为慈帝；成之以劳儉，故頌夏禹为劳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为正王；守之以淸一，故頌周成为理王：此理风也。夫至乱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为荒王；坏之以苛縱，故閔夏桀为乱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为虐王；危之以用乱，故閔周幽为惑王；亡之于积累，故閔周赧为伤王：此乱风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文三八二）

图旁匕首見，著理风乱风的二风詩，原是“將系規諷乎！”則他所提倡的，固然是风雅詩，但我們不妨直接了当的說是規諷詩，更比較恰当。

刘侍御月夜宴会序称刘侍御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規范。”篋中集序亦云：“吳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劳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見师效，能类似者，有五六人。”可見以风雅代淫靡，已形

成一时的趋势，不惟元結一人，无怪稍后的元稹白居易能成功偉大的社会詩人与社会詩論家了。

五　三位选家的意見

除了元結的篋中集以外，这时还有三部詩选集，也都在提倡风雅詩。

一是芮挺章在天宝三年所选的国秀集三卷。据宋人曾彥和跋，“樓穎序之”，今已亡佚。自序首云：

> 昔陆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謂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頌，采古詩三千余作，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順泽者也。

他的选詩标准似是婉丽順泽。然續云：

> 近秘書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謂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載間，詞人才子，礼乐大坏，諷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壯，势奔为清逸，此蔑視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長太息者也。运屬皇家，否終复泰，优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河梁，独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詞遣句，未协风騷，而披林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維天宝三載，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四部叢刊本国秀集）

可見选詩的目的，是在恢复风雅。

二是殷璠所选河嶽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的作品的河嶽英灵集上下二卷。自叙云：

>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文作“夫文有神情体雅”，疑誤）編紀者能审鉴諸体，委（文作定）詳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刘詩多直語，（文“直”下多一“致”字，則“語”字下屬）少切对，或五字幷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辯宫商（集多“徵羽”二字），詞句質素，耻相师范。于是攻（文

多一"乎"字)异端，妄(文多一"为"字)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貴輕艳，虽满箧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还，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尙在；貞观末，标格漸高；景云中，頗通远調；开元十五年后(文无"后"字)，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惡华好朴，去伪从眞，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有周风雅(集作南风周雅)，称闡今日。(文四六三，四部叢刊本英灵集，文鏡秘府論南卷)

又集論云：

昔刘倫造律，蓋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淸焉，宁預于詞場而不可不知音律焉(秘府論无"宁"字及"而"字)。孔圣删詩，非代議所及。自汉魏至于晉宋，高唱者千(集作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專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秘府論作工)，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飄飄，長裾随风还，"雅調仍在，况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与調合，首末相称，中間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覺，隐侯去之更远。璠今所集，頗异諸家，旣閑新声，复曉古体，文質半取，风騷兩挾，言气骨則建安为儔(集作傳，誤)，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来秀士，无致深憾(秘府論作惑)。(四部叢刊本英灵集，文鏡秘府論南卷)

虽"文質半取"，然实是卑薄声律。謂"理則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貴輕艳"的詩歌，"虽满箧笥，將何用之。"可見他固不輕視詩之美，但尤重視詩之用；固不輕視詩的藝術价値，但尤重視詩的人生价値。所以力讚玄宗的"惡华好朴，去伪从眞，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有周风雅，称闡今日。"

三是高仲武所选的"自至德元首，終于大历末年"的中兴閒气集二卷。自序首云：

詩人之作，本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謨，則列于風雅。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風流，正声最备；其

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阳止录吳人，此繇曲学專門，何暇兼包众善，使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長叹也。

末又云：

且夫微言虽絕，大制犹存，詳其否臧（文作"臧否"），尙可拟議：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文无"表"字）国風之善否，岂其苟悅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文作"斯"）弊。但使体狀（文作"格"）風雅，理致淸新，观者易心（"观"上文多"期"字），听者竦耳，則朝野兼取，格律兼收；自鄶以下，非所敢求焉。（文作"非所附麗"。文四五八，四部叢刊本中兴閑气集）

其提倡风雅的意旨，尤为显豁，无庸申說。此外还有无名氏所撰搜玉集一种，王士禛十种唐詩选本止于乔知之張謂，知选者大概也是盛唐或中唐时人。惜不見序文，所以选集的旨趣，无由探悉。

国秀集对每人皆不評論，英灵集对每人皆有評論，閑气集則或評論或不評論。英灵集首选常建詩，好象是最推崇常建詩。評云：

"高才无貴士"，誠哉是言！曩刘楨死于文学，左思終于記室，鮑昭卒于参軍，今常建亦淪于一尉，悲夫！建詩似初发通庄，卻寻野徑，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輒来，唯論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淸光犹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幷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黃，軍敗鼓声死，今与山鬼鄰，殘兵哭辽水"，屬思旣苦，詞亦警絕。潘岳虽云能敍悲怨，未見如此章。（卷上）

閑气集首选錢起詩，好象是最推崇錢起詩。評云：

員外詩体格新奇，理致淸贍，越从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后，員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且如"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阳。"又"牛羊山上小，

烟火隔林疎。"又"長乐鐘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又"旁途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則祇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以弘長名流，为后楷栻。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后有錢郎。"（卷上）

英灵集的推崇常建，还算是就詩論詩。然此外如評崔顥云："顥少年为詩，名陷輕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懔然"（卷中）。評儲光羲云："儲公詩格高調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挾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同上）評王昌齡云："余尝覩王公長平伏寃，又吊枳道賦，仁有余也，奈何晚节不矜細行，謗議沸腾，垂历遐荒，使知音者歎息。"（同上）則又論及行事，重視詩旨。至閑气集的論及行事，重視詩旨，則由評錢起文中，已得到充分的證明。这当然是因为他們評选詩歌的目的，本来虽不輕視詩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視詩的人生价值。

他們的評論方法，大概模仿詩品，特别是閑气集尤为明显。如評韓翃云："前載'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兴深于刘員外，筋节成于皇甫冉也"。（卷上）評郎士元云："古謂謝朓'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慚阻矣"。（卷下）評崔峒云："亦披沙揀金，往往見宝"。（卷下）不惟故实出于詩品，語句亦效法詩品。

閑气集的选者高仲武，恰巧和高适的字相同，而且也是渤海人，由是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繫于高适名下。但高适死于永泰元年，当公元七六五年，閑气集"終于大历末年"，当公元七七九年，高适的"墓木已拱矣"，所以自陆游跋中兴閑气集已云："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适也。"又云："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四部备要本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二十七）

六　楊綰賈至梁肅及權德輿等的詩教論

以风雅代淫靡，眞成了当时的共同目标，选家如此，著論者

亦莫不然。楊綰(？——七七七)条奏貢举疏云：

国之选士，必藉賢良。……自叔世澆詐，玆道寖微，爭尙文詞，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虛誕，終取擯于乡閭。自是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敗俗伤教，备載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皆有由也。近煬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員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經加帖經，从此积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誦当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虛声。六經則未尝开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复征以孔孟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怀祇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哉？(文三三一)

楊綰的这种言論，很快的就有人引为同調。如賈至(七二八——七七二)議楊綰条奏貢举疏云：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經夫妇，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廢兴也。"故延陵听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貳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擇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文三六八)

又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云：

洎騷人怨靡，楊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陆，揚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听乐，知諸侯之兴亡，覽数代述作，固足騐夫理乱之源也。(同上)

梁肃(七五三——七九三)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云：

予尝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浹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其有不由此者，为理則䰞，在音則煩；䰞之弊也

悖(一作朴)，烦之甚也乱。(文五一八)

又秘府监包府君集序云:

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观者，可与图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与專对。(同上)

武元衡(七五八——八一五)刘商郎中集序云:

天运地轉，剛柔生焉；礼辯乐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圣人观象立言，用稽述作，发乎情性，形于詠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弥綸王化，小則舒一时幽憤，刺見国风。故子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詩，声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动天地，感鬼神，則正始之道存焉。(文五三一)

杜确(代宗时人)岑嘉州集序云:

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为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宫体"。自后沿襲，务于妖艳，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风格，頗存規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諷諫比兴，由是廢缺。物极則变，理之常也。圣唐受命，斲雕为朴，开元之际，王綱复举，淺薄之风，兹焉漸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輩，頗能以雅参麗，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遺范矣。(文四五九)

稍后的李益(？——八二五)亦作詩有六义賦云:

夫圣人之理，原于始而执其中，觀天文以审于王事，观人文而知其国风。故每岁孟春，采詩于道路，而献之泮宫，有以知下之化，达人之穷，发于关雎之首，及乎王道之終。故曰：天視自人而明，天听自人而聰。所謂政于內，繫一人之本；动于外，形四方之風。始于風，成于雅。失其道或天方薦瘥，得其宜或錫之純嘏。是人情之大寶，未有不由于斯者尔。其德以頌宣，事以类比。陈之于学校，將可以反正轍淫；播之于絲桐，何有于羽商变徵？厲辞庶因于劝戒，緣情孰多夫綺靡。嘉魚作而賢者进焉，騶虞廢而王道缺矣。……王泽竭而詩

不作，周道微而兴以刺，俾乃审音之人，于以知風之自，洎夫代見更改也。（文四八一）

这些人的論点虽不同，然都归結于提倡风雅，反对淫靡。淫艳的流弊是行为不檢，所以指摘文人无行，于重文学以外，提倡励品行。如权德輿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問五道的第五道云：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于中，必文于外”。司馬相如楊雄藉甚汉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贊符命以投閣，其于溺情敗度，又奚事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于代，禍不旋踵，何可胜言！兩汉亦有質朴敦厚之科，廉清孝順之举，皆本于行而遺其文，复何如哉？（文四八三）

淫靡的原因由于以声律取士，所以楊綰賈至皆指摘科举制度，权德輿进士策問五道的第五道亦云：

問：育材造士，为国之本，修辞待問，賢者能之，岂促速于儷偶，牽制于声病之为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韵頗叶者，或不聞于軼响；珪璋特达者，亦有累于微瑕。欲使楚无献玉之泣，齐无吹竽之濫，取捨之际，未知其方。……鄙夫虛佇，以广未聞。（同上）

楊綰賈至要徹底的改革科举制度，权德輿要在科举制度中謀“取捨”之方，总之是想借掄士大典，將詩改为风雅典正，代替当时的丽靡淫哇。

自然我沒有忘記唐初也有闡明詩教关系的言論。如孔穎达（五七四——六四八）毛詩正义序云：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运醇和，則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怀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从正。发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詩。”此乃詩之为用，其利大矣。

又云：

然則詩理之先，同夫开辟；詩迹所用，隨运而移。上皇道質，故諷

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牺軒莫測其始。其后时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声寢，陈灵兴而变风息。

但这是經学家对于經学中的詩經之傳統見解，不是詩論家对于詩的一般見解，不能据此謂唐初人之对于詩，已趋向于用以詠歌民风，規諷时政。到天宝以后，則反对个人詩，提倡社会詩，已由上述諸人的見解，証明为时的风尙了。

唐初的經学家之对于詩經，依經学之傳統的見解，主張大膽的“暢怀舒憤”俾“聞之者足以塞違从正。”史学家之对于詩文，亦依史学之傳統的見解，主張参合文質，因之对于六朝詩文的淫丽，亦曾加抨击(詳五章二至四节)。但这种見解，几皆为文章家所采用，詩人則对之若从若違。唐初的詩，內容似不甚“淫”，形式則不惟“丽”，而且要对偶，要律切。唐太宗帝京篇序云：

> 余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追縱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风，蕩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爛漫之音。

自然有改正爛漫淫靡之意。但第一他所作的虽是詩序(帝京篇是詩)，而意思則似指全部文化。所以在文中反对“秦始、周穆、汉武、魏明”的“峻宇雕牆，穷侈极丽，征稅殫于宇宙，轍跡徧于天下，九域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第二，他对宮体詩是很艳羡的，唐詩紀事卷一載：“帝(太宗)尝作宮体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圣作誠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风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尔。’”实則虞世南原为隋煬帝的寵臣，其詩歌如旧唐書卷七十二本傳所說，是“祖述徐陵”的。不过据此知唐初确反对詩的“淫靡”。但提倡声律对偶，与天宝以后的詩論不同。天宝以后，其反对“淫靡”，似与唐初相像；但唐初的反对“淫靡”，是代以粉飾太平，天宝以后的反对

"淫靡",則代以詠歌社会,規諷政治。至形式方面,唐初提倡声律对偶,天宝以后虽仍有少数的人在提倡声律,但多数的人則皆企图以风雅詩代声律詩了。

七　刘嶢的先德后藝説与尙衡的文章三等説

权德輿虽想到文人的行为問題，但还沒有著專文討論；著專文討論的,有刘嶢(肃宗时人)的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尙衡(肃宗至德中官散騎常侍等职)的文道元龟。刘疏云：

> 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門,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驅馳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学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余力,則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諧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謨,劳心于草木之間,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采詩,以观风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佇甲科。鄷舒俊才,沒而不齿;陈实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动；風动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歟？(文四三三)

尙文的著作,乃所以解答平阳太守稷山公的歎"取士之道","或精文而薄于行,或敦行而淺于文。"他分文为君子之文,志士之文,詞士之文三等：

> 文章之圖,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从人而有焉,工与不工各区分而有之:君子之文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为中等，其义全；詞士之文为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網物,义也可以动众，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为之質；后乎言,

言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懸，气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学古以攄情，屬詞以及物；及物胜則詞麗，据情逸則气高；高者求淸，麗者求婉，耻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

对于三等文，独提倡君子之文，而反对詞士之文：

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杼軸乎天人之际，道达乎性命之元，正复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无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业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尙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范众，經邦叙政，其难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龟，庶观文章之道，得喪之际，悔吝之所由者也。（文三九四）

提倡"君子之文"，是因为"可以經化"；反对"詞士之文"，是因为"乃頹靡之道焉"。所以与以"风雅"代"淫靡"，正是如出一轍。

第四章　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詩論

一　原因与動机

因了社会的轉变和陈子昂杜甫以来的鼓吹，使詩由艺术之宫，逐漸的移植在人間世上，由歌詠各人的悲欢离合，逐漸的改变为歌詠社会的流离丧乱。但社会詩和社会詩論的完成者，仍然要推举元稹和白居易。

元稹（七七九——八三二）字微之，河南人。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乐天，下邽人（原籍太原）。旧唐書二人合傳（卷一六六），新唐書二人分傳（元卷一七四，白卷一一九）。他倆的所以能完成社会詩和社会詩論，最大的原因有二：

一、元白居陈杜諸人之后，社会詩和社会詩論，已由他們揭开序幕，循次而进，自然就要唱出压軸好戏。元稹叙詩寄乐天書云：

> 稹九岁学賦詩，長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声病。……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詩相示者，吟翫激烈，即日为寄思元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数百首，爱其浩蕩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兴寄，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备矣。（文六五三）

知他的学賦詩系从陈杜入手，就中对杜甫尤为推崇备至，作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云：

>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蓋所

謂上薄风雅，下該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杂徐庾之流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則詩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謂之李杜。余观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陈終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詞气豪迈，而风調清深，屬对律切，而脫弃凡近，則李尙不能历其藩翰，況堂奥乎！（文六五四）

白居易也特別推崇陈杜，与元九書云：

唐兴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兴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篇。至于貫穿今古，覼縷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尙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文六七五）

又喜欢别人說他的詩似陈杜。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致吾陈杜間，賞爱非常意。（詩七函一册一卷）

知他的作詩也在效法陈杜。陈杜都是提倡幷創作社会詩的，他們旣效法幷称讚陈杜，同时称讚陈杜的又恰是"激烈"，"兴寄"，"风雅比兴"的社会詩，当然也要提倡社会詩，創作社会詩了。

二、陈子昂时不过是唐社会崩坏的初期，还不十分危急；杜甫正值天宝之乱，自然是喪乱不偩，但肃宗即位灵武，郭李收复兩京，正在做着中兴的好夢。至元白的时候，安史之乱已平，而中兴之夢却断，豪族与农民的悬殊益甚，一方面促成农村經济的凋敝沒落，另一方面又促成朝廷士大夫的驕奢荒惰，再加以藩鎭跋扈，臣庶苟且，致使天下攘攘岌岌，不可終日。这也不必旁征

博引，卽举元白的詩文作証吧。元稹叙詩寄乐天書云：

时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閫节將，动十余年不許朝覲，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处，因喪負众，横相賊杀，告变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乱，乱众宁附，願其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于几閣，甚者拟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夺，名为进奉，其实貢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陆腴沃以乡里計；其余奴婢資財生生之备称之。朝廷大臣以謹愼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見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时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夺百貨，势不可禁。僕时孩騃，不慣聞見，独于書傳中初习理乱萌漸，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白居易与元九書亦云：

自登朝来，年齿漸長，閱事漸多，每与人言，多詢时务；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詩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闕，而难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进聞于上。

又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忆作元和初，忝备諫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顦顇。但伤民病痛，不識时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这都是元白自述作詩的动机，由于"伤民病痛"，或不慣聞見当时社会的怪現象；至只写社会民生的疾苦，官商富豪的剝夺百姓，

而未言因以作詩者，如元稹的和李校書新題乐府十二首、文蘽自叙，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策林等詩文，更举不胜举；元白以外的書，亦頗有記載。惟以我們不是在写社会史，故不一一征引；但元白的所以成功社会詩人与社会詩論家，据此可知是当时社会的驅之使然了。

二 "補察時政"与"洩導人情"

至社会詩論，則元較簡略，白更詳尽。元稹叙詩寄乐天書自述作詩的动机是：

> 每公私感憤，道义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能哀余，通滯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則欲賦詩。

又上令狐相公詩启自述他的詩是：

> 其間感物寓意，可备曚瞽之諷达者有之，詞直气麤，罪戾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盃酒光景間，屢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文六五三）

知其吟詩率以社会为主；但沒有以社会为主的理論。白居易則不同了，与元九書云：

>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詩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賢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义；緣其声，緯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則言順，言順則声易入；类举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決此以为大寶也。

自白居易的观点看来，天下和平基于圣人的"感人心"；"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詩正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所以二帝三王都"揭此以为大柄，決此以为大竇。"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詩的四要素。根情就是本之性情，苗言就是表以語言，华声就是佐以声調，都是普通的見解，不能算是白居易的新說。不过白居易以为詩之为詩，不止在"根情、苗言、华声，"还要"实义"。"实义"就是实之以义，就是以义理为实質。因为詩是"根情、苗言、华声"的，所以有"感人心"的力量，但"感人心"的力量善用之可以感人为善，不善用之也可以感人为惡，所以必須实之以义。实之以义是白居易的根本主張，同时也是他的新說，虽然陈杜的提倡风雅比兴，也就是实义。

实义的具体方法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洩导人情。"与元九書續云：

>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聞者足誡，言者聞者，莫不兩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策林六十八亦云：

> 古之为文者，上以紉王教，系国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劝善惡之柄，执于文士褒貶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无覈实，則懲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补察之义廢矣。（文六七一）

讀張籍古乐府亦云：

> 为詩意如何，六义互鋪陈，風雅比兴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学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妇仁；讀君勤齐詩，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詩七函一册一卷）

寄唐生亦云:

>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同上)

与元九書和策林是泛論,讀張籍古乐府是称讚張籍的作品,寄唐生是述說自己的詩歌,总之是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洩导人情。""洩导人情"是詩人的作詩路向,"补察时政"是当权的观詩施政。当权的人何从看到詩人的詩歌,白居易以为惟有恢复古代的采詩制度。策林六十九云:

> 臣聞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將在乎选观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声,諷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謂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歎,发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泽及四海也; 聞禾黍之詠,則知时和岁丰也; 聞北風之詩,則知威虐及人也; 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 聞"广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也妇与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业也。故国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 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补之; 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决之使导; 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 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 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聞也。(文六七一)

有了采詩之官,則詩人知道"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誡,"由是喜作"洩导人情"的詩歌,敢作"洩导人情"的詩歌; 当权者也得"亲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补之。"沒有采詩官,則恰恰相反。新乐府中的采詩官一首云:

> 采詩官,采詩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庙登歌讚君美,乐府艳詞悅君

意；若求兴諭規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規刺，漸恐朝廷絕諷議。……君兮君兮願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詩七函一册四卷）

这是因为沒有采詩官，則"洩导人情"的詩歌不易上达君听；而預备上达君听的詩歌只有故意的"贊君美"，"悅君意"。所以前引与元九書也說采詩官廢，則"至于諂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三　歷代詩的優劣

由这个观点論詩，最好的作品，除了堯舜时的君臣賡歌以外，就是詩三百篇，后来則每况愈下。因为賡歌是君臣的互相劝勉，詩三百篇是傳为采詩官采来的"洩导人情"的美刺詩。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云：

始堯舜时，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詩人繼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緝拾选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余无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态繁，然犹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戏之詞，亦随时間作。至汉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讀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詞意簡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馬間为文，往往横槊賦詩，其遒壯（二字本集无）抑揚，寃哀悲（本集作存）离之作，尤极于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齐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习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泽放曠精淸为高，蓋吟写性灵，流連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兩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批評的标准是：是否"干預教化"，是否合乎"风雅"。又指出采詩官旣廢以后的詩歌，便陵迟至于"淫艳刻飾，佻巧小碎，"可見恢

复采詩官的提議，和"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洩导人情"的口号，虽倡自白居易，但元稹也正有同感。

前节所引白居易与元九書，也推崇賡歌（即"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和洛汭歌，也致慨于采詩官旣廢以后的"六义始刓矣"，則由采詩官采輯来的詩三百篇，当然也是他所推崇的。与元九書續評詩三百篇以后的作品云：

> 國風变为騷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远，梗概尙存，故兴离别，則引"双凫""一雁"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悪鳥"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
> 晉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鮑之流，又狹于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寖微矣。
>
> 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过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凉"，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余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六义就是风雅頌賦比兴。风雅頌的原始意义不可考，汉儒的解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雅也是如此，所不同者，"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謂之雅。"頌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詳二篇一章三节）。賦比兴的解释很紛歧，大抵汉代經学家偏于就意义解释（同上），六朝文論家偏于

就方法解釋(詳三篇八章五节及九章四节)。唐人是傾向汉代經学家的解釋的。如孔穎达毛詩正义釋詩序"詩有六义"云:"太师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义,故言六詩,各自为文,其实一也。彼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陈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劝之。……'賦云'鋪陈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兴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劝諭之',謂美詩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白居易随时吐露"美""刺""規""諷"的字样,再三再四的提到"言者无罪,聞者足誡",知他所謂六义,同于孔穎达的解釋,也是承用汉人的說法,不是承用六朝人的說法。惟其"言者无罪",所以能"洩导人情";惟其"聞者足誡",所以能"补察时政"。

他俩以这种观点来批評古代詩,也以这种观点批評唐詩。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云:

>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声势,謂之律詩。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則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备。

而独推崇杜甫,已引在第一节,玆不复述。白居易謂"唐兴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胜数,"而可举者只有陈子昂鮑防及杜甫,也引在第一节,也不复述。至杜甫与李白的比較評价,他俩都崇杜卑李。但白居易的卑李,是因为"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元稹則卑其不及杜的"鋪陈終始,排比声韵。"这是因为他俩虽是最好的朋友,又同是社会詩人,同是社会詩論家,但二人相較,則白更重詩的社会使命,元更重詩的声韵之美,所以称贊点微有不同。但"排比声韵"指声韵之美,"鋪陈終始"仍指社会使命也。

四 樂 府 論

元更重詩的声韵之美，也不是不計及詩的社会使命；白更重詩的社会使命，也不是不計及詩的声韵之美。他說“非求宮律高，不务文字奇，”不是不要“宮律”与“文字”，而是不要“宮律高”与“文字奇”。所以他的詩的四要素有“苗言”与“华声”。所以他重視乐府，作新乐府五十首，自序云：

>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詩三百之义也。其辞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傳信也；其体順而肆，可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詩七函一册三卷）

很坦白的說是在利用乐府的体裁，制作社会的詩歌。为什么要利用乐府体裁，因为乐府有宮律之美，感人心的力量較徒詩更大。旣取其感人心的力量更大，当然也欲其感人心的范圍更广，所以要“其体順而肆”。“順而肆”就是有“宮律”而不“高”的具体标准。

元稹更重声韵之美，当然更重視乐府，作乐府古題十九首、和李校書新題乐府十二首及其他乐府若干首。乐府古題序云：

> 詩訖于周，离騷訖于楚。是后詩之流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詞，审調以节唱，句度短長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区別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謳”“謠”，备曲度者总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乐以定詞，非选詞以配乐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

虽题号不同，而悉謂之为詩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詞，度为歌曲；盖选詞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尽編为乐府等題。除鐃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詞在乐志者，其余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尽播于管絃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紀題，往往兼以句讀長短，为歌詩之异。

劉补闕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流波等操，齐犢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則不于汉魏而后始，亦已明矣。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諷兴当时之事，以貽后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長，于义咸为贅賸；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犹有詩人引古以諷之义焉。曹刘沈鮑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輩，謂是为当，遂不复拟賦古題。昨南梁州見进士刘猛李余，各賦古乐府詩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題，全无古义者，若出門行不言离别，將进酒特書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頗同古义，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將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詩同异之意焉。

和李校書新題乐府序云：

余友李公垂貺余乐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为文者，余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詞以示后，使后之人謂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我們应当指出的，是：元稹也同于白居易，也是在利用乐府的体裁，制作社会的詩歌。所以一則說詩流二十四名，"皆詩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再則說，"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諷兴当时之事，以貽后代之人。"三則說沿襲古題，"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犹有詩人引古以諷之义焉。"四則說"李公垂貺余乐府新題

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为文者，余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其次是：元稹的对于乐府确比白居易更有研究，这大概因为他的对声韵較白居易更为重視。他在乐府古題序里闡明了兩个問題：

一、歌詩之异。歌是“由乐以定詞”的。換言之，就是先有乐譜，然后再依譜作詞；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种，是也。詩有兩种，一是曾經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經入乐的詩是“选詞以配乐”。換言之，就是先选詩詞，然后再依詞制譜。这种我們可以名之为“乐詩”。未曾入乐的詩，各家詩集里多得很，无須举例，亦无須說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詩”。乐詩徒詩都有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九种，編乐府者往往一律編入，由是誤收許多徒詩，如“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这是就古乐府而言。至唐代乐府則可分为古題乐府与新題乐府兩种。古題乐府有的沿襲古題，有的寓意古題；新題乐府則“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过无論古題乐府或新題乐府，都是“詩”，不是“歌”。所以称寓意古題有“詩人引古以諷之意”，称杜甫作品特标明“詩人”，称刘猛李余乐府特加一“詩”字，称为“古乐府詩”。

二、乐府起源。引刘补闕云，“乐府肇于汉魏”。他則据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流波等操，齐犢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說“不于汉魏而后始”。但这些作品都始見琴操，琴操乃后人伪書（詳四庫全書提要），不足为据。汉書禮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乐府，采詩夜誦。”顏师古注云：“乐府之名，盖始于此。”知刘补闕說是对的，元稹說是錯的。

实則不只他的乐府起源說是錯的，他的解釋歌詩之异也有錯的地方，如說歌是“由乐以定詞”的，当然不錯，但拉入謠謳便

錯了；因为謠謳的入乐和詩一样，也是"选詞以配乐"的。不过元稹以前的論述乐府者，如各史的礼乐志、乐志，或音乐志，率視为国家的典章制度；就是專門論述乐府的書，如王僧虔技录，釋智匠（一作丘）古今乐录（二書已亡，郭茂倩乐府詩集有征引）、刘餗乐府解題、吳兢乐府古題要解，也大半重在考索制度，撮提辞意，校讎字句，很少有人当作一种文学研究；有之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乐府篇，但也不及元稹的分析詳密，立論精辟，所以允为一篇值得推崇的乐府理論文字。

五　通俗与次韻

元稹比白居易更重視声韵，所以不惟对乐府更有研究，对其他詩歌也更求韵切，由是創立次韵。白居易比元稹更重視社会使命，所以不惟作乐府更要"辞質而徑"，作其他詩文，也更要"辞質而徑"。彭乘墨客揮犀云："白乐天每作詩，令一老嫗听之，問曰解否？曰解，則录之；不解則又复易之。"虽是未必可信的故事，但白居易的詩歌的比較通俗，是尽人皆知的。策林六十八云：

>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事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养文之旨，俾辞賦合炯戒諷諭者，虽質虽野，采而奬之；碑誄有虛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絕之。若然，則为文者必当尙質抑淫，著誠去伪，小疵小弊，蕩然无遺矣，則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歟！

黜辞藻，奬質野，当然都是力求通俗了。

元稹的創立次韵，見他的上令狐相公詩启云：

> 以为律体卑痺，格力不揚，苟无姿态，則陷流俗，尝欲得思深語

近，韵律调新，屬对无差，而风情自远；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淺之詞，皆目为“元和詩体”。某又与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詩，就中爱驅駕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詩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戲排旧韵，别創新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湘間为詩者，复相倣傚，力或不足，則至于顚倒語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詩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

不过通俗虽为白居易所提倡，元稹也乐于附和，所以他的改革律体的目标是“思深語近”，而末流之弊也就至于“支离褊淺”。次韵虽为元稹所創立，白居易也乐于附和，他的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云：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僕繼和。其間瘀絮四百字，車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殫，瓌奇怪譎。又題云“奉煩只此一度，乞不見辞。”意欲定霸取威，置僕于穷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約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長者，僕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長，过蒙見窘。然敌則气作，急則計生，四十三章麾扫并畢，不知大敌以为如何！（詩七函五册二十二卷）

又因繼集重序云：

去年，微之取予長庆集中詩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題为因繼集卷之一。今年，予复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題为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来！”盖示余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战迨兹三矣，即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办耶？抑又不知鼓衰气竭，自此为迁延之役耶？进退唯命。微之，微之，走与足下和答之多，从古未有。足下虽少我六七年，然俱已

白头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笔硯，何癖习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于三可也。忽恐足下懶发，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戏之者，殊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宜櫜弓匣刃，彼此与心休息乎？（文六七五）

通俗就是"描言"，韵律就是"华声"。因为他倆的詩歌是"描言"的，不是掉弄辭藻的，所以一般人容易瞭解；因为他倆的詩歌是"华声"的，不是詰屈聱牙的，所以一般人爱好听唱。元稹白氏長庆集序云：

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竟作新詞，自謂"元和詩"。而乐天秦中吟、諷諭、閑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观寺郵候牆壁之上无不書，王公妾妇牛童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繕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盜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間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竟习歌詠，召而問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輒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傳之广者！（文六五三）

白居易与元九書云：

日者又聞亲友間説，礼吏部举选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为准的；其余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感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来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广板作寓，疑誤）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学士長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妓乐他宾，諸妓見僕来，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

由一般人的喜爱和巴蜀江楚間洎長安少年的倣效，可以知通俗

与声韵的收效之大了。

六　觸忌与退轉

他倆所提倡并創作的詩歌是"实义"的，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洩导人情"的，当然要諷刺。自他倆看来，"言者无罪，聞者足以誡，"但当政者却是"聞者不誡，言者当罪。"他倆的詩歌如不甚风行，也便罢了，偏偏的他倆又知道借用通俗与声韵——就是"描言"与"华声"的方法，使他倆的諷刺詩，"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傳之广者，"当然更要被当政者恨之刺骨了。白居易与元九書云:

凡聞僕賀雨詩，众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众面脉脉，尽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权豪貴近者相目而变色矣；聞登乐游园寄足下詩，則执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邨詩，則握軍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徧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詆訐，号为訕謗；苟相与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兩三人。有邓魴者，見僕詩而喜；无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躓若此。嗚呼！豈六义四始之风，天將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寄唐生亦云:

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藥良气味苦，琴澹音声稀。不惧权家怒，亦任亲朋譏。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伤唐衢二首之二亦云:

天高未及聞，荆棘生滿地。

白居易因詩获譴，元稹何独不然？所以上令狐相公詩启云:"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又云:"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无

他歧，强由科試。及有罪譴弃之后，自以为廢滯潦倒，不复以文字有聞于人矣。”至令他不敢承認爱好文章，則他飽受文章之累可知。旧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称元稹拜监察御史，劾奏了几位官員，“执政以稹少年后輩，务作威福，貶为江陵府士曹参軍，”“量移通州司馬”。同上白居易傳称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国耻。宰相以宮官非諫职，不当先諫官言事。会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墜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伤名教，不宜寘彼周行。执政方惡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江州司馬。”自然他倆的貶謫，不是直接的由于倡导諷諫詩，但与倡导諷諫詩有关。一則元稹的劾奏，白居易的諫諍，和倡导諷諫詩同一出发点。二則因倡导諷諫詩所以更得罪“执政”，伺机貶斥。

无情的貶謫，使他倆認識了执政的励害，認識了时政的不容人补察，由于个人的势小力微，不敢再倡导社会詩了。为了保全性命，只有退轉的一个方法，由是元稹轉于艳情，白居易轉于閑适。白居易和夢游春詩一百韵序云：

>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游春詩七十韵寄予。……大抵悔既往而悟將来也。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則已，若悔于此，則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悟于妄，則宜归于眞也。況与足下，外服儒风，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归也，將安返乎？將安归乎？今所和者，其章旨卒（一作卒章指）归于此。夫感不深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悔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夢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眞，归乎实，亦犹法华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嫇舍过酒肆之义也。（詩七函三册十四卷）

此最足以显示二人对社会冷淡以后的分途逃避，元则"梦游春"，白则"宗梵行"。"服儒风"是"兼济天下"，"宗梵行"是"独善其身"。白居易早年見到"人病""时阙"，由是欲"兼济天下"，由是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詩合为事而作。"中年以后，因为为时而著的文章和为事而作的歌詩，招尤获譴，不得不設法"独善其身"，而歌詩的理論，遂轉于"理世之音安以乐，閑居之詩泰以适。"序洛詩序云：

> 予历覽古今歌詩，自风騷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是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万；观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憤忧怨伤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数奇，詩人尤命薄"，于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千首，以其多也，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虽才不逮古，然所作不啻数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数奇命薄之士，亦有余矣。今寿过耳順，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饑寒。此一乐也。太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归洛，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詞无一字，忧歎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蓋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曰，理世之音安以乐，閑居之詩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洛詩，别为序引，不独記东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詩者。（文六七五）

早年力主"选观风之使，建采詩之官，"晚年的詠歌也"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詩者。"惟早年的提倡采詩，目的是"俾乎歌詠之声，諷

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借使天子“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晚年的“俟夫采詩者”，目的是使后人“不独記东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就当时的实在情形而論，太和的社会政治更遜于元和，但在元和时候，則謂“人病”須“救济”，“时闕”須“裨补”，由是詩歌也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洩导人情”；到太和时候反認为是“理世”可以“閑居”，由是謂“理世之音安以乐，閑居之詩泰以适。”白居易也未必不知这是一种“飾詞”，但旣不能“达則兼济天下”，只好“穷則独善其身”；“諷諭詩”旣招尤获譴，只好作“閑适詩”了。

旣然放弃“諷諭詩”，改作“閑适詩”，由是早年詆为“偏放于田园”的陶淵明和“多溺于山水”的謝灵运，变为最崇奉的詩人。晚年自号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傳云：

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数卷。（文六八〇）

題潯阳楼云。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元。（詩七函二冊七卷）

作效陶潛体詩十六首，序云：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时屬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醞新熟，雨中独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嬾放之心，弥覚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詩七函一冊五卷）

又作訪陶公旧宅，序云：

余夙慕陶淵明为人，往岁渭上閑居，常有效陶体詩十六首。今游廬山，經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詩七函二冊七卷）

至早年所最崇奉的陈子昂杜甫，却已弃不复道了。

元稹的轉于艳情，除了前述夢游春詩以外，白居易还有和答詩十首，序云：

>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轉为江陵士曹掾。……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于执事，凡二十章，率有兴比；淫文艳語，无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时，消忧懣，又有以張直气而扶壯心也。（詩七函一册二卷）

由白居易奉詩的"淫文艳語，无一字焉，"知元稹的已轉于"淫文艳語"。可惜元稹的詩文已有亡佚㊀，連夢游春詩都无从覓閱，否則关于他的退轉，也許有更直接、更珍貴的材料。

在这里，应有兩点补充：

一是他倆的退轉基于貶謫，也基于宿緣。旧唐書白居易傳云："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順为事，都不以迁謫介意。"所以他能一面"服儒风"，一面"宗梵行"。在未貶謫以前，以为可以"兼济天下"，由是偏重"服儒风"，偏重"服儒风"的詩歌自然偏重"諷諭"。既遭貶謫之后，知道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由是偏重"宗梵行"，偏重"宗梵行"的詩歌自然偏重"閑适"。但未貶謫以前，也于"服儒风"之外，又"宗梵行"，也于諷諭詩外，又有閑适詩，不过不似貶謫以后的偏重"閑适"詩，放弃諷諭詩而已。元稹有会眞記傳奇，述張君瑞崔鶯鶯恋爱故事，宋人王銍会眞記辯証謂張君瑞卽元稹化身，夢游春詩正是这段恋爱的回忆，范攄云溪友議載元稹使蜀，爱恋名妓薛濤，及廉問浙东，又爱恋歌妓刘采春，都有詩歌贈貽。又載"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达而苦貧。繼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

㊀ 宋洪适書元氏長庆集后云："唐志著录有長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館所藏，独有小集，其文盖已杂之六十卷中矣。"（見四部叢刊本元氏長庆集卷六十后）

思,时彦以为佳偶。”可見他很早就有艳情姻緣,艳情詩歌。謫通州以后,叙詩寄乐天書云:“通之地湿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夏多阴霪,秋为痢瘧,地无医巫藥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則安能保持万全,与足下必复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立言立事的志趣既已灰冷,艳情的回忆遂益复熾热,当然要放弃諷諭詩,大作艳情詩了。

二是元稹轉于艳情,但也不是絕对的不轉于閑适;白居易轉于閑适,但也不是絕对的不轉于艳情。旧唐書元稹傳載長庆四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世文士;而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动盈卷帙。副使竇巩,海內詩名,与稹酬唱最多,至今称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娛游,稍不修边幅,以濱貨聞于时。”同上白居易傳云:“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有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所以元稹也偶有閑适詩,白居易也偶有艳情詩;不过元稹的詩多艳情,白居易的詩多閑适罢了。

七 自我批評与自选詩集

閑适艳情是詩的內容,至詩的形式,他倆本提倡通俗与声韵;通俗与声韵便于作諷諭詩,也便于作閑适詩和艳情詩,所以无庸改变。他倆的这种以閑适艳情为內容,以通俗声韵为形式的詩,領导了大部分的作家,招来了不少的評击。如稍后的杜牧便引李戡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詩者,纖艳不逞,非莊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詳五篇一章三节)实則他倆自己已有批評。白居易与元九書云:

今僕之詩,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詩与長恨歌已下耳。时之所

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詩者意激而言質，閑适詩者思澹而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又云：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討論而削夺之，然后繁簡当否，得其中矣。況僕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

又和答詩十首序云：

頃者在科試間，常与足下同笔硯，每下笔时，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辞繁，意太切則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長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見时，各引所作，稍删其煩，而晦其义焉。（詩七函一册二卷）

二文都是白居易所作，但旣云，"足下来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可見元稹也有文繁的自我批評。至于"艳"，白居易似乎也不甚贊成，所以他奉詩元稹，"淫文艳語，无一字焉，"冀以張元稹的直气，扶元稹的壯心（詳六节）。"纖"則他倆似認为乃他人的傚效不善之病，所以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启，慨歎江湘新进小生的傚效他倆的作品，至于支离褊淺（詳五节）。总之，他倆所矜重的並不在此，而在諷諭詩与閑适詩——元稹只矜重諷諭詩，白居易並矜重閑适詩。

元稹的只矜重諷諭詩和白居易的並矜重閑适詩，还可以取証于他倆的自选詩集。元稹尝自选杂詩十卷，进詩狀云：

臣九岁学詩，少經貧賤，十年謫宦，备极悽惶，凡所为文，多用感激。故自风詩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頗近謳謠，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詩百韵，或因友朋戏投，或因悲欢自遣，旣无六义，皆出一时，詞旨繁蕪，倍增慚恐。（文六五一）

又集自十六时至元和七年的詩八百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叙詩寄乐天書云：

旨意可观，而詞近古往者，为"古諷"。

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諷"。

詞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

詞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題乐府"。

声势沿順，屬对穩切者，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为兩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諷为流者，为"律諷"。

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数十詩，取潘子"悼亡"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暈淡眉目，綰約头鬟，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劇怪艳，因为"艳詩"百余首。詞有"古""今"，又兩体。

可見他所矜重的只是"稍存寄兴"的古諷、乐諷、律諷諸諷諭詩，至"悲欢自遣"的悼亡和艳詩，他自己就"倍增慚恐"。

白居易自选他的詩分为四类，与元九書云：

自拾遺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适詩"。

又有事务牵于外，情理动于內，随感遇而形于叹詠者一百首，謂之"感伤詩"。

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韵至兩韵者四百余首，謂之"杂律詩"。

又言分类的旨趣云：

古人云："穷則独善其身，达則兼济天下。"僕虽不肖，常师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鵬，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霧豹，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終之則为

道，言而发明之則为詩。謂之"諷諭詩"，兼济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独善之义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余"杂律詩"，或誘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釋恨佐欢。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时有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可見他所矜重的是諷諭詩和閑适詩，至杂律詩"非平生所尙"，很希望后人为他編集者去掉，則倣效者的致于生出流弊，更非他所願也。

第五章　史学家的文論及史傳文的批評

一　唐初史学之盛

唐初大乎修史。旧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載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云：

> 竊見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遺闕。当今耳目犹接，尙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沒。陛下既受禪于隋，复承周代，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鉴今古？如臣愚見，并請修之。

高祖于是詔令："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齐史；秘書监竇璡、給事中欧阳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

可惜"瑀等受詔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至"貞观三年（六二九），太宗复勅修撰，乃令〔令狐〕德棻与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書监魏徵修隋史，与尙書左僕射房玄齡总监諸代史。"（以上并据令狐德棻傳）

唐初所修諸史，除梁陈齐周隋以外，还有晋書。旧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龄傳，载玄龄于貞观十八年（六四四），“与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晋書，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

至私家著述，“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顧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頗为当时所称。”（令狐德棻傳）而李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于代。”（旧唐書卷七十三李延寿傳）后来也列为正史。

史書是包罗万有的，文学自也在論叙之列，而我們的文学批評史上，自然也要叙述他們对文学的意見了。

二 文学为政治工具說

史学家历覽古今成敗兴衰，其立論頗易側重“致用”，对于文学亦然。作汉書的班固称賦的价值，是“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詳二篇三章六节）。作宋略的裴子野說宋以后的詩賦，“淫文破典，斐尔无功”（詳三篇一章七节）。固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但也与他俩是史学家有关。此外如作梁典的何之元（？——五九三），在艳丽文学盛熾的陈代，批評梁簡文帝的文学云：“文章妖艳，隳墜风典，誦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政忽（疑誤），壯夫不为，人君焉用？”（梁典总論，全陈文卷五）除了因为他是史学家外，一时还找不出别方面的原因。

至唐初的修史，高祖詔令，首謂：“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懲惡劝善，多識前古，貽鉴將

来。"末又云："务加詳覈，博采旧聞，义在不刊，書法无隱。"本此意以論文学，則文学当然是政治的工具了。魏徵隋書卷七十六文学傳序云：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文。然則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則經天緯地，作訓垂范；次則风謠歌頌，匡主和民；或离讒放逐之臣，途穷后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飞文魏闕之下，奋迅泥泽，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姚思廉梁書卷四十九文学傳序亦云：

經亂乐而緯国家，通古今而述善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縉紳之学，咸貴尙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

隋書极力称贊文之"用"，謂"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可見是以文为政治的工具。至梁書更毫不客气的謂文之功用，在"經亂乐而緯国家，通古今而述善惡。"汉末魏初，曹丕曾說"文章經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业，"但他的意旨，似乎重在提出文章的价值（詳三篇一章三节），与此純視为政治工具者不同；自然此純視为政治工具的学說，未必不受曹丕說的影响。

三　豔麗之毒

文学旣是政治的工具，則如不能襄助政治，而反妨害政治，当然要加以擯斥。姚思廉陈書卷六后主本紀云：

自魏正始晉中朝以来，貴臣虽有識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国要务，奸黠左

道，以哀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国，斯亦运鍾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又引魏徵云：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义之本，偏尙淫丽之文，徒長澆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禍矣。

梁書卷六敬帝紀亦引魏徵云：

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聞博达，富贍詞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貞万国，异乎周誦汉庄矣。……其篤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讎；虽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补金陵之复沒，何救江陵之灭亡哉！

魏徵謂“淫丽之文”，直接可以助促亡国；姚思廉謂淫于文学，間接可使“朝經墮廢”。总之淫丽之文，是政治的蟊贼，国家的蠹虫。

这样，自然要拚命的反对“淫丽之文”了。魏徵隋書文学傳序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蓋亦亡国之音乎！（李延寿北史文苑傳序采之）

又群書治要序亦云：

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籠群有，竟采浮艳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学之傳聞，飾雕虫之小技，流蕩忘反，殊涂同致。虽辨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文一四一，又連筠簃叢書本本書）

李百藥北齐書卷四十五文苑傳序亦云：

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屬諸絃管；梁时变雅，在

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令狐德棻周書卷四十一王褒庾信傳論亦云：

> 然則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詞以輕險为宗，故能夺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郑衛。昔楊子云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放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杜甫戏为六絕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縱横；今人徒嗤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王褒庾信的作品，不一定都是"輕險"的、"淫放"的，而唐初的史学家則認为是"輕險""淫放"而反对之、唾罵之。就其批評王庾而言，固有認識不清的錯誤；就其对于文学的主張而言，則由这种認識不清的錯誤，更可以看出他們对于"輕險""淫放"的痛下攻击了。

四　折中的文学論

不过史学家究竟是总覽古今成敗的，以故他們的見解，固然偏重事功，但大体說来，还算宏通。他們反对"輕險""淫放"的文学，但也不贊成質俚无文。魏徵隋書文学傳序云：

>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間，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吳郡沈約，乐安任昉，济阴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并学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瀾浩蕩，笔有余力，詞无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聞其风者，声馳景慕。然彼此好尙，互有异同：江左宮商发越，貴于淸綺；河朔詞义貞剛，重乎气質。气質則理胜其詞，淸綺則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淸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尽善尽美矣。（李延寿北史文苑傳序采之）

这純粹是一种折中論。令狐德棻謂庾信为"詞賦之罪人"，但同

时也反对苏綽等的質朴。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

> 周氏創业,运屬陵夷,纂遺文于旣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效青紫。然綽建言务存質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屬詞有师古之美,矯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李延寿北史文苑傳序亦采之)

也是折中論者。那末究竟要怎样的文学呢?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

>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变化无方,形言則条流遂广,虽詩賦与奏議异軫,銘誄与書論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經百氏之英华,采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調也尙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当,其辞也欲巧。然后䥓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适其变,权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謂"难能",足以逮意矣。

他們知道文学是感情的产物,不惟令狐德棻說:"文章之作,本乎情性。"李百药北齐書文苑傳序也說:"文之所起,情发于中。"(李延寿北史文苑傳序亦采之)但他們所謂情性,和齐梁时代的所謂性情不同。令狐德棻理想的文学,要"旨深""理当",知其所謂"情"和"旨""理"有关。李百药云:"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順四时之序。"則情几乎无所不包了。乾脆的說,他們所謂情,就是理;不过不是死佯佯的說理,而使理感情化罢了。

五 天才与学力

不只文学观采取折中主义,同样对于創作論也采取折中主义——不忽視天才,也不忽視学力。李百药北齐書文苑傳序云:

> 其有帝資悬解,天縱多能,摛黼黻于生知,問珪璋于先覚,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

所能致也。

这是推崇天才了。但接云:

> 縱其情思底滯,关鍵不通,但伏膺无怠,鑽研斯切,馳騖胜流,周旋益友,彊学广其文(疑为聞)見,專心屛于涉求,画續飾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賢乎已也。謂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渾沌无可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乐,遂營目前之务,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

又謂勤能补拙,学可移質。不过审其語意,似謂才尤重于学,必有相当的才,而后学始有济;假使其笨如“渾沌无可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虽“至精久习”,亦不能成功。

李百藥不忽視天才,亦不忽視学力,而謂必有相当的才,学始有济。李延寿則对于天才与学力,虽未明白論列,但也似不忽視天才,亦不忽視学力,而謂縱有天才,終賴学力。他于南史文苑傳論云:

> 暢自心灵,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或未能尽;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习,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

这虽是平淡无奇之論,但我們还找不到可以推翻的理由。的确,一个文学家,必有相当的天才,同时也必有相当的学力。史学家縱覽古今,横观各派,虽然不能不受阶級局限,但一般地說,他們的見解是由归納得来,平淡是其所短,宏通是其所長,对各种学术事业的批評大抵如此,文学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六 文学史观

史学家文論之最应注意者,不在文学观及文学方法,而在文

学史观。因他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学批評家，以故他們的文学观与文学方法虽宏通不頗，而平淡无奇。他們是史学家，以故他們的文学史观，比一般的文学家与文学批評家，較有見解。純粹的文学家及一部分的文学批評家，其对于文学的观察，往往是“横剖面”的，只注意好坏的价值，不注意历史的因素，是靜止的批判，不是变动的探討。史学家历覽古今，則是“縱剖面”的，由古今的不同，而探求前后的轉变。

对文学之作历史的观察与論次者，至著汉書的班固，才比較可观。汉書艺文志詩賦略云：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国，当揖讓之时，必称詩以諭其志，盖以別賢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詩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国，学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讒忧国，皆作賦以风（同諷），咸有惻隱古詩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云，竞为侈丽閎衍之詞，沒其风諭之义。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丽以則，辞人之賦丽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赵之謳，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緣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矣。

他謂賦源于詩，固不甚正确（詳二篇三章七节），但知注重历史的轉变，較过去之只作“横剖面”的評論者，实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自然历史观完成于历史，假使班固生在商周以前，无論如何，是不会有历史观的。但不出于并时的他人，而独出于班固，与他是史学家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班固以后，如詩序，虽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但沒有

对文学作历史的論次(詳二篇一章三节)；如文章流別志論，虽注意各种文体的演变，但未論全部文学的历史(詳三篇三章六节)。对全部文学作历史的論次者，又恰巧出于作宋書的沈約，再有便是震古爍今的論文專家刘勰。(論詩專家鍾嶸曾論五言詩的历史)刘勰之說，已在第三篇第八章第六节叙次，今不复述。沈約宋書卷六十七謝灵运傳論云：

> 民稟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則歌詠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則歌詠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
>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潤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襃刘向楊班崔蔡之徒，异軌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蕪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絕唱高蹤，久无嗣响。
>
>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气質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騷；徒以賞好异情，故意制相詭。
>
>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賈，体变曹王，縟旨星綢，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遺风余烈，事极江左。
>
> 有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辞，义殫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載將百，虽綴响联辞，波屬云委，莫不寄上德，託意玄珠；遒丽之辞，无聞焉尔。仲文始革孙許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氣。
>
> 爰逮宋氏，顏謝騰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

叙平子云，"文以情变"；叙汉魏云，"文体三变"；元康时的潘陆，是"律异班賈，体变曹王"；晋末文学，是"仲文始革孙許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逐处都是占在"变"的观点，以叙次各代文学的变迁。

沈約知道文学之历史的轉变，而不知轉变的原因。同时的刘勰，謂轉变的原因，由于政治，言"歌謠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詳三篇八章六节）。唐初史学家繼之，由是完成一种政治史观。隋書經籍志集部序云：

>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师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物，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澆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鄒枚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見称潘陆，并翩藻相輝，宫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义可观。梁簡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极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习，朝野紛紛，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則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后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营；风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当路执权，逆相擯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

自宋齐的"輝煥斌蔚，辞义可观"，变为梁朝的"宫体"，由于梁簡

文帝的“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极閨闈之內。”后周的文学式微，由于“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风流文雅，我則未暇。”隋代的“草泽怨刺”，由于“高祖少文，煬帝多忌，当路执权，迭相擯压。”总之每次的轉变，都与政治有关。

同書文学傳序云：“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屢变，前哲論之詳矣。”又謂“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在：“江左宮商发越，貴于清綺；河朔詞义貞剛，重乎气質。气質則理胜其詞，清綺則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詠歌”（詳四节）。又謂梁代文学，因为“簡文湘东，启其淫放，”由是“詞尙輕險，情多哀思”（詳三节）。然后接叙周隋云：

> 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隋〕高祖初統万机，每念斲彫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詞藻，犹多淫麗，故宪台执法，屢飞霜簡。煬帝初习艺文，有非輕側之論，曁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書、建东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拟飲馬長城窟，幷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驕淫，而詞无浮蕩；故当时綴文之士，遂得依而正焉。

其叙“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虽未指明出于君主的提倡，然归之于士大夫的領导；至梁周的浮艳，隋代的斲彫为朴，則皆鮮明的謂由于君主的好尙不同，可見也同于經籍志的意見，也是政治史观。

此外若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李延寿北史文苑傳序（此鈔周書），其对文学之史的叙述，更詳于隋書，而其历史观也是政治的观念論者，为省篇幅起見，不一一征論了。

七 史与文

在周秦兩汉，史与文是营共同生活的，而且是亲爱之极，凝

成一体。論語雍也篇云:“質胜文則野,文胜質則史。”韓非子难言篇亦云:“捷敏辨給,繁于文采,則見以为史。”可見文史不分。汉代以“文学”括示学术，以“文章”括示文学，而汉書公孙弘傳贊云,“文章則司馬迁相如”。又云“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詳二篇二章三节)。史学家司馬迁,校讐家刘向，居然与司馬相如王褒同以文章見称,足征史与文仍不分家。这种观念,到魏初犹然，所以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云:“能述文著作,是謂文章,司馬迁班固是也。”(詳三篇一章一节)

到六朝,文日趋于詞彩华美,吟詠性情;史因載言記事，不能随文轉变。当然这时的史也較以前重辞藻，但究不及这时的文的更重辞藻;至实質之一主記事,一主緣情,更絕不相同。嗜趣既殊,自容易弄得感情破裂,由是不复能繼續同居，而宣告离异。宋文帝立四学,除以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外，又以何承天立史学，謝玄立文学。由是史与文的离异，有了天子作証。梁昭明撰文选,屏史于文外,謂“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异,方之編翰,亦已不同。”由是史与文的离异,又得到太子的判詞。从此直至唐初,虽兩情脉脉,而和好殊难。刘知几史通覈才篇云:

> 昔尼父有言，“文胜質則史”。蓋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較然异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汉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为式也,罗含謝客,宛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复語,盧思道雅好丽詞;江总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蓋不过偏記杂說小卷短書而已,犹且乖濫踳駮,一至于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弥綸一代,使其

始末圓备，表里无咎，蓋亦难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丽淫；于是沮誦失路，灵均当軸，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鉛，多无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术同彪嶠，才若班荀，怀独見之明，負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見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也。

又极力詆斥徐孝穆的"有志梁史"，說："以徐公文体，而施諸史傳，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眞將軍！"蓋史之最主要的作用在記事及載言，文之最主要的作用在載道或緣情。載道則文尙簡易，緣情則詞貴华密。簡易載道，則与史相近，故文史合流。华密緣情，則与史甚远，故文史分家。然文之与史，本相关联，故載道之文，固往往取法于史；而华密之文，亦可使史受影响。不过前者关系甚切，如营共同生活；后者距离較远，似乎反目别居而已。就时代而分，周秦兩汉，文史合流，六朝則文史分家，至唐代古文家起，又取法于史，于是又由分而合。前者的轉变在魏晋，后者的轉变在唐初，所以刘知几犹反对以文为史，而稍后的古文家則又以史为文了。

八 史傳文的批評

史之志趣，本应完全置重于記事載言，无奈据傳說，孔子之作春秋，是在"寓褒貶，别善恶"的，由是后来的史書，亦泰半于記事載言以外，又加上"寓褒貶，别善恶"的任务；而評史者，亦遂以此定史書的好坏。但此与文的关系甚淺，玆可从略。至評論史之文者，如班彪論司馬迁史記云：

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聞广載

为功，論議浅而不篤。……然善述叙事理，辯而不华，質而不俚，文質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書卷七十上，班彪傳）

又云：

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貫穿經傳，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尽，尙有盈辭，多不齐一。若序司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蕭曹陈平之屬，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記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同上）

案汉書卷六十二司馬迁傳贊云：“自刘向楊雄，博及群書，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善，故謂之实录。”則班彪对于史記的贊美本之刘向楊雄。至对于史記的指摘，傳贊亦云：“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广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数千載間，斯亦勤矣。”假設是出于班固，不是出于班彪，則班固的指摘較班彪更甚，原恕的程度亦更深。

班彪父子对于史記虽有挑剔，但究竟推为良史，同时他們的汉書，也确是史記后的第一部史書。就文章而言，史記較簡，汉書較繁。晋代的張輔論班馬优劣，謂班不及馬者三点，关于文章的一点，是：

迁之著述，辭約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煩省不同，不如迁一也。（晉書卷六十，張輔傳）

晋代犹有周汉尙簡的余风，所以張輔称贊史記的“辭約而事举”。同时干宝也贊美左丘明的能以三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見晋紀左傳家）。至宋代則渐趋繁密，所以作后汉書的范曄极力贊美汉書的文字詳贍云：

司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議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

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体，使讀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書卷七十下，班固傳論）

又云：

既造后汉，轉得統緒。詳观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贊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獄中与諸甥姪書）

至唐代又返于簡約，故对于史傳文的見解，亦遂略同于晋，而大殊于宋。史学專家刘知几就是主張"翦截浮詞"的，俟下节詳述，兹姑不論。其余諸人，偶言及史，亦率主簡易。如蕭穎士为陈正卿进續尙書表云：

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举其大略，前讐之議备矣。孔圣沒而微言絕，暴秦兴而挾書罪，虽战国遺策旧章，駮乱于从横；汉臣著紀新体，互紛于表志。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淺者其意煩，岂圣人存易簡之旨，尽芟夷之义也。（文三二二）

張守节上史記正义序亦云：

史記者，汉太史公司馬迁作。……比之春秋，言辞古質；方之兩汉，文省理幽。（文三九七）

司馬貞补史記序也称贊史記云：

事广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尽美矣！（文四〇二）

裴光庭請修續春秋表也非薄晋書云：

文詞繁冗，穿凿多門。（文二九九）

文尙簡易的时候，則对于史傳文也主簡易；文尙繁密的时候，則对于史傳文也主繁密；史与文的关系，于此更可以窺見梗概了。

九 刘知幾的意見

刘知几的史通，其論史而及于史之文者，最要的有四点：

一、繁簡——刘知几前后之一般的評史者，对此問題，亦率

有相当的意見发表，至刘知几的意見，則主張删繁从簡。浮詞篇云：

>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詞，撮其机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又点煩篇，"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笔点其煩（一无煩字）上。"謂："凡字經点者，尽宜去之。"但对于干宝之独美左傳，謂其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張輔之崇馬卑班，謂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馬，則認为都是皮相之言。煩省篇云：

> 余以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犹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又云：

> 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称大，書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繫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儉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兩汉，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勾踐霸世，施于东晋，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仪馬錯，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則邓艾鍾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后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学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紀，事倍于孙习；华謝之所編，語煩于班馬，不亦謬乎？

由此知他主張删繁从簡，但繁簡的标准，并不能籠籠統統的以年代与文字为比例。煩省篇又云：

> 要其字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闕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

不妄載，不闕書，都是取材問題；至修辞的繁簡，浮詞篇云：

>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数句而方浹。案左傳称絳父論甲子，隱言于赵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举斯一事，

则触类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为二叟立傳，全采左班之录，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妇。至于临穴泪下，閨中長歎，虽語多本傳，而事无异說。蓋鳧脛虽短，續之則悲，史文虽約，增之反累，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則刘知几所提倡的簡，不是"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之多少，"而是要去浮詞。所以叙事篇云："文約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又列举"文約事丰"的具体方法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称帝堯之德，标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称"紀信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称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傳紀随会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輅藍縷，以启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卫青傳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責大將軍不荐賢待士。"汉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与紀，并所不書，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毕書，則其費尤广。

上四种是結構方面的簡約法；至字句方面的簡約法，叙事篇云：

又叙事之省，其法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省句的例子，如：

左傳"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为敏。"夫鈍者称敏，則明賢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相反的如：

穀梁(原作公羊,依浦注校改)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則于文殊費,此为煩句也。

省字的例子,如:

春秋經曰:"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相反的如:

汉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无齿。"蓋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煩字也。

此种簡約說的提出,固由于修正干宝張輔一班人的浮淺的簡約說,而最大的因素,則在矯正六朝以来的以駢文作史,所以覈才篇极力反对文人修史,叙事篇又力詆班馬以降的"史道陵夷",說:"其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蔽之者,輒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在刘知几看来,固然"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叙事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載文篇)。故"五經以降,三史而往,"皆"以文叙事"。但"今之作者,……則其立言也,或虚加練飾,輕事彫彩;或体兼賦頌,詞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叙事篇)。由是不能不特別提倡簡約,臚举簡約的方法。

不过以駢文修史,固伤繁蕪;以古文修史,亦伤虚伪。杂說中云: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实,雅而无檢,眞迹甚寡,客气尤煩。尋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綽,至于軍国詞令,皆准尙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于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从风而靡。案綽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矯枉过正之失,乖夫適俗随时之义。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

又杂說下詆周史的"記宇文之言,而动遵經典,多依史汉,此何异

庄子述鮒魚之对，辯类苏張；賈生敘鵩鳥之辞，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則可，施諸实录則不可矣。”然則刘知几的意思，以为史必借于文，但只能“以文叙事”，不能“以事就文”；以事就駢文固然不好，以事就古文也一样不好。

二、語文——六朝以降的以文为史，不惟有繁蕪之弊，且有改語为文之弊。言語篇云：

> 夫三傳之說，旣不习于尙書，兩汉之詞，又多違于战策，足以驗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識，記其当时口語，罕能从实而書，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爱子長者，則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見于魏晉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譏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詞，虽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他不惟指出記当时口語用古文之过失，而且指出这种过失的原因是由于时代观念的錯誤：

> 盖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职！”汉王怒酈生曰：“竪儒！几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歎卫玠曰：“誰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后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淸雅，而下之兩句，殊为魯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質。夫天地長久，风俗无恒，后之視今，亦犹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同上）

不过刘知几虽能戳破楚汉古文的紙老虎，却震駭于战国以前的古文的紙老虎，謂“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竪之謠也；‘山木’‘輔車’，时俗之諺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謳也；

'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独能温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言語篇)实則也是当时的"流俗鄙俚之說",不过"春秋世隔,事已成古,已古者卽謂其文"耳。

三、摸拟——天地間沒有不含摸拟的創作,特别是史書本来"以述为作",所以摸拟尤不能免。摸拟篇云:

> 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
> 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貌同而心异者,如譙周古史考拟春秋,書"秦杀其大夫李斯";干宝晋紀拟春秋,書"葬我某皇帝"之类。昧于"世异則事异,事异則备异"之义,"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无識者矣!"

至貌异而心同者,"則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如"左傳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干宝晋紀拟之,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見者多哭,賊惧,帝崩。'"又"当时所記或未尽,則先举其始,后詳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鍾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鍾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述索虜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浦云二字疑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謂貌异而心同也。"

四、虛实与曲直——史文尙直,亙古如斯,刘知几亦极力提倡直,反对虛。載文篇云:

> 汉代詞賦,虽云虛矯,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則伪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考此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失形,而言必凭

虚。夫鏤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

但"語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鈎，反封侯。'……況史之为务，申以劝誡，树之风声，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乱主，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則賊臣逆子，淫君乱主，安能不威迫利誘，使之不能直書。固然"烈士殉名，壯夫重气，宁为蘭摧玉碎，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气直書，不避强御；韋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書篇)。但"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不畏乎？"(全唐文卷二十四，上蕭至忠論史書)由是"直書"之史极少，"曲笔"(史通有直書篇，又有曲笔篇)之文极多。眞的"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惧；今之書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曲笔篇)后来所謂"微詞"的笔法，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吧！

第六章 早期的古文論

一 古文的興起

古文不始于韓柳，而成于韓柳，所以現在称韓柳以前的古文为"早期的古文"，其文論为"早期的古文論"。

古文的兴起，陈振孙以为始于他的貴华宗子昂（見直齋書录解題卷十六），董逌以为始于元結（广川書跋磨崖碑），胡应麟以为始于李华蕭穎士（少室山房笔叢，九流緒論卷中），赵翼以为始于姚察（二十二史劄記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又以为始于独孤及（同書卷二十，古文不始于韓柳条）。实則还可以上推一百多年，因为苏綽已經在西魏之末（約五五〇年前后），仿尚書作大誥了，柳虬也在那时作文質論，以思調和今文古文之爭了（詳三篇十章二节）。刘知几史通杂說中云：

> 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綽，至于軍国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从风而靡。

观刘知几說，知魏末周初的仿古为文，已形成一时的风尚；观柳虬謂"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引見三篇十章二节），知苏綽及其附和者已打出"古文"的旗帜来了。

后来首先反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諤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結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

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

以常理論，刘勰主"原道""征圣""宗經"，应当是唐代古文的領导者。然以鄙見所知，称論其書者，只有盧照鄰南阳公集序和刘知几史通自叙㊀，眞正宗經載道的古文家，反絕少論及。自然我不敢說唐代的古文家都沒有讀过文心雕龙，但漠視似是事实。这也足以証明他們繼承的是北朝系統，对南朝只是一味的攻击；所以与他們同調的刘勰，也遭了"池魚之殃"，不能打动他們的注意与同情。

二　李諤王通的攻擊六朝文

任何学术的发生都应了社会的需要，任何学术的过分的发展，又率流于窳敗，而失去与社会的平衡，形成改革的对象。六朝的繁密緣情的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产生，这样的滋長，又这样的被人揚弃。在齐梁，如刘勰裴子野梁元帝諸人，已对之相当不满；但他們自診己病，当然多所蒙諱，不能徹底改革。北朝則不同了，繁密緣情的文学，他們似乎始終沒有正式的接受。当南朝瘋狂的創造繁密緣情的文学的时候，北朝的苏綽已提倡古文了，魏收已提倡有用之文了，楊遵彥与顏之推已反对文人无行，提倡宗經載道之文了（詳三篇十章各节）。一旦南北統一，南朝文学和他們发生了直接关系，固然一方面可以如隋書文学傳序所云："周氏吞并梁荆，此风（南朝文风）扇于关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

㊀ 盧照鄰南阳公集序云："近日刘勰文心，鍾嶸詩評，异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文一二八）刘知几史通自叙云："詞人屬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史通本書，又文二七四）盧照鄰是貶議，刘知几是称贊。忆全唐文，晚唐亦有人言及，匆促未及鈔記，茲亦不及复案矣。

忘返。"但另一方面此种格格不入的文学的襲入，适足作了他們的試金石，使他們由反对此种文学，更充实他們的古文文学。隋文帝的于"开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华艳，付有司治罪"（李諤上書文），便是这种情形之下的当然措置；而李諤的上文帝論文体輕薄書，也是这种情形之下的当然产品：

> 臣聞古先……上書献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証理；苟非懲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騁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貴賤賢愚，唯务吟詠。遂复遺理存异，尋虛逐微，竞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祿利之路旣开，爱尙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总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誕为淸虛，以緣情为勳績，指儒素为古拙，用詞賦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軌模，構无用以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华壤，遞相师祖，久而愈扇。（隋書卷六十六，李諤傳）

李諤攻击六朝文的"遺理存异，尋虛逐微"，稍后的王通（五八四——六一八）則又由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六朝文人。他的文中子事君篇云：

>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庄、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刘〕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东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总、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

然独称贊顏延之、王儉、任昉，謂"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又称贊曹植，謂"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則其攻击六朝文人，实因不满意六朝文人的傲誕貪怨，淫冶繁碎，假使"約以則"，或"深以典"，則不惟不攻击，而且贊揚。所以房玄齡問文，他答以："古之文也約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以上亦事君篇）而內史薛公向他說："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他便离席而拜曰："敢賀文人之知过也。"（述史篇）

"約以則"或"約以达"是所提倡的"古之文"的形式，至实質則是以理义化民：

子曰："〔楊〕素与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苏〕夔与吾言終日，言声而不及雅；〔李〕德林与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所以忧也！"（王道篇）

子曰："学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天地篇）

又推重陈寿范宁，謂"陈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削异端；范宁有志于春秋，徵圣經而詰众傳"（天地篇）。房玄齡問史，他告以"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事君篇）。史文本有密切关联，特别是所謂古文，本是宗經学史，則由王通的評史，也可以知其評文了。

不过以理义化民的文論，李諤上文帝論文体輕薄書也已启其端緒。其言云：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視听，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訓人之本；詩書礼易，为道义之門。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讓。正俗調风，莫大于此。

但李諤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諤在先，故所言甚簡；王通在后，故所言較詳。一由于李諤本不是了不起的人

物，其上書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則是以道統自負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論当然要比較深刻。

三　唐初四傑的反对淫巧文

四傑中，駱賓王（？——六八四）无論文之言，但既与王勃、楊炯、盧照鄰三人为文友，志趣又很相近，則其对文学的意見，当然不甚相远：故茲以四傑并論。

有的人說批評是創作的尾随者，就文学的部類而言，似有点相象（并不全是如此）；就文学的兴革而言，則絕对相反。批評之尾随創作，眞是追踪而至；創作之尾随批評，則有时瞠乎落后。这因为批評是一种意見，社会轉变，它馬上可以随之轉变；創作則需要長时間的修养，不能一蹴而至，因亦不能一蹴而变。职此之故，所以李諤的用六朝文体的文学以攻击六朝文体，唐初四傑的一方面創作輕薄淫巧的文学，一方面又攻击輕薄淫巧的文学，都可以得到解釋，而不必奇异了。

称为六朝文，是以时代名，如提示內容，則可名之为“淫巧文”。李諤王通距六朝甚近，蓋可以亲見六朝文的坏影响，所以特别提出并攻击六朝的文学与文人。四傑距六朝較远，不能亲見六朝文的坏影响，而只感覺到社会上不需要象六朝那样的輕薄淫巧之文，所以由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一切淫巧文。楊炯王勃集序云：

>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罗之跡。文儒于焉异术，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賈馬蔚兴，已亏于雅頌；曹王傑起，更失于风騷。僶俛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陆奋发，孙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

鮑，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邱墳，或独徇波瀾，不尋源于禮乐。会时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文一九一)

又贊美王勃的"長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綜淺术，无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說："积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同上) 又称述王勃之对于改革文学的志趣，是：

嘗以龙朔初載，文場变体，爭構纖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帶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气骨都尽，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同(上)

王勃自己亦云：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为；劝百諷一，楊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矯正末流，俗化資以兴衰，国家由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自微言旣絕，斯文不振，屈宋导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风于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为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貴之而江东乱。虽沈謝爭騖，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止周陈之禍。于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用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文一八〇，上吏部裴侍郎启)

又云：

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傳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經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緣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耻为君子；武皇載出篇章，仅称往事，不其然乎！(文一八二，平台秘略論十首，文艺三)

他們攻击纖微雕刻、緣情体物的文学；慨歎"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力主为文須"甄明大义，矯正末流，"俾"俗化資

以兴衰，国家由其輕重，”“蹈前賢之未識，探先圣之不言，經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張左于神交。”（楊炯王勃集序）知他們在希望以文章經国，反对以文章言情。裴行儉說他們“华而不实”（見文二二八，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新唐書文艺傳序也說：“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为之霸。”王勃因作平台秘略論見爱重于韓王（見新唐書本傳），在平台秘略論說君子为文，“宜于大者远者，非緣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在山亭兴序更說：“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之書。”（文一八〇）但“时諸王斗鷄，勃戏为文檄英王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则岂止是“緣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直然就是助長“末流”的“澆淫”之作了。所以就四傑的为人与文章而言，实不应有上述的言論；而所以有上述的言論者，則泰半是时代意識的表現。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

> 国家应千載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靜默，阴阳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庇生人，黜非圣之書，除不稽之論。牧童頓顙，思进皇謀；樵夫拭目，願談王道。

蓋唐初欲稳定社会，收拾人心，由是以文教治民經国，以詩賦粉飾太平；所以文重道德教化的实質，詩重声韵格律的形式。文重道德教化，由是成功簡易舒散的古文；詩重声韵格律，由是成功儷对精密的律詩（詳一、二兩章）。但另一方面齐梁陈隋的淫巧之文，已由历史的領导，深深的刻入文人的腦府，造成文学的作风。四傑正当其时，所以一方面作“沿江左余风，絺句繪章，揣合低卬”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作反六朝及其他“緣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論。楊炯的王勃集序云：“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规而綴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则薛令公盧照鄰似亦抱有同样的改革文学志趣。盧照

鄰南阳公集序云：

> 自获麟絕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时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后，直至賈誼相如。兩班叙事，得邱明之风骨；二陆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体，共許音韵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艳发。精博爽丽，顏延之急疾于江鮑之間；疏散风流，謝宣城緩步于向刘之上。北方重濁，独盧黃門往往高飞；南国輕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墜。嗟呼！古今之士，遞相毁譽，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三都既丽，征"夏鼉"于上林；九辨已高，責"春歌"于下里。躇駮之論，紛然遂多！（文一六六）

固然称贊周秦兩汉的詩文，但也揄揚魏晋六朝的詩文。他非薄"古今之士"的"遞相毁譽"，說："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則对于王楊的攻击六朝及其他的"緣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当然不以为然。楊炯說他是王勃的改革文学的知己，而他自己的言論又似不滿意于王楊的改革文学，很显然的是由于时代的矛盾，又鑄成个人的矛盾。

我在前边說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在楊炯所作王勃集序里又找到証明了。他說王勃"長风一振，……后进之士，翕然景慕。……妙异之徒，别为縱誕，專求怪說，爭发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客气以广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漸成河朔之制。"虽然他說这是"謬相称述，罕識其源"；但唐初文学之逐漸以"北"代"南"，則由楊炯所述，益知是历史事实了。

四　陈子昂与盧藏用的提出載道說

本来苏綽等已在魏周之間提倡古文了，但后来因为南北統一，虽有計划的以北朝文学代南朝文学，而南朝文学的勢力却亦

随之侵入北朝文学的領域，因此古文的完成反倒迟了几十年。李諤王通都不是文学家，以故尽管反对六朝文，提倡教化文，却不能完成古文。初唐四傑虽反对"緣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而所作則大半是"緣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当然更不能完成古文。四傑前后的史学家，也反对淫艳之文，但同时又反对質俚之文（詳五章三，四兩节），虽然給后来的古文家許多提示，却也沒有完成古文。韓愈薦士詩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但子昂对于詩确是提出了改革計划（詳三章一节），对于文只是作品漸趋于古，并沒有关于古文的文論。他的朋友盧藏用（龙朔？——开元初）为他作文集序云：

>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反魯，迺删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孔子歿二百余岁而騷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賈誼司馬迁为之傑，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長卿子云之儔，瑰詭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顧。其后班張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遺风余烈，尙有典型。宋齐之末，蓋顦顇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繼踵而至，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变。（文二三八）

陈子昂之对于文章的志趣可以于此藉知梗概。至盧藏用則不惟在此序提倡孔圣之文，反对宋齐之文，在答毛傑書又云：

> 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于道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后黜，卒罹忧患，負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顔复講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説；老而弥篤，犹憐薄暮之景，加我数年，庶无大过。（同上）

毛傑与盧藏用書亦云："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文二

三九)則虽未將学道与为文打成一片，而已一方面要改革不道之文，一方面又講明道德了。

五　蕭穎士李華的宗經尙簡說

陈盧以后的改革文体者有富嘉謨与吳少微。旧唐書文苑傳卷中云：

>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与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为宗，气調漸劣。嘉謨与少微屬詞皆以經典为本，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富吳体"。

可惜他倆不惟沒有文論傳后，而且留下来的文章，根本极少。全唐文卷二三五載富文四篇，吳文六篇，都不是有价値的文章。惟唐代的古文，本取法經史，他倆旣"屬詞皆以經典为本"，則如表彰古文运动的功臣，他倆也是不可埋沒的。

陈子昂的文章虽漸趋于古文，而沒有关于古文的文論；盧藏用有关于古文的文論，而所作古文又不很多(全唐文卷二三八載十三篇)；富嘉謨与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为本"，在古文运动史上似占一重要阶段，但旣无文論，流傳的文章又很少，可推知他們的成就及力量不很大。他們以后的蕭穎士及李华，便眞可占一重要阶段了。

蕭穎士与李华是同年，都是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进士。他倆是古文运动中的左翼健將，对过去的文学，宁可矯枉过正，不肯降意妥协。他倆的改革文学目标，一是宗經，二是載道，三是尙簡。

一、玆先述宗經。蕭穎士自述他的志趣云：

> 僕有識以来，寡于嗜好，經术之外，略不嬰心。（文三二三，贈韋司业書）

李华亦云：

>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繫乎时。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义浸以微矣。（文三一五，贈礼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韓愈謂“非三代兩汉之書不可观”，以故不惟尧章六經，亦取法史汉。蕭李則非六經不敢观；六經以外，兼取思孟，因为是“六經之遺”。自战国以下的文章，皆所排斥，至史汉及其他兩汉的書文更不用説了。李华反对屈宋以降文。蕭穎士自言“僕平生为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議，必希古文；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似乎不卑弃兩汉。但又云：

>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托微詞以示褒貶，全身远害之道博，懲惡劝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礼尽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有汉之兴，旧章頓革，馬迁唱其始，班固揚其风，紀傳平分，表志区别，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貶之文廢矣。（贈韋司业書）

則对兩汉的史文，也很卑視，而所宗仰者当然只有經术。固然宗經之説，不始于蕭李，較远者且不必談，稍前的富嘉謨与吴少微，就是“屬詞皆以經典为本”的；但象蕭李这样只知宗經，經以外便一律薄弃，富吴是否如此不可知，以前以后的古文家皆不如此。所以蕭李是古文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其理論也是左翼理論。

二、次述載道。为什么要宗經，因为經上載有圣人的道术，故宗經为的明道，作文为的載道。蕭穎士为陈正卿进續尚書表云：

> 孔圣沒而微言絕，暴秦兴而挾書罪。虽有战国策書旧章，駁杂于

縱横；汉臣著紀新体，互紛于表志，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淺者其意煩，岂圣人存易簡之旨，尽芟夷之义也。（文三二二）

贈韋司业書自述抱負云：

丈夫生遇昇平时，自为文儒士，縱不公卿坐取，助人主視听，致俗雍熙，遺名竹帛，尙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此其道也。岂直以辞場策試，一第声名，为知己相期之分耶？

又說他的著作，“若不足征道，未相借，請見还此本，謹俟燒焚。”其主文以載道，毫无疑义。

李华呢，于楊騎曹集序云：

开元天宝之間，海內昇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以是詞人材碩者众。然將相屢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体道者寡矣。夫子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学，四者无人兼之，惟德尊于艺，亦难乎备矣。（文三一五）

不惟在这里慨歎开元天宝間的詞人，“体道者寡矣”，又于崔沔集序云：“反魏晋之浮誕，合立言于世教，其于道也至乎哉。”可見也是主文以載道的。他虽然知夫子門人，尙难兼备四科，何況后人，但却希望有“行修言道”（楊騎曹序）之文。可見他在努力將道德和文学，冶为一爐。

不过蕭穎士所注重者偏于道术，李华所注重者偏于道德。所以蕭穎士“思欲依魯史編年，著历代通典”，庶几“孟浪之言，一朝見信”（贈韋司业書）。虽宗經重道，却有事功家的意味。贈韋司业書希望“不以为狂而亮其志”，正可見其近于狂者。李华則主“文顧行，行顧文”（崔沔集序）。謂：“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詐。”（同上）又說：“讀書务尽其义，为文务申其志；义尽則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則君子之言信矣。”（楊騎曹集序）

三、复次述尚簡。蕭穎士慨歎"战国策書旧章"及"汉臣著紀新体"的不合"圣人存簡易之旨，尽芟夷之义，"知他理想的文章是"存簡易"，"尽芟夷"。李华有質文論(文三一七)，虽不是專就文章而言，但文章亦当然在內。发端就說：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从。

又提出易簡的方法是："始于学习經史；左傳、国語、尔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很显然的在希冀以經史的簡易之文，代魏晋以来的繁密之文。

任何学术的改革，例先有消极的破坏，然后才有积极的建設，而最先的建設者，又率偏于极端，不合中道，必待以后的折中补正，始能与社会相融洽，始能成功一种新的学术。就古文的理論而言，李諤王通以至四傑，其消极破坏者，已奏敷功；其积极建設者，則实在可憐。陈子昂缺乏理論的文章，富吳也沒有文論傳后，故蕭李实是提出积极建設的最初功臣；而其所建設，則眞是太极端了，太偏枯了。

六　獨孤及元結的折中意見

修正蕭李之过于极端，过于偏枯的是独孤及(七四四——七九六)和元結(七二三——七七二)。独孤及自称"其先刘氏，出于汉世祖光武皇帝之裔，"大概是妄攀高門。又說他的远祖"穆生进伯……迁居独孤山下，生尸利，單于加以谷蠡王之位，号独孤部。"及"罗辰从魏文帝迁都洛阳，遂为司州洛阳人，始以其部为氏"(文三九三，唐故朝大夫潁川郡長史贈秘書监河南独孤公灵表)。可知原是胡人。至元結为拓跋氏之后，更当然是胡人了。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与南朝的地方經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

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結，更直是胡裔，此中消息，不难窺知了。

独孤及尝受知于李华，他称贊李华的文章云：

> 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为泉源，攄情性以托諷，然后有歌詠；美教化，献箴諫，然后有賦頌；悬权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論議。至若記序編录銘鼎刻石之作，必釆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风雅之旨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于詞。于时文士馳騖，飆扇波委，二十年間，学者稍厌折楊皇荂，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文三八八，檢校尙書吏部員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

又告訴他的弟子梁肃云："为学在勤，为文在經；勤則能深，經則可行。"又云："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华而不实，君子所醜。"（文五二二，梁肃祭独孤常州文）知他也是主張宗經載道的。但对蕭李的极端尙簡的主張，則似有所补正。他說：

>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故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檝而后济。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蕩而不返。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实愈喪。及其大坏也，儷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四声八病为桔桊，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皋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驅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蘭为舟，翠羽为檝，翫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李公中集序）

又云：

> 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文之微也；粲于歌頌，暢于事业，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比兴宏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文三八八，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录序）

又述說蕭府君（立南）的話云："楊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

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郑相夺，盍为之中道乎！”称贊蕭府君的文章云：“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丽而不艳。”（同上）告梁肅云：“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迁班固云尔。”（文五一八，梁肅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蕭李皆崇尚簡易，他则虽嫌“屈宋华而无根，”而亦嫌“荀孟朴而少文，”由是取法于蕭李所認为复杂漫疏的史汉。足見他虽謂“必先道德，而后文学”（同上），而与蕭李相較，便有点注重文辞了。

元結在唐代古文家中，别具一种风格，頗有小品文的味道。他有詩論而无文論，惟于文編序，自言他的文章可分为兩期。第一期：

> 天宝十二年，漫叟（即結）以进士获荐名在禮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編納于有司。当时叟方年少，在显名跡，切耻时人諂邪以取进，姦乱以致身，徑欲塡陷穽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优游于林壑，怏悵于当世。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順。

第二期，自天宝十二年，至大历二年，中間共十五年：

> 更經喪乱，所望全活，岂欲跡参戎旅，苟在冠冕，觸踐危机，以为荣利。蓋辞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閔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世劝俗之所須者歟？（文三八一）

虽未如蕭李独孤所言，为文必須宗經載道，但“劝以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亦近于宗經載道。元結謂其文为“救世劝俗之所須，”可知古文家的志趣，要在“救世劝俗”；既“救世劝俗”，在那时，便只有提倡宗經載道的文学了。

七 梁肅的提出文气与李观的重視文辞

蕭李主張宗六經，尙簡易；虽是古文运动的应有的提議与应有的阶段，但他們実与道德家相近。至独孤及元結轉返于稍重修辞，始逐渐走上文章之路。独孤及的弟子梁肅（七五三——七九三）及李华的儿子李观，虽仍主宗經載道，而对文章的修辞，又較独孤及元結更为重視了。

文气說是早已有的，而古文家的講究文气，則始于梁肅。他說：

> 文本于道，失道則愽（一作傳）之以气，气不足則飾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則文斯敗矣。（文五一八，补闕李君前集序）

又称贊李翰的文章說："其气全，其辞辨，馳騖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間。"又說："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之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隨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閡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同上）

唐代古文家所謂文气，与古所謂文气不甚同：古所謂文气，如曹丕所謂"气之清濁有体"，指先天的体气才气而言；刘楨所謂气势，指文章的声势气調而言；刘勰所謂养气，在"清和其心，調暢其气。"古文家所謂文气，与他們完全不同，盖指由道以培养的正气而言，所以謂"道能兼气"。就此而言，似与孟子的养气相似。不过孟子的养气，虽結果可影响到他的文章，而其目的本不在此；古文家虽是以道德为根本，然究竟是文章家，自偏于为文而养气。所以說："文本于道，失道則傅之以气，气不足則飾之以辞。"——而梁肅之由重視道德，轉趋于重視文章，是很明显的了。

梁肃謂"失道則博之以气，气不足則飾之以辞。"至李观則真重視辞了。陆希声唐太子校書李观集序云：

文以理为本，而辞質在所尚。元宾（观字）尚于辞，故辞胜其理；退之尚于質，故理胜其辞。退之虽穷老不休，終不能为元宾之辞；假使元宾后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文八一三）

至其自言，亦在在足以証明比以前的古文家，重視辞藻。与右司赵員外書云：

羊舌大夫謂鬷明曰："子不言，吾几失之矣。"仲尼又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則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文五三三）

又云：

今之人学文一变訛俗，始于宋員外郎，而下及严秘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为經，呀呷盛称，可歎乎！然世人之庸，而拟議于数公，其犹人与牛馬也。以观視諸公，則皆师延之余音，況能爱世人之蝇蚊乎！夫以观之文言于世人，得非会群聾而鼓五音，曷知其由来哉！

与膳部陈員外書亦慨歎"文之难言也久矣！是使为文者紛綸，无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从，随声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开，荆璆无价，珷玞有輝"（文五三三）。由是希望陈員外既"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师，"当"扶微削訛，可以厚名；殫誉垂哀，可以辨文。"处处为文而言，不为道而言。固然他上陆相公書，不滿意于"相国昔以章句知之，今固亦章句待之"（文五三三）。然正可証明他的成就是章句之学。（指辞章而言，非註釋家所謂章句）与膳部陈員外書不滿意于有司的"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而代替"詞賦瑣能"者，是文章，不是道德。帖經日上侍郎書謂"才不由經，文自謬矣"（文五三三），知他也主宗經。但他以前的古文家之宗經，固亦出于为文，而亦出于为道；他的宗經，則在"由經之才，文自見矣。"至报弟兌書，更謂明經为文是兩件事，言"明經世

傳，不可隳也；文貴天成，不可强高也。二事并良，苟一立可矣，汝擇处焉”（文五三三）。与帖經日上侍郎書所言合而观之，显然是抱經以为文，不是为文以傳經；是取經之文，不是取經之道；宗經是为文的敲門磚，門一敲开則磚可以不要了。

八 古文理論家之柳冕的文論

柳冕（貞元中官御史）傳下来的文章只有十四篇（据全唐文卷五二七），而以“論文”名者有六篇之多，其余除靑帅乞朝覲表、皇太子服紀議、請筑别庙居献懿二祖議、請定公主母称号狀四篇应酬或公事文字外，亦都实質是“論文”之文。則他虽无赫赫之名，而吾儕亦可称之曰“古文理論家”了。

他的文論，最要者有三点：

一、情道一元論——我們通常分文学为“緣情”“載道”兩大派，这是比較的說法，实則情每需乎道，道亦本于情；不过到了极端的載道与极端的緣情，則似乎各不相容而已。柳冕答荆南裴尙書論文書云：

> 猥辱来問，曠然独見，以为齿髮漸衰，人情所惜也；亲爱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圣与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于仁义，是殆于学也；忘情于骨肉，是殆于恩也；忘情于朋友，是殆于义也。此圣人尽知于斯，立教于斯。今之儒者苟持异論，以为圣人无情，誤也。故无情者，圣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穷达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义之道，斯須忘之，斯为过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为乱矣；朋友之情，斯須忘之，斯为薄矣。此三者，发于情而为礼，由于礼而为教。故夫礼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于道，故来書尽于道，是合于情，尽于礼，至矣。

这是柳冕的一大发現。但这一大发現，实是时人极端崇道卑情，

拆散道情的当然反应。盖情虽需于道，而六朝的淫放之情，則已背乎道，物极必返，由是激而为唐代古文家的崇道卑情的情道二元論。然离情之道，必矯揉枯寂而不成其为道，由是又激而产生柳冕的情道一元論。

二、文教关系論——隋唐的提倡古文，本以于时的以文教民，以文化世为背景，因此自李諤王通以来的文論，无不时时以領导教化为言；就是所謂宗經载道，亦实是为的教民化世。至柳冕遂特别对此問題提出討論。答荆南裴尙書論文書云：

>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經，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楊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文。道不及文則德胜，文不及道則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艷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

与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亦云：

> 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已降，則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則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則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則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嗟乎，关雎兴而周道盛，王泽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兴矣。天其或者殲往时之乱，为圣唐之治，兴三代之文者乎？（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亦有此类言論）

他認为文教应当合一。就历史而言，三代是文教合一的，自屈宋以至梁陈是文教分立的。对于唐代文学，希望"兴三代之文"，就是仍返于文教合一。

他以前的古文家，都企图以文教世，以文变俗，他則謂文因

于世，文生于俗。杜相公謂唐初文章承徐庾之弊，房杜为相，不能反之于古。柳冕答書云：

> 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眞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学，困于儒墨；賈生之才，廢于絳灌。道可以济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变风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风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则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独房杜乎？相公欲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他認为文章之坏，由于世俗之坏，故"欲变其文，卽先变其俗。"准是而言，他似已知道了某种社会，当然要产生某种文学的道理，較以前的倒因为果的以文敎世的言論，切实多了。但他虽知道了以文敎世的錯誤，而代替的方法却是以經敎世。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續云：

> 变之之术，在敎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維尊經术，卑文士；經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

以經敎世移俗的权柄，操之人君，而不操之人臣，所以說"在圣君行之而已"。又說："蕭曹虽賢，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詞；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是则风俗为尙，系在时王，不在人臣明矣。"和以文敎世的論調，沒有多大的区别；不过旁人主宗經为文以变俗，他主尊經变俗以为文而已。

三、才与气——梁肃已提出文气問題，柳冕对此問題的探討尤詳。他也主張气源于道，"文不及道则气衰"，但与才亦有关系。答楊中丞論文書云：

> 来書論文，尽养才之道，增作者之气。推而行之，可以复圣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

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气衰矣，风俗之不养才病矣，才少而气衰使然也。故当世君子，学其道，习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尽，其气益衰，其教不兴，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气，从壮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夫君子学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燕，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无病。故无病則气生，气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同上）

梁肃只重以道养气，柳冕則一方面謂气非才莫办，除上文外，又于答郑使君論文書云："噫！文之无穷，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为文則蹶，彊而为气則竭，彊而成智則拙。"一方面又謂道可养气，所以劝楊中丞兄弟亟亟行道，謂如此則无病，"无病則气生，气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答郑使君論文書亦云："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散而为气。眞則气雄，精則生气。"假使說梁肃所謂气是一元論，則柳冕所謂气是二元論。

九 權德輿的二尙二有說

古文的兴起是为的載道，所以各家都重視道，加上蕭李倡簡，梁柳倡气，到了权德輿（七五九——八一八），又益之以通，完成"尙气、尙理、有簡、有通"的文說。所作醉說云：

予既醉，客有問文者，濡笔以应之云：尝聞于师曰，尙气、尙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是，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于全，然則得之矣。失于全，則鼓气者类于怒矣，言理者伤于懦矣，或猖猖而牙口，跕跕以墮水；好簡者則琐碎以譎怪，或如讖緯；好通者則寬疎以浩蕩，龐乱憔悴；岂无一曲之效，固致远必泥。苟未能朱絃大羹之遺音遺味，則当鐘磬在悬，牢醴列位；何滹甂丸粲而耽粔餌，况顚命而伤气。六經之后，班馬得其門。其或磬如中郎，放如漆園，或遒拔而

峻深，或垣夷而直温。固当漠然而神，全然而天，混成四时，寒暑位焉。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質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虽数字之不为約，虽弥卷而不为繁。貫通之以經术，弥縫之以淵元。其天机与玄解，若坊鼻而斲輪。岂止文也，以宏諸立身。不如是，則非吾党也，又何足辯云？（文四九五）

这种"漠然而神，全然而天"的文論，当然受道家，特别是庄子一派的影响，但其取法的却是自然天象。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云：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灵，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动，通万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备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义入神，英华发外，著之話言，施之宪章，文明之盛，与天地准。（文四九三）

中嶽宗元吳尊师集序亦云：

道之于物，无不由也，无不貫也，而况本之元覽，发为至言。言而總道，犹三辰之丽天，百卉之丽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与造物者为徒。其不至者，遣言則华，涉理則泥，虽辯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文四八九）

前文由自然推及文明，后文由文理溯于天地，总之是文法自然；而謂"不至者，遣言則华，涉理則泥，"可知二偷二有的文論也是植基于自然了。

十　吕温独孤郁等的天文説及人文説

植基自然的文論，并不始于权德輿，其远源当然可以上溯于周易所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唐人的提出，則始于唐初的史学家。魏徵隋書文学傳序云：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

德，著焕乎之文；然則文之为用，其大矣哉！

李百藥北齐書文苑傳序亦云：

夫玄象著名，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

姚思廉陈書文学傳序亦云：

易曰："覌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也。"

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亦云：

兩仪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陈，書契有作，人文詳矣。

所謂天文不同于后来的天文算术的天文，而是指自然界的文彩；所謂人文不同于西洋的人文主义（Humanism），而是指社会上的文化。为文而取則天文，自易成功自然主义；为文而取則人文，又易至于崇尚功用，所以史学家一方面主張折中的文学，一方面又視文学为政治的工具。（詳五章二至四节）

至古文家的采用此說，則莫早于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書云：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谷草木，生于天地而肖天地，圣賢又得其灵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

稍后的权德輿李舟也持相类的論調。权德輿的話已引見前节，李舟独孤常州集序云：

傳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数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于草木，不能无文也，而况于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兽之文也；华叶彩錯，草木之文也。天无文，四时不行矣；地无文，九州不別矣；鳥兽草木无文，則混然而无名，而人不能用之矣。无文則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誡，文之时

用大矣哉！（文四四三）

古文家之言文，虽也离不开政治，但其观点与史学家微有不同。大体說来，史学家注重事功，古文家注重道德。因此，古文家虽采取史学家的天文說与人文說，而史学家本据以建設折中主义及政治工具的文論；到了古文家手里，則据以建立簡易載道說，攻击繁密緣情說。所以崔元翰謂"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李舟謂"无文則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誡。"权德輿更謂不蘊道之文，"遣言則华，涉理則泥，虽辨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見前节）。又于徐泗濠节度使贈司徒張公文集序引左傳所載單襄公之言云："忠、文之实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文四八九）很显然的是据天文之文和人文之文，以定文章之文的应簡易載道，不应繁縟緣情。

顧況（至德进士）作文論，結云：

> 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万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礼乐，不失于正，謂之为文。

也是由天文，地文，以証人文。而发端卽云：

>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协和神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为龙为光。（文五二九）

則所言人文虽不限于文章，而表現于文章者，自应"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讓"，自应"文顧行，行顧文。"所以呵斥"吟詠风月"的文人，謂"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风月，此其所以乱文也！"

呂温（七七二——八一一）作人文化成論，也是以易所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观点，扶持教化，反对綺靡雕虫之文：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义者也。尝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气节宣；或阴闔而阳开，或天經而地紀，有圣作則实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义事君，予違汝弼，献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职，九流异趣，百揆同归，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济猛，猛以济寬，此刑政之文也。乐胜則流，過之以礼；礼胜則离，和之以乐；与时消息，因俗变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义，其在兹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时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惑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仪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昇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为人文，則秦汉魏晋，声明文物，礼縟五帝，仪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为人文，則陈后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灭亡之速也？覈之以名义，研之以情实，旣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礼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时义大矣哉，焉可以名数末流，雕虫小技，厠杂其間乎！（文六二八）

独孤郁作辨文，則又以天文为根据，証明文当簡易自然，不当彩飾其字：

或曰：“文所以指陈是非，有以多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愼其所为体也。”又曰：“文章乃一艺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穷极終始，万化

无有差忒，故易与天地準，此圣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尽。后圣有作，不能使之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旣生，治乱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万世，而褒貶在一字，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画，春秋之一字，岂所謂崇飾之道，而尙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毕天地矣。故圣人当使將来无得以笔削，果可以包举其义，虽一画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为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岂有意于文彩耶，而山川邱陵不可加；八卦春秋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极与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体之愼耶？（文六八三）

而主張書文皆为"教化之至言"，反对"給曰文与艺"的"纖纖而无根"之文。

第七章　韓柳及以后的古文論

一　韓愈的貢献

依上章的叙述，韓柳以前，載道説也有了，文气説也有了，簡易説也有了，宗經学史的学説也有了，推崇周秦兩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説也有了，那末韓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論，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嗎？人云他亦云，还有什么价値可言呢？不錯，古文运动到了韓柳，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已有无数的有名作家及无名作家的努力，到他倆适际其会，其完成登峯造极的古文及其理論是当然的，虽不能謂其只是前人的追随者，然确是食前人之賜。但他倆虽是順着历史的食前人之賜，而却使古文运动划一新时代，最明显的就是前人虽已提出載道説，而道是什么，非常模糊；韓愈則作原道，說明道是指仁义之道、儒家之道（詳一篇一章十三节）。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阳人（旧唐書作昌黎人）。旧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七六有傳。韓愈以前，北周的苏綽，北齐的顏之推，都有儒家的傾向，但沒有标出儒家之道。王通自言要“紹宣尼之业”（文中子天地篇），但对佛老，并不十分反对，謂：“詩書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国亡，非釋迦之罪也。”（前書周公篇）此后提倡載道説最力的为蕭穎士和李华，李华是表彰佛的，

所以独孤及謂其"詮佛教心要而会其异同，則南泉眞禪师、左溪郎禪师碑。"(文三八八，檢校尙書吏部員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蕭穎士无表章佛老的言論，可也无排斥佛老的言論。此外的古文家之对于佛老，也只有表章，絕无排斥。到韓愈便不同了，他很起勁的排斥佛老，以卫儒道。他諫迎佛骨云:

>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当时群臣材識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寢，臣常恨焉。……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文五四八，論佛骨表)

又作原道，提倡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傳下来的仁义道德；辟佛老，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文五五八)与孟尙書書謂楊墨交乱，使人几于禽兽，而"释老之害，过于楊墨"(文五三三)。

不錯，韓愈所提倡的儒道是服务封建阶級的，但在当时却有进步意义，特别是他的用来反对佛老。他在原道指出得很对："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多了不劳而食的佛老。因此"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盜也！"韓愈以前也有辟佛的，如傅弈的上疏請除释教(唐書傅弈傳)，姚崇的治令謂信佛皆亡国殄家(唐書姚崇傳)。但第一，他們辟佛而不辟老，实則老教在六朝已几与佛教相埒，至唐代又以皇帝奉老子为远祖的緣故，更形发达。第二，他們虽辟佛教，但并未鮮明的卫儒道。韓愈則一面辟佛老，一面卫儒道(他名为圣道)，他的攻守陣綫排布得非常周密。而且他有眞誠的信心，在举世信佛有灵应的时代，他敢很負責任的发誓說："佛如有灵，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論佛骨表)他因諫迎佛骨，貶为潮州刺史，"有一老

僧号大颠者，頗聰明，識道理，远地无可与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与孟尚書書)由是有人疑心他“信奉释氏”。他与孟尚書書，力陈自己卫道辟佛的决心，末謂：“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其激昂慷慨，百折不挠的气概，千載之后，犹可想見。

古文既不是緣情的，而是載道的，則必有一种旗帜鮮明的道，而后其道始真，其文始信。普通說来，情源于人的感情作用，道源于人的理智作用。但看見人家言情，我为时髦起見，虽无情可言，也要搜情取貌，則不是源于情感，而是源于理智，失掉“文学产于情感”的要素。因此其所言之情，是无病呻吟，是无欢强笑。反之如对一种道理，深信不疑，而且認为是自己的責任，头可断，此道不可不行，則已由理智作用，渡于感情作用，虽为載道文学，仍合于“文学产于情感”的要素。韓愈以前的古文家，其所謂道既模糊，其对于道的信念，也比較平淡。韓愈不惟抓住了鮮明的道，而且有万死殉道的願力，自然要使古文运动，划一新时代了。

至韓愈所以能抓着儒道以排佛老的原因，屬于个人方面者，一由于师友的薰陶与慫恿，一由于家庭的教育与傳染。前者如旧唐書卷一六〇本傳云：“大历貞元之間，文字多为古学，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肅最称淵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这是师傅的薰陶。張籍兩次上韓愈書，力言老释之害，劝愈“嗣孟軻楊雄之作，辨楊墨老释之說，使圣人之道，复見于唐。”(此系宋洪迈所提出，見容齋四笔卷三，韓退之張籍書条)这是朋友的慫恿。后者如王銍韓会傳称：“会与

其叔云卿俱为蕭穎士爱奬。其党李紓、柳識、崔祐、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并游，会慨然独鄙其文格綺艳，无道德之实，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为文衡一篇。……弟愈三岁而孤，养于会，学于会。……观文衡之作，益知愈本六經，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立道雄剛，事君孤峭，甚矣其似会也。”（此系李嘉言先生所提出，見文学第二卷第六期，韓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屬于社会方面者，一由于社会矛盾的益趋严重，一由于佛老的畸形发达。前者是无庸細述的，韓柳的时代正屆中唐之末，經济的搖动，政治的腐敗，以及其他的破弊情形，尽人皆知其較以前更甚。后者——所謂佛老的畸形发达，也不必远找例証，上引韓愈原道就說：“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知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佛老，已与士农工商平分社会。这样自然应当排斥佛老，而排斥佛老自然要卫护儒道了。

二　道与文的關係

至道与文的关系，韓愈以为就学习而言，要“因文見道”；就創作而言，要“文以載道”。答李秀才書云：

> 然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文五五二）

答陈生書云：

>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文五五二）

題哀辞（欧阳生哀辞）后云：

>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讀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学古道則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文五六七）

这就是說学习古文的原因，为的“因文見道”。答刘正夫書云：

> 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文五五三）

上兵部李侍郎書云：

> 謹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文五五一）

上宰相書云：

> 其业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文五五一）

送陈秀才彤序云：

> 讀書以为学，纘言以为文，非所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將信其富于文学也。（文五五五）

这就是說創作古文的原因为的"以文載道"。所以道是文的实質，文是道的形式。答李翊書云："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則所重者是道的实質，其次才是文的形式。所以答李翊書又云："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答尉迟生書亦云："夫所謂文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实。实之美惡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文五五一）

三 古文方法

韓愈所抓着的儒家之道，其义蘊已为周秦兩汉的儒家发揮殆尽，至韓愈已无多可言，故虽有"信道篤"的願念，也只能作实行的儒家，不能作理論的儒家。苏軾韓愈論云："韓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以其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于理而不能精，支离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东坡七集，应詔集卷十八）实以儒理已为以前的儒家說尽，故韓

愈只能据儒理以排斥佛老，不能对儒理有新的发明。故韓愈虽自言重道輕文，而結果还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

从历史的根据而言，隋唐的古文运动，在取法周秦兩汉之文，以打倒魏晋六朝之文，所以自李諤王通以来，几乎沒有一位古文家不反对魏晋六朝文的。韓愈也說魏晋以下的文学，“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馳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文五五五，送孟东野序）。又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伤剽盗。”（詩五函十册韓愈卷二，荐士）既反对魏晋六朝，故不讀魏晋六朝之書，不作近似魏晋六朝之文。而其所取法的，无疑的是周秦兩汉了。答李翊書自述讀書为文的經驗云：

> 始者非三代兩汉之書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識古書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則以为喜，誉之則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无迷其途，无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則言之長短，与声之高下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謂几于成乎？（文五五二）

答刘正夫書亦云：

> 或問“为文宜何师？”必謹对曰“宜师古圣賢”。人曰“古圣賢人所为書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謹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問曰，“文宜易宜难？”必謹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

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异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馬相如、太史公、刘向、楊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賢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刘向、楊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寻常之徒也。（文五五三）

前者昭示古文方法，在精讀三代兩汉之書，实行三代兩汉之道；后者謂师古圣賢之書，須师其意，不必师其辞。良以古文本来注重載道，所以欲作古文，必先明古道。惟古道不是照鈔，而务去陈言，必非常物。要明古道，又务去陈言，固是以复古为革命，而在邏輯上是有矛盾的。且古道已为古人說尽，余义无多，所以务去陈言的律条，遂躲避实質之道，趋向形式之文。所以韓愈的古文，自謂“不專一能，怪怪奇奇”（文五五七，送穷文）。又托为太学生的譏笑云：“作为文章，其書滿家：上规姚姒，渾渾无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庄騷，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进学解）樊紹述的文章有名的奇澀，韓愈却讚云：“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襲，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圣伏道絕塞。旣极乃通发紹述，文从字順各識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南阳樊紹述墓志銘）孟郊的詩有名的奇澀，韓愈却讚云：“及其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层出。”（貞曜先生墓志銘）知他很重視文辞的怪奇，所以栁宗元云：“信韓子之怪于文也。”（文五八六，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至他的門弟子后学，遂

專尊的提倡怪奇之文了。

四 "不平則鳴"与"文窮益工"

至文学的产生，韓愈以为由于"不平則鳴"。送孟东野序云：

>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无声，風撓之鳴；水之无声，風蕩之鳴。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文五五五）

文学既生于不平之鳴，則愈不平，其文学愈善；而不平的因素虽多，最直接的是穷困，所以"文穷益工"。荆譚唱和詩序云：

>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于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气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为。（文五五六）

这种"不平則鳴"与"文穷益工"說的产生，其历史的来源，大概可上溯于司馬迁的对一切著述，率謂其由于"抒其憤思"（詳二篇三章三节）。韓愈頗推崇司馬迁，司馬迁的学說，当然可給他以极大的影响。然韓愈的特別提出这种說法，与他的不得志有关。他"年二十时，苦家貧衣食不足，……見有举进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惡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因又詣州府求举。凡二試于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于中書"（文五五二，答崔立之書）。后来三上宰相書（文五五一），遍干当时执政者，虽爬上了仕途，而迭遭貶謫，几至杀戮。由是作进学解以解嘲（文五五八），作送穷文以自謔。送穷文列举急欲送出的

穷鬼有五个，就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和交穷。的确他不惟仕途失败，文誉也不佳。答李翊書說："其观于人也，笑之則以为喜，誉之則以为忧，"正反映文誉的穷厄。与馮宿論文書更說得明白："僕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为好，則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卽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文五五三）这样当然使他穷得不平。不幸他又不是优游肥遁的隐士，而是有絕大抱負的学者，因此益感不得志行道之苦，"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困"（文五五一，上兵部李侍郎書），遂由不平則鳴、文穷益工的事实，作出了不平則鳴、文穷益工的文論。

五　柳宗元的地位及其所言道之二病

唐代古文的有韓柳，犹之先秦儒家的有孟荀；韓愈近似孟子，其成就在于偉大，柳宗元近似荀卿，其成就在于綿密。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人。旧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六八有傳。韓愈为了傳道而排斥佛老，柳宗元为了傳道而排斥"好辭工書"。报崔黯秀才論为文書云：

>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以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于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僕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語于古。

又云：

> 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

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于伎也。（文五七五）

"辞""書"二病，虽"書字益下"，但除了崔黯秀才以外，因好辞害道者甚多，因工書害道者甚少。这是因为書与道的关系較远，所以工書者未必以書用于道，明道者亦未必寄道于書；辞与道的关系較密切（道假辞而明），所以好辞者每每喜假道以摛辞，明道者亦喜借辞以傳道。实則道固假辞而明，亦因辞而晦。所以柳宗元于他篇不再反对"書"，而只反对"辞"。答韋中立論师道書云：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色彩，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文五七五）

答吳武陵論非国語書云：

夫为一書务富文采，不顧事实，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后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顚者众矣。（文五七四）

与呂道州溫論非国語書云：

嘗讀国語，病其文勝而言厖，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同上）

非国語后序云：

凡其繁蕪蔓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語。……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蓋非出于左氏。吾今乃知文之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愼耶？（柳河东集卷四五）

就傳下来的韓柳时代的文章而論，固大体是不尙辞的古文。然柳宗元与楊京兆凭書云："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

文，希屈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文五七三）希屈馬王刘的十数人容或不尙辞，累累相望的希陆机潘岳之比者，其尙辞无疑。所以柳宗元以辞为病道而非之，并非无的放矢，正是对症下藥。

六　学文的步驟与作文的态度

柳宗元与韓愈一样，究竟是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韓愈抓着儒家的仁义道德之道，柳宗元也抓着儒家的中庸之道。与呂道州温論非国語書云：

> 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迹；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門戶阶室，漸染砥礪，几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謬，以为僇于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世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文五七四）

其自謙为小書者，就是非国語六十七篇。非国語是就国語，而“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可知他对道的苦于无可发揮，无可插嘴，由是很可憐的删国語。删国語不能就算了不起的講中庸之道的哲学書。哲学旣不能为役，所以結果仍是由道渡于文。与楊京兆凭書云：

>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八九，未易忽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于古書老生；直趋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耳。（文五七三）

文章因道而貴，文章家亦因道而尊，所以虽先道后文，而“言而不

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吳武陵論非国語書）所以仍然要作文章家。既作文章家，則須学文章，作文章。学文章的步驟是：

>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当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国語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書俟文成异日討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文五七五，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書）

>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暢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語以博其趣，参之离騷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文五七五，答韋中立論师道書）

至作文的态度，則是：

> 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輕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作之，惧其昧沒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同上）

韓愈的方法，只是讀三代兩汉之書，行三代兩汉之道，以俟文思的“汩汩然来矣”，“浩乎其沛然矣”。柳宗元則讀文既分別擷取，作文又有种种态度，較韓愈綿密多了。

七 “得之难”及“知之难”

惟其如此，所以韓愈对于作文，始也虽“戛戛乎难也哉”，后来便逐漸“汩汩然来矣”，“浩乎其沛然矣”，一点也不覺得难了。柳宗元与友人論文書則云：

>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为比兴之不足，恢拓之

不远，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

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明），探其深賾，虽有蕪敗，則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闡，家修人励，刓精竭虑者，数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誰不欲爭列綺繡，互攀日月，高視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进，力蹷势穷，吞志而沒。——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广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楊雄沒而法言大兴，馬迁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于后祀，声遂絕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文五七四）

所以謂"得之难"者，虽可解以深于文，故知作文的甘苦，但深于文的人很多，独他特别的說明"得之难"，大概由于他的作文方法过于綿密。所以謂"知之愈难"者，据与友人論文書是：

而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声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終淪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自然朱紫淆混，辨析极难，但这不是他說"得之难"的主因；他說"得之难"的主因是他远謫永柳，失掉了优越的政治地位。不錯，韓愈說得好，"使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必傳于后如今，无疑也"（文五六三，柳子厚墓誌銘）。可是"落井下石"者流，不免貶譏他的文章，所以他很慨歎的說，"道之显晦，幸不幸繫焉！"所以友人欲观看他的文章，他"退发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滯而不往也。"固是自謙，也是警友。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云："夫观文章，宜若

悬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无可私者。”（文五七五）是他的知文不难；然則所謂“知之愈难”者，不是指他的知他人的文章之难，而是指他的文章求他人知之之难。

在这种情形之下，“荣古虐今”的学說，遂在复古道、作古文的柳宗元口里唱出。不惟与友人論文書言之，与楊京兆凭書亦云：

> 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今，不可以言古。桓譚亦云：“亲見楊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迁，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犹为今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人未必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

固然由复古运动，可以激起这种反古的言論。但不能出之于复古运动者的本身，尤其柳宗元是复古运动的柱石，更不应如此。而所以如此者，实由于他的身遭貶謫，文亦随之遭了貶謫，遂憤而为此，一方面詆时人之不識文，一方面自慰虽“薄于当世”，而可“荣于后世也”。

八 詩与文

詩与文有共同性，也有各别性，所以虽同是文学的一部門，但詩是美的文学，文則或尙美，或尙用，頗不一致。就文学的历史而言，大約尙美的时代，則文亦尙美，由是与詩走着差不多相同的道路；尙用的时代，則文当然尙用，而詩以不便于說理的緣故，每相当的保持着尙美的态度，由是詩与文分道揚鑣。唐代的古文家，希望以古文救世，当然是尙用的，所以主張簡易載道。但对于詩則承認它的綺靡緣情。如独孤及謂“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华而不实，君子所醜。”但对于詩，則大捧沈佺期宋

之間的"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章。"謂"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备"(詳一篇一章八节)。到柳宗元益有显明的論調。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后序云：

> 文有二道：辞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导揚諷諭，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壯广厚，詞正而理备，謂宜藏于簡冊也。比兴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遺。其后燕文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張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馳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益甚矣。(文五七七)

著述之文就是文，比兴之文就是詩，源流风格，皆"乖离不合"，因此能文者未必能詩，能詩者未必能文。我常以为唐代的詩文是分化发展，观此益可瞭然了。

九　刘禹錫的詩文分論

柳宗元謂文有比兴之文和著述之文二道，刘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則謂文有文人之詞和經綸之詞兩种。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云：

> 謹按公文，未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詞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为宗。(文六〇五)

这虽是就韋公(执誼)文集而言，但对他文当也有类似的分类观念。他所謂文人之詞包括柳宗元所謂比兴之文的全部，同时还包括柳宗元所謂著述之文的大半；至經綸之詞虽也屬于柳宗元所謂著述之文，却偏于典章經济。本来刘禹錫虽与韓柳同为古文

家，但也和元白同为詩人；古文家簡易載道，詩人綺丽緣情；所以混合詩文，則謂皆“以才丽为主”；分別詩文，則文宗三代秦汉，詩宗魏晋六朝。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柳君文集序云：

>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同上）

这是就文而言。董氏武陵集序云：

> 詩者，其文章之蘊邪！义得而言喪，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詞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燦然复兴。（同上）

这是就詩而言。韓愈不只反对魏晋六朝文，也反对魏晋六朝詩；刘禹錫則弃其文，取其詩。这固然由于他不只是古文学家，也是詩人，而由魏晋六朝文学的逐漸抬头，也足征文学界的逐漸注重辞藻了。

十　時人的見解与李翺的批評

古文运动之至于韓柳，已发展到了最高点，同时便已有轉移方向的暗示。韓愈对于文主“怪怪奇奇”，則虽自謂不注重形式，而較蕭李則实在注重形式了。柳宗元虽反对“好辞工書”，然又說：“文之用，辞令褒貶，导揚諷諭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文五七七，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后序）其作文方法，綿密繁瑣，无非在求文章之美。以故韓柳是古文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后来轉返于怪丽的开导者。本来一切物不能永久保持同一狀态，否定自己而变成他物，是物的內在本質。南北朝以来的繁密

緣情的文学否定自己而变成唐代古文；古文发展到了最高点，又否定自己而变成晚唐五代的緣情的四六文。——这是內在的原因。至外在的原因，則古文的目的原在救世，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在世之答应拯救；或社会虽不答应拯救，而拯救者还未完全死心。前者是隋至初盛唐，正努力在复兴社会，所以朝野上下，皆願承受古文之实質的道之教导与束縛。后者是中唐，社会方面，已由貧富的悬殊过甚，致使权貴与富豪不甘受道的教导与束縛，平民不能受道的教导与束縛。但也正因为貧富双方皆不受道的教导与束縛，益使有心救世者，加强道的形質与力量，由是产生韓柳的載道文論与文章。韓柳的載道文論与文章之不容于世，是他倆曾再三明言的。韓愈答尉迟生書謂自己"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文五五一）。答李翊書也慨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乐而悲之！"他明儒道，辟佛老，由是諫迎佛骨，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阳路八千"。这样当然使他相当的灰心。柳宗元是被称为躁进者，然其所以躁进的原因，行道救世当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幸竟以此貶永柳二州十余年。經了这一次的当头棒喝，使他发現了統治阶級的殘酷。韋中立願奉他为师，他力辞不敢当其名，說是不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又举了孙昌胤以行古祇見怪的例子云："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祇，將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憤行之，旣成祇，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某冠毕。'应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郑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非郑尹而怪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文五七五，答韋中立書）为世所不为且不可，以道矯世更当然反被所矯。因此他倆对于道不能不稍微放松，而精力所注，止有顓顓于文。因此韓柳虽自謂重道輕文，而其所成就者，

实文过于道。(道的无可发揮，也是原因之一，已詳前。)至韓柳以后，言文章者，虽有的仍主文以載道，如韓愈的門人李汉云："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而至焉者，不也。"(文七四四，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而大部分的人則率捨道言文，最低也是輕道重文。李翺答朱載言書云：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异者，則曰文章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則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則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則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文六三五)

除好理較近載道說外，其余都不管道不道，只論文不文。至李翺的意見，則謂六說者"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他說：

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詞句怪丽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詩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閔既多，侮受不少，"此非不对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惊朕师。"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亩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說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聞也。

他虽謂"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說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聞也，"但他实承認六說都是文之一体。又云：

义虽深，理虽当，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貢曰："文犹質也，質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陈言之务

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則班固言之矣；曰"䫻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

則他虽自謂，"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亦答朱載言書）而反对当时为文者，"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于理，"（文六三四，百官行狀奏）但他实重文輕道，所以說"义虽深，理虽当，詞不工者不成文。"他說文理义为文章三要素，而謂：

故义深則意远，意远則理辯，理辯則气直，气直則辞盛，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栄，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飽于腹也，其味鹹酸辛苦，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归也。

从表面看，似以义为最重，理次之，文又次之；然末謂"此創意之大归也，"实是文章家的为文而創意，不是哲学的为道以垂文。韓愈与馮宿論文書，閔歎李翺張籍的"弃俗尚而从其寂寞之道，以之争名于时也。"蓋道虽是李翺所心尚，而以于时反道尚文，为了"争名于时"和其他的原因，遂也有意无意的視文重于道了。与皇甫湜書云：

僕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惟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二帝，而前汉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迁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学者悅而习焉，其讀之也詳。足下讀范蔚宗汉書，陈寿三国志，王隐晋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迁班固書之溫习哉？故溫习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数，在詞之高下，理之必然也。（文六三五）

注重文詞的意思，尤为明显。文中又云，"僕文采虽不足以希左

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妇，岂尽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可見他自己所矜重的也是文詞。寄从弟正辞書云：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謂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殁千余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賢者，以吾讀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在乎？亦未可誣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見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誠明之必相依尔。……仁义与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者也，吾所惧而不为哉？（文六三七）

杂說上云：

是以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文之也。（文六三七）

前者可解为注重仁义之道，后者可解为注重中道，但与韓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相比，重道重文，便区以别矣。

十一　裴度对李翱重文說的抗議

社会眞是复杂的，有的推着时代的輪子向前跑，有的扯着时代的輪子向后拉。自韓柳載道失敗，轉重文辞以后，韓愈的大弟子李翺便首先說：“义虽深，理虽富，詞不工者不成文。”而裴度却极力反对，寄李翺書謂周、孔、孟、荀、騷人、相如、子云、賈誼、司馬迁、董仲舒、刘向之文，“皆不詭其詞而詞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又云：

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辞国风雅頌，經圣人之笔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細入无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見，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文五三八）

又云：

覩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对儷句，屬綴风云，羈束聲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远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則已，理穷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远关經术，然后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

不惟不贊成李翺的"以文字为意"，以"奇言怪語"，矯正当世的"偶对儷句，屬綴风云，羈束声韵"，对于韓愈的以文为戏，亦不以为然。寄李翺書又云：

昌黎韓愈，僕識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覺惊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类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裴度的意思，大概謂文为达意的工具，能达意就完了，不应于达意之外，故意在文字上，"高之、下之、詳之、略之，"因此主張至易至直之文。本来古文的意义，在矯正魏晋六朝以来的繁密緣情之文。但以既名古文，則于道以外，应顧及于文。至韓柳由重道失敗而轉返重文以后，李翺一班人遂不免捨道为文，捨道論文；而又以不能投降于所反对的"偶对儷句，屬綴风云，羈束声韵"之文，自然只有从事于"奇言怪語"，"雄詞远志"。裴度詆其"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求异寻常，可以說是正中其失。全唐文紀事卷七十六引学古緒言載有人写韓送王含序云："世之称韓文以怪怪奇奇，吾尤重其大雅卓然，独不牽于流俗。……而憒憒者乃曰古文之法亡于韓；不知其所謂亡者何等也！此誠儿童之見，

所謂'蚍蜉撼大树'者!" 說古文之法亡于韓，自未免誤妄。但古文至韓愈而极盛，而韓門的弟子便撞了喪鐘，为时无几，便被"偶对儷句，屬綴风云，羈束声韵"的文章所战胜，确是无可諱言的事实。

至裴度之所以能燃着簡易說的最后的光燄，以反对韓愈李翺的怪奇說者，固是怪奇說产生后的当然反响；而不出于旁人，独出于裴度，其最大的原因，恐与师傳有关。他学于刘太眞(見文五三八，裴度所作刘府君神道碑銘并序)，而刘太眞正是主极端簡易說的蕭穎士的弟子(見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艺本傳)。再者，他本是以德化事功为主的人物，虽学于刘太眞，而不以文章名家，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十二 皇甫湜孫樵的怪奇主义

簡易說的最后的一点光燄，胜不过由历史及社会环境所促成的怪奇說，韓愈及其大弟子李翺不过有怪奇主义的趋势，还沒有以全副精神作怪奇的文章与文論。韓門弟子中年岁較晚的皇甫湜，其文章文論便眞的置重于"怪奇主义"了。答李生第一書云：

> 夫意新則异于常，异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众，出于众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鸞凤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文六八五)

古文运动的意义之一，是反对六朝文的綺縟繁密，有伤自然，由是提倡簡易自然的古文。今皇甫湜竟以怪奇为自然。怪奇是他所提出的新义，自然是古文原有的通則，欲使新义植基于通則，由是不能不挑着自然的招牌，贩卖怪奇的藥品。韓愈所謂古文，較过去所謂古文，已有很大的量的变化，皇甫湜更逐渐由量的变

化，形成質的变化。所以湛靜澄云："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学流于艰澀怪僻，所謂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引見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八）

皇甫湜的文学观，虽已由簡易的古文，变为怪奇的古文，而有的当然还留滯于傳統的見解，以故这位向他請教的李生，便似乎不以为然。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云：

>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也；謂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尙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貴者非他，文則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后素，旣謂之文，岂苟簡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議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迁、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远。（文六八五）

又第三書云：

> 生以正抑其奇。……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当尔也，所以千年圣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谁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悬，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尙乎？生何窒！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于其倫，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有以質为貴者，有以文为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元黄之用，可乎？生云奇与易，作者何别，在所为耳。請考之于实：生为易矣，試为僕作难，作难者视何如相如楊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楚詞史記太元之不朽也，岂为資笑謔乎哉？如鳥鵲啁啾，声断便已，人如不聞尔，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举多言之也，易处

多，奇处少尔。易文大抵奇也，易处几希矣。（文六八五）

由他的答書里，知李生以正抑他之奇，以常抑他之怪，以質直抑他之华艳，以簡易抑他之繁难。他是号称古文家的，而他所提倡的，正是过去的古文家所反对的；李生所持以攻击他的，却合乎过去的古文家的見解。可見古文之名虽存，古文之实已异。不錯，皇甫湜是古文家，是集古文大成的韓愈弟子，但以时过境迁，所以逐漸否定自己，而要变成他物了。

皇甫湜是韓愈的弟子，而竟打着古文的旗号，逐漸轉变古文，以至否定古文。皇甫湜以后的孙樵，自謂"尝得为文眞訣于来无擇，来无擇得之于皇甫持正（湜字），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文七九四，与王霖秀才書，又同上与友人論文書。）虽作有乞巧对云："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韵調声，决濁流清；雕枝鏤英，花斗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类于俳，观者启齿。下醨沈謝，上殘騷雅，取媚于时，古风不归。"（文七九五）然似对詩而言。至对于文，更是极端主怪主奇。与王霖秀才書云：

>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参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辞甚奇，如覩駭濤于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于文，方举降旗，將大夸朋从間，且疑子云复生。无何，足下繼以䫉旨及杂題十七篇，則与雷賦相闊数百里。足下未到其壼，則非樵所敢与知；旣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当如此悬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尝耶？抑以背时戾众，且欲餔粕啜醨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凤之音必傾听，雷霆之声必駭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則显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华山賦，韓吏部进学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

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文七九四）

又与友人論文書亦云：

古今所謂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显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同上）

又与賈希夷書也称贊賈希夷文的"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别华，期到圣人"（文七九四）。与高錫望書更提倡文飾，反对俚言，謂"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后学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其重怪奇文飾，毫无疑問。

皇甫湜只提出怪奇，孙樵于怪奇以外，又提出所謂工，說："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工必艰深，也有不平常的意思。古文运动，其意义虽千条万緒，而其約归，不外内容的以道理代性情，形式的以簡易代繁密。然唐代的古文家，其所謂道本沒有多少可以闡說的，至韓愈言道失败，更不必再事闡說。内容既无可闡說，当然要轉而考究形式，由是逐漸放弃簡易的旧說。又因古文不主張儷偶，故只有从怪奇着想，但古文运动的兩大意义丢掉了，而古文运动也便逐漸坏灭了。

十三 沈亞之的改掇主义

韓門提倡怪奇主义，不出韓門却与韓愈宗人靜略有来往的沈亞之（元和十年，即八一五年进士），作送韓靜略序也反对因循，提倡改掇云：

或者以文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旧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乃客之所尙也，恢漫乎奇态紬絀，已思以自織剪，違曩者之成轍，岂君子因

循之道歟？客应之曰：……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榦以加之枝上，名之树賚，过者虽愚，犹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补之如疣，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艺树者，必壅以美壤，以时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夫經史百家之学于心，灌沃而已。余以为構室于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复，拘于所限故也。翔之隙空之地，訪堅修之良，然后工之于人（泽案疑有誤），何高不可者。祭酒导其涯于前，而后流蒙波，稍稍自泽。靜略于祭酒，其宗也，遡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类。今既別而延藥，將游乎河江，岂欲益其自广哉？惟其勉，无怠！（文七三三）

只許韓愈为"导其涯"，又勉韓靜略"益其自广"，弦外之音，似对韓愈相当不滿。韓愈主張"戛戛独造"，和他的反对因襲，并无不合。不过韓愈的"戛戛独造"，还要宗經学史，在沈亞之看来，宗經学史便不是眞正的"戛戛独造"，所以謂"裁經綴史，补之如疣，"所以主"翔之于隙空之地"。"翔之于隙空之地"，就是一点也不依傍前人，所以是极端的改翔主义。极端改翔主义的产品，自然是"恢漫乎奇态紬絀"，所以虽不十分贊成韓愈，却与韓門的怪奇主义，殊途同归。

十四　李德裕的自然靈气說

韓門提倡怪奇主义，沈亞之提倡改翔主义，李德裕（七八七——八四九）則提倡"自然灵气"說。作文章論云：

魏文典論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淸濁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貫，不貫則虽有英辞丽藻，如編珠綴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勢壯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犹絲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覌之者不厌。从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万馬，风恬雨霽，寂无人声，"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苏廷碩敍事之外，自为文章，才实有余，用之不竭。

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重輕为难，語雖甚工，旨則未远矣。荆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纇，文旨既妙（一作高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师友，則魏文与王陈应刘討論之矣。江南唯于五言为妙，故休文長于音韵，而謂"灵均以来，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原注"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韵，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韵，班固汉書贊及当时辞賦多用协韵，猗与元勋包田举儒是也。"）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原注"文选詩有五韵七韵十一韵十三韵二十一韵者；今之文字四韵六韵以至百韵，无有隻者。"故篇无定曲，辞寡累句。譬諸音乐，古詞如金石琴瑟，尙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节；則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騷，摸写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虽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宝所弃。"此为文之大旨也。

从表面看来，既反对音韵声律，又反对琢雕藻繪，眞是典型的古文家的理論。但韓愈"余事作詩人"，"以文为詩"，当然是以古文为主，然后以古文的方法与余力作詩。柳宗元說文之要"在于高壯广厚，詞正而理备，"詩之要"在于丽則清越，言暢而意美，"是分別詩文。李德裕的文章論論及詩騷，知是揉合詩文。揉合詩文，以文就詩，象徵着文学的走向尙美的途路。他反对声律，却提倡气貫势息的节奏，是以自然的音律代人工的音律（参三篇四章）。所以謂"文之为物，自然灵气"。首先提倡此說者是曹丕刘楨，所以他崇奉"魏文与王陈应刘"的討論。既崇奉曹刘，当然不同于韓愈的"非三代兩汉之書不敢观"，当然是由三代兩汉降到魏晋，而反魏晋六朝的古文当然逐漸澌泯了。

第 五 篇

晚唐五代文学批評史

第一章 文学論

一 自唐代社会变遷說起

唐封建社会的逐漸崩潰，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中宗前后的內而后妃为乱，外而豪族兼并，釀成內地騷动，边境不安。不过这是崩潰的初期，一則不似后来二次的严重，二則經开元年間的励精图治，又造成唐代的中兴。但最根本的貧富悬殊的原因，未能鏟鋤，所以一旦有隙，旧病复发，由是有第二次的大崩潰，就是旧史家所謂"安史之乱"。自这一次的大崩潰之后，終唐之世，不能恢复，卒釀成第三次的总崩潰，就是旧史家所謂"黃巢之乱"。自此以后，唐天子的統治权便完全喪失，外而胡羌，內而豪族，风起云涌，各据一方，此仆彼繼，連續电影般的演了几十年，直到宋太祖削平群雄，"黃袍加身"，才又由分而合，成功統一的局面。

第一次的崩潰，使文章由繁縟緣情，轉于簡易載道。（詳四篇六章）第二次的崩潰，使詩亦由艺术之宮，移植到人間世上。（詳四篇三、四兩章）第三次的崩潰，則使詩及文章都放弃社会的使命，而轉于儷偶格律，綺縟淫靡。这是因为文章主用，詩歌主情，所以第一次的崩潰，就激动了文章的自覺，而詩歌則仍然躲在象牙之塔，不肯与人世接近；到了第二次的崩潰，才使詩人也感覺到社会沒落的严重，也放弃艺术的文学，提倡并創作人生的文学。但社会既不能根本改革，則文章家的救世与詩人的刺世，

虽不能說絲毫无补，而所补者实在有限得很。对社会言，所补有限；对各人言，則救世刺世都不見容于世。所以第三期的总崩潰之后，文章家与詩人大半都放弃救世与刺世，而反回来救自己；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学，变为自娛娛人的文学。同时又以一方面社会喪乱，一部分的文人流落于江湖，或慷慨憤世，或优游肥遯，一方面都市发达，一部分的文人苟安于都市，或献詩宮庭，或声艺自娛。前者反映为变相的古文及其文論，后者反映为艳丽文学的提倡与"詩格"的講明。

二　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学說

关于"詩格"，俟下章論次，玆先述变相的古文論与艳丽文論的种种矛盾与斗爭。本来中唐的古文家已因載道救世的失敗，轉而提倡奇辭怪語；社会詩人也因言志刺世的失敗，轉而逃于声色文艺。不过古文家不能忘情于道，社会詩人也不能忘情于社会。到了晚唐五代的宮庭都市文人，才干脆的反对載道，提倡緣情。打头陣的便是創造四六文的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他的上崔华州書云：

>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笔硯。始聞長者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怏怏(广板作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岂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笔为文，不能攘取經史，諱忌时世，百經万書，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其高下哉？（文七七六）

这眞是毫不躱閃的对古文家的正面攻击。古文家宗經学史，他便說"直揮笔为文，不能攘取經史。"古文家主文載周孔之道，他便說"夫所謂道岂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又于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后序云：

論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賢相隨于涂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无乎！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文七七九）

他的意思未必是反对古代的周孔，而是反对当时古文家的为文必載周孔之道，所以說："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

旣反对古文，由是別創所謂"今体"，就是四六文，自序樊南甲集云："生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后为鄆相国华太守所憐，居門下，时勅定奏記，始通今体。后又兩为秘書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为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动人。"（文七七九）古文家所反对的徐庾，又在李商隐手里复活了，又被李商隐藉以創造四六文了。四六文駢四儷六，当然要講究形式的华美。至实質方面，則以情为主，所以极力的反对载道。

文且如此。詩更可知，献侍郎鉅鹿公启云：

> 属詞之工，言志为最。自魯毛兆軌，苏李揚声，代有遺音，时无絕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呂同归。（文七七八）

又献相国京兆公启云：

> 人稟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詠歎，以通性灵。（文七七八）

前者就形式言，謂"虽古今异制，而律呂同归；"后者就实質言，謂"必有詠歎，以通性灵。"和元白之以詩"补察时政，洩导人情"者，完全不同了。

至李商隐之所以反对古文，提倡四六文，不以詩詠社会，而以詩詠性灵，除了社会的大原因以外，与他自己的身分有关。他說唐代的詩人，"枕石漱流，則尙于枯槁寂寥之句；攀鱗附翼，則先于驕奢艳佚之篇。"（献侍郎鉅鹿公启）而他自己先为鄆相国华

太守所憐，后爾为秘書省房中官，正是"攀鱗附翼"者，当然要反对載道的古文与刺时的詩歌，而提倡并創作"驕奢艳佚之篇"了。

三　杜牧的事功文学說

詩原于性灵而需要韵美，四六文也泰半原于性灵而需要韵美，所以詩人而兼四六文作家的李商隐，不管論文論詩，都提倡艳丽。至他所反对的古文，則与詩的旨趣迴殊，所以古文家率提倡載道，反对緣情；詩人則力主緣情，不問載道。詩人的見解，容后詳述，茲先叙古文家的見解。当时的古文家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事功派，以杜牧为代表；二是隐逸派，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三是韓愈嫡派，以孙樵为代表。因为孙樵是韓愈嫡派，所以已述于第四篇的韓柳及以后的古文論一章，現在只述事功派与隐逸派。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虽也坐过內官，但几次的为团練官，监察使，出守各州县，看到各地的兵荒馬乱，由是注孙子，作战論、（文七五四）守論、（同上）罪言、（同上）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文七五一）上李尉論江賊書、（同上）上李太尉論北边事启，（文七五二）頗有事功家的味道。所以他对于文章，提倡有功用的变相的古文。上安州崔相公启云：

> 某比于流輩，一不及人。至于讀書为文，日夜不倦，凡諸所为，亦未有过人。至于会昌三年八月中所献相公長启，鋪陈功业，称校短長，措于史記兩汉之間，讀于文人才士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文七五二）

韓愈等所提倡的古文要載周公孔子之道，杜牧所提倡的古文則要"鋪陈功业，称校短長。"所以他的文章不似韓愈之亟亟圣道，而要"上獵秦汉魏晋南北二朝，逮貞观至長庆数千百年，兵农刑

政，措置当否"的論次。（文七五九裴廷翰樊川文集后序）所以他不提倡"道"，而提倡"意"。答庄充書云：

>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輔，以辞彩章句为之兵衛，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飄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随主所指，如鳥随风，魚随龙，师众随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文七五一）

道是圣人之道，意則是自己的意見；意見是事功家的說法，不是以道統自負的儒家的說法。所以他虽然以"古作者"为仿效的目标，（答庄充書）虽然宗仰韓愈，（讀杜韓集）而与韓愈一班人所提倡的古文不尽同。所以我們称之为变相的古文。

不过若从历史源流上說，則杜牧之繼承了韓愈的見解，正同李商隐之繼承了元白的見解一样。李商隐繼承元白的晚年見解，特别是元稹的逃于声色文艺，由是提倡艳丽，反对載道。杜牧繼承韓愈一班人的見解，由是提倡"文以意为主"。不只"文以意为主"，詩也以意为主。献詩启云：

> 某苦心为詩，惟求高絕，不务奇麗，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間，既无其才，徒有其意。（文七五二）

所以反对俗艳。在唐故平盧軍节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引李府君戡云：

> 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妇人小儿皆欲諷誦。国俗厚薄，扇之于詩，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詩者，纖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憤者，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詩者，得若干

首，編为三卷，目为唐詩，为序以导其志。（文七五五）

此虽系标为李戡的話，但杜牧必表同意，所以在墓志里特别提出。且作者是杜牧，所謂"李府君嘗曰"者，不过是李戡有此意旨，而造为上述一段文字的，当然是杜牧，范攄云溪友議直認为是杜牧的話，虽然失考，却有几分近于眞实。

四　皮日休陸龜蒙的隱逸文学說

杜牧是事功派，所以侈談事功，將原来的古文拉到事功方面。皮陆是隐逸派，所以棲隐林泉，又將原来的古文拉到隐逸方面。

皮日休自己說："吾于吾唐，汩汩于民間，无能以文取位。"又說皮氏"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門，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文七九九，皮子世录）陆龟蒙有甫里先生傳，大概是变相的自述。傳中称"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又云："先生之居，有池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文八〇一）純然是有产的隐者。皮日休隐于鹿門，也当然有相当的产业。他倆一方面厌煩世乱，一方面又可以隐退自給，因此对于文章的見解，与杜牧的以事功为出发点者不同。皮日休作鹿門隐書六十篇，序云：

醉士隱于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慙其所未周，故复草隱書焉。（文七九八）

中有一篇云：

文学之于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同上）

又有一篇云：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时乎？尊而驕者不为矣；吾將謂失时乎？富而安者吾为矣。（同上）

由"息于道"，"息于文"看来，知他以道与文为隐息的消遣品；由"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看来，知他又以道与文为傲有位有貨者的工具。文学如藥的意旨不甚了了，或者是謂善用文学者，能以得到游息之乐和不貨而富之利；不善用者，不惟得不到游息之乐，反倒受作文之苦，不惟得不到不貨而富之利，反倒招能文之忌。这样自然便將古文由救世引到自娛。

固然他曾极力提倡儒道，主張以儒道入文。請韓文公配饗太学書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观开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縱横以为理，或作詞賦以为雅，文中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 但同文又云："於戏！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則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則百世可知也。"（文七九六）又轉于不亟亟用世，又露出隐逸者的口吻来了。

陆龟蒙复友生論文書自謙："少不攻文章，止讀古圣人書，誦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文八〇〇）可見也主張以圣道入文。因主以圣道入文，所以宗經。在甫里先生傳，自言："好讀古圣人書，探六籍、識大义，就中乐春秋，抉擿微旨。"（文八〇一）

杜牧自夸其文，謂"措于史記兩汉之間，讀于文士才子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陆龟蒙則宗經而排斥史汉，复友人論文書云："苟以六籍謂之經，习而称之，可也；指司馬迁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也！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坚然后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闕文也。' 又曰：'質胜文則野，文胜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笔之曲直，体之是非，圣人悉論而辯之矣，岂須班馬而后言史哉？以詩易为經，以書春秋为史足矣，无待于外也。" 此其原因，亦以杜牧是事功家，所以推崇記述事功的史汉；陆龟蒙是隐逸者，覺史汉不及六經

之醇，所以宗經而抑史。

古文家的以文载道，本有救世的意义。到韓柳以后，因救世被輟，遂逐渐的重文輕道，由是有文辞上的"怪奇主义"。(詳四篇七章四节及十二节)皮陆的时代，社会益乱，从封建阶級的立場观点看来，欲救也无从救起，由是不救社会，只救自己，就是以道与文为自娱的工具。这样自然要注重文的形式了。复友人論文書載他的友生說："某文也，某辞也。"龟蒙答云：

易之翼曰系辞。系辞曰："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故卦有小大，辞有險易。"又曰："观其彖辞，則思过半矣。"易之辞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辞也。書之辞非文邪？"屬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辞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辞，娶夫人之辞，乐有登歌荐之辞。禮乐之辞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軻之辞非文邪？太元曰："元之辞也，沈以穷乎上，浮以际乎上。"揚雄之辞非文邪？是以文者辞之总，辞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当称辞；"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不当称文。文辞一也，但所适者有宜耳，何异涂云云哉。

他的友生又說："声病之辞，非文也。"龟蒙答云：

夫声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后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动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文八〇〇)

这不惟提倡辞藻，亦且提倡声病了。陆龟蒙如此，皮日休何尝不然？他作陆龟蒙松陵集序云：

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始切于儷偶，拘于声势。詩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对也工矣。堯典曰："声依永，律和声，"其为律也甚矣。由汉及唐，詩之道尽矣。(文七九六)

于郢州孟亭記(孟浩然亭)亦称道"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

体”。又极力推崇孟浩然的詩句，謂可“与古人爭胜于毫釐間也”。(文七九七)对杜牧的詆譏元白，也特作論白居易荐徐凝屈張祜一文，为之辯护：

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于史，然方干学詩于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里論”，戏反其詞謂“朴里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从可知矣。乐天方以实行求才，荐凝而抑祜，其在当时，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虫小技，或奬激之，恐害风教。”祜在元白时，其誉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为，亦近于祜，为祜恨白，理亦有之。余尝謂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閑適。既持是得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謂之“元白体”。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文七九七)

这自然是入情入理，而且也是从“风教”立論，与杜牧的詆譏似乎同一出发点。但是不同，杜牧反对元白的“纖艳”，皮日休則相当的拥护元白的“雍容宛轉之詞”。松陵集序詳論詩歌，謂“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他虽是古文家，却重視詩文的“雍容宛轉”“儷偶”“声势”，推崇反古文的唯美作家温李，这是因为他既視文学为隐逸者的自慰的消遣品、驕人的工具，当然要力求美好了。

五　刘蛻羅隱的文章喪亡論

李杜皮陆以后的文学論，可以分为三派：一是古文家的文章喪亡論，二是詩人的香艳說和清丽說，三是香艳說和清丽說所激起的反对的論調。

伤悼文章丧亡者，当以刘蜕的梓州兜率寺文冢銘为最沈痛的表現，他拿他的文章二千七百八十紙，封而为冢云：

文冢者，長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蜕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蜕也，而独文蜕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沈不忘于文，悲感怨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为怀也。……

然而"获助于天，不获助于人，"所以只有埋之一法。其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风水惟貞，將利其子孙乎！（文七八九）

又投知己書也慨歎"其書空为来世弔已矣乎！"（文七八九）咳！这大慨就是文章的出路了！

不止刘蜕歎文不見用，罗隐（八三三——九〇九）也歎文不見用，投知己書云：

窃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随之；苟未去，則明天子未有不爱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而千百年后，风俗敝斂，居位者以先后礼絕，竞进者以毁誉相高，故吐一气，出一詞，必与人为行止。……何昔人心与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机穽中，不惟性灵不通轉，抑亦进退間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間不可人也！（文八九四）

但他比較达观，他不葬埋自己的文章，而希冀自己的文章能以立言垂后。答賀蘭友書云："僕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級于今之人，盖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則垂于后代，不可則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僕者与？"（文八九四）

六　韓偓歐陽炯的香豔說

香艳說要以韓偓欧阳炯为代表。韓偓作有香奩集，自序云：

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誚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慚。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閨繡戸，始預风

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过。（本書，又文八二九）

欧阳炯花間集序云：

鏤玉雕瓊，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鸞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諧凤律。楊柳大堤之句，乐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叶叶之花牋，文抽丽錦，举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淸絕之辞，用助嬌嬈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紅楼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則有李太白应制淸平調詞四首，近代溫飞卿复有金筌集。邇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赵崇祚，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織綃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論，因集近代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麤預知音，辱請命題，仍为序引，命曰花間集。將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本書，又文八九一）

香奩集有原出和凝的傳說，花間集本来是赵崇祚所編，不能遽謂为韓偓欧阳炯的意見。但这是不相干的。說香奩集原出和凝的是沈括夢溪笔談卷十六云：“和魯公凝有艳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后貴，乃嫁其名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綸、游艺、孝悌、疑狱、香奩、籝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奩、籝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私也。”（四部叢刊續編本）然葛立韵語陽秋卷五駁云：“今观香奩集有无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戏作无題詩十四韵，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岁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弃。丙寅岁，在福建，有苏暐，以藁見授，得无題詩，因追味旧

时，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尝与崔胤定策誅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与令狐涣同为中書舍人。其后韓全晦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审知而卒。以紀运图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复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云在福建有苏暐授其藁，则正依王审知时也。稽之于傳与序，无一不合者，则此集韓偓所作无疑。而笔談以为和凝嫁名于偓，特未考其詳耳。"（历代詩話本）至花間集的为赵崇祚所編，不足以說明花間集序的不是欧阳炯的意見，不过也可以知道赵崇祚也持这种意見。香奩集是香艳詩，花間集是香艳詞，总之是香艳文学；創作香艳文学，編輯香艳文学，为香艳文学作序鼓吹，当然是提倡香艳文学了。

七　韋莊韋縠的清麗說

清丽說要以韋庄韋縠为代表。韋庄常繼姚合的极元集，"更采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自序云：

> 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蓋少；繁絃九变，大濩殊稀。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閱众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边，沙之汰之，始辨避寒之宝，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采珠，雖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时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数首。但掇其清詞丽句，录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流，任归东海。总共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本書，又文八八九）

这就是說詩人虽多，作品虽夥，但又元集所采取的只是"清詞丽句"。此外他还有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云：

> 詞人才子，时有遺賢，不霑一命于圣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

逵、傅錫、平曾、賈島、刘稚珪、罗鄴、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寃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賜进士及第，各贈补闕拾遺。（文八八九）

也是有取于他們的“丽句清詞”，知韋庄对于詩的看法重在“清詞丽句”。

韋縠編的才調集，与韋庄的編又元集相类。又元集的去取标准以是否“清詞丽句”为斷；至編輯的目的，則为的“長乐暇日，陋巷旁时，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韋縠才調集自序云：

余少博群言，常取得志，虽秋螢之照不远，而雕虫之見自佳。……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风流挺持，遂采摭奥妙，并諸賢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爭光，詞丽而春顏动美。但貴自乐所好，岂敢垂諸后昆。（本書，又文八九一）

也是以“韵高”“詞丽”为去取标准，以“閑窗展卷，月榭行吟”为編輯目的。这是由于一方面社会日趋乱离，一方面他們得苟安于都市，既沒有拯救社会的力量，也沒有聞問社会的兴趣，由是或逃于色，或逃于艺，前者就反映为香艳說，后者就反映为清丽說。

八　黄滔吳融等的反豔麗說

香丽文学和清艳文学，純粹在供給文人享乐，虽然有产生的社会条件，却对社会不利，所以激动反响，又产生了反对的論調。最激烈者当推黄滔，与王雄書云：

夫儷偶之辞，文家之戏也，焉可齎其戏于作者乎？是若揚优喙于諫舌，啼妾态參妇德，得不为罪人乎？（文八二三）

又答陈磻隐論詩書云：

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隳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調歌

詩”。援雅音而听者懵，語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迁洛，兆于斯矣！（同上）

此外，章籌文之章解亦云：

垂日月所以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备礼乐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龙爝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人覩影于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覩辞章于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礼乐，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观而孰化？”（文七八八）

顧云唐风集序引小宗伯河东裴公的話亦云：

圣上（唐昭宗）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陈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騾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艳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帅，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扫蕩詞場，廓清文稜，然后有戴容州、刘随州、王江宁，率其徒揚鞭按轡，相与呵乐来朝于正道矣。（文八一五）

王贊元英先生詩集序亦云：

风雅不主于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盖起于汉魏南齐五代，文愈深，詩愈丽。陈隋之际，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滤濫，流于淫乐。故曰音能亡国，信哉！（文八六五）

牛希济文章論亦云：

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

又云：

时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学，口不知書，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浮艳之文，焉能臻于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屈宋徐庾之学，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为侍从之臣，使居仁义治乱之道，日习于耳目。所謂“观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他們反对艳丽，是站在封建政治的立場，謂艳丽的詩歌有害于社会政治。所以說唐帝的幸蜀迁洛，兆于郑声的鼎沸。所以說"晋能亡国"。所以慨歎"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所以提倡教化文学，如吳融在所作禪月集序云：

>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风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尙哉？自风雅之道息，为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对焉。既有所拘，則演情叙事不尽矣。且歌与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无之，足得于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尽，則为善矣。国朝能为歌詩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蓋气骨高举，不失頌詠风刺之道。厥后白乐天为諷諫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張为作詩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錯矣。至于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来相斅学者，靡漫浸淫，困不知变。嗚呼！亦风俗使然！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矧极思屬詞，得不动关于教化！（文八二〇）

黃滔答陈磻隐論詩書亦云：

> 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为心师，志之而以为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夫詩本于国风王泽，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

黃滔側重破坏方面，所以激烈的攻击艳丽，然后提出詩的"刺上化下"；吳融側重建設方面，所以积极的提倡教化，然后排觝詩的拘于"刻削峻拔飞动文彩"，"洞房蛾眉神仙詭怪"：总之是反对艳丽，提倡教化。

九 刘昫徐鉉的折中說

社会上一切現象的变动，是遵循着正反合的辯証的公式的。晚唐五代的文学論，既有艳丽說与反艳丽說的对抗，自然要有調合的折中說。关于这，当以刘昫及徐鉉为代表。韓愈柳宗元一班

人本以古文名家，而刘昫却云：

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学聳动搢紳之士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丽淵博，屬辞比事，誠一代之宏才。……韓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旧唐書卷一六〇，韓愈諸人傳論）

不称贊他們的“文以載道”，只称贊他們的“巧丽淵博，屬辞比事”，而对“文辞”“典丽”的苏味道、李嶠、崔融、盧藏用、徐彥伯却又說：

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为美风。苏李之学，一代之雄，有慚輔弼，称之岂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盧徐，皆攻翰墨，文虽堪尙，义无可則。（同上卷九四，苏味道諸人傳贊）

而所推許的是不古不今，文質并重的元稹白居易：

国初开文館，高宗礼茂才，虞許擅价于前，苏李馳声于后，或位昇台鼎，学际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于宮商，放縱者流于郑卫；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同上卷一六六，元稹白居易傳論）

序文苑傳，也反对“是古非今”：

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諸国之詩，非求胜于昔賢，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論。

又称贊沈隐侯的“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攄淵云之抑鬱，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当然是注重丽詞了。但又云：

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飾賁帛而礼儒生，門罗吐风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論，下笔成文，足以緯俗經邦，岂止雕章縟句，韵諧金奏，詞炳丹靑？故貞观之风，同乎三

代。（同上卷一九〇上，全唐文卷八五三作进文苑表）

又不以丽詞为文章之能事，还須要有"緯俗經邦"的功用，純粹是折中的論調。

刘昫一方面稱贊"巧丽淵博"，一方面又不忘"緯俗經邦"，是在調合当时的淸丽說与敎世說。徐鉉則主張詩是緣情的，但所謂情不限于男女之情，而是人情物情之情；是在調合当时的艳情的提倡与反对。于文献太子詩集序云：

> 鼓天下之动者在乎风，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于风可以言者，其惟詩乎！（文八八一）

于翰林学士江簡公集序云：

> 通万物之情者，在乎文辞。（同上）

于蕭庶子詩序云：

> 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远，鬱积乎中，不可以言尽者，則发为詩。（同上）

于成氏詩集序云：

> 詩之旨远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詩之官，陈詩之职，物情上达，王泽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詠性情，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文八八二）

于曲臺奏議集序云：

> 三代之文旣远，兩汉之风不振，怀芬敷者联袂，韵音响者比肩；子虛文丽用寡，而末世学者以为称首；兩京文过其心，后之才士企而望之。嗟夫！为文而造情，汚準而粉黛。若夫有斐君子，含章可正，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周旋俯仰，金石之度彰，摛簡下笔，鸞凤之文奋。必有其質，乃为之文，其积习歟，何其寡也！（文八八八）

这样，則旣不是呆板的歌詠社会，也不是放蕩的歌詠艳情，而又不背于緣情，不碍于世道，相反的学說融合了，矛盾的現象統一了。

第二章　詩　格（上）

一　詩格的兩個時代

詩格有兩个盛兴的时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此兩时代虽都講詩格，但第一，前者所言，偏于粗淺的对偶，后者則进于精細的格律与微妙的比兴。第二，前者只講“詩格”，偶尔及于“賦”，很少及于“文”，后者虽亦以“詩格”为主，但也涉及“賦格”“文格”。此其原因，以前者的兴起，其历史的領导者是六朝的声病說，社会的助力則由于初盛唐的以文治天下，以詩飾太平。声病說只是消极的避忌，所以仅能領导到进一步的粗淺的对偶。詩文的用途旣异，所以对偶的巨手，不易伸展到文的园地。（詳四篇一、二章）后者的兴起，其历史的領导者是初盛唐的对偶說，社会的助力則是由于时代喪乱，朝野上下的文人都走到消遣玩味的逃避現实的文艺路上。（詳本篇一章）对偶說虽只是一种粗淺的方法，但較声病說已有長足的进步，其領导出来的方法，当然要青胜于藍，益臻細密。整个的文艺旣都走到消遣的玩味的路上，当然不惟詩要格律，賦与文也需要格律。

二　五代試士的注重詩格及賦格

这时的講究格律，可以取証于考試詩文的标准。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載后唐庄宗明宗的累次下勅考官，挑剔考生的卷子，都

是在字句格律上找毛病。如庄宗同光三年三月勅礼部貢院云：

> 覽符蒙正成僚等呈試詩賦，果有瑕疵。……况王徹体物可嘉，屬辞甚妙，細披制作，最异儕流；但应試以効成，或求对而不切。桑維翰若无紕繆，稍有工夫，止当屬对之間，粟失求妍之美。……其王徹改为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

至明宗長兴元年六月敕中書門下細覽詳复新进士所試新文，中書門下所詳复者，更极尽瑣屑挑剔之能事，可算最有趣味的一段史料，各种文学史与文学批評史，尙少注意，急照录于下，以饗讀者：

> 李飞賦內三处犯韵，李瀫一处犯韵，兼詩內錯書"青"字为"淸"字，并以詞翰可嘉，望特恕此誤。今后举人詞賦，屬对并須要切，或有犯韵及諸杂違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別撰律詩賦各一首，具体式一一，曉示將来。举人合作者，即与及第。其李飞、樊吉，夏侯珙、吳油、王德柔、李瀫等六人。(此下疑有脫文)盧价賦內"薄伐"字合平声字，今使側声字，犯格。孙澄賦內"御"字韵使"宇"字，已落韵；又使"膂"字，是上声。有字韵中押"售"字，是去声，又有"朽"字犯韵。詩內"田"字犯韵。李象賦內一句"六石庆分幷"，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礼"，合使此"导"字，及錯下事煢字韵內使"方"字。詩中言"十千"，"十"字处合使平声字，"偏"字犯韵。楊文龟賦內均字韵內使"民"字；以君上为騃騑之士，失奉上之体；兼"善"字是上声，合押"偏"字是去声，如字內使"輿"字。詩中"偏"字犯韵。师均賦內"仁"字犯韵，"晏(疑为宴)如"書"晏如"；又"河淸海晏"，"晏"字不合韵，又无理，"晏"字即落韵。楊仁远賦內"賞罰"字書"伐"字，"御勤"字書"鉞"字。詩內"蓮蒲"字合着平声字，兼"黍粱"不律。王谷賦內御字韵押"处"字，上声則落韵，去声則失理；善字韵內使"显"字，犯韵；如字韵押"殊"字，落韵。其盧价等七人望許令將来就試，仍放再取文解。高策賦內于字韵內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訛，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郑朴賦內言"肱股"，詩中"十千"字犯韵，又言"玉珠"。其郑朴許令將来就試，

亦放取解。仍自此宾貢，每年祇放一人，仍須事艺精奇。張文宝試士不得牖当，望罰一季俸。（此与前条，都是陈东原先生告訴我的）

这样，自然作詩作賦都要講求格律，自然要有大批的詩格賦格的書了。

三　材料的獲得

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詩歌是极講格律的，所以产生了大批的詩格書，然以被正統派的文人所卑視的緣故，致使泰半亡佚，即存者亦无人注意。普通所知者只有齐己的风騷旨格。不記何年，我在北京隆福寺一書鋪，購得清人顧龙振詩学指南一書，共八卷，卷三为魏文帝詩格，賈島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詩格，王昌齡詩格和詩中密旨，李嶠平詩格，僧皎然詩議和詩評。卷四为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徐衍风騷要式，僧齐己风騷旨格，僧文彧詩格，僧虛中流类手鑑，僧淳詩評，王玄詩中旨格，王叡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徐寅雅道机要，白居易金針詩格，梅堯臣續金針詩格和詩評。自緣情手鑑詩格至雅道机要皆晚唐五代人所作，其余除王昌齡詩格、詩中密旨，僧皎然詩議、詩評，皆宋初人伪作。总之皆五代前后产品。

一九三五年冬，北京琉璃厂文友堂書鋪送售明人胡文煥詩法統宗，所收五代前后的詩格，較詩学指南更多僧保暹处囊訣一种。就相同的各种比較勘讀，皆此詳彼略，知詩学指南有节删，不是照原書校印。

一九三七年夏，琉璃厂藜光閣書鋪送售明刊本南宋陈应行吟窗杂录，所收五代前后詩格，与詩法統宗全同，字句亦无大异。知詩法統宗出于吟窗杂录，詩学指南出于吟窗杂录或詩法統宗不可知，但決不外此二書。

詩学指南不是难得之書，上海萃英書局有石印本，我也購得一部。但旣有节删，便不能据見古人之全。文友堂的送售人說詩法統宗是格致叢書的一部分，覈之沈乾一叢書書目，确是全同于格致叢書的評詩类，大概因为格致叢書本是陆續編刊，所以評詩类遂題为詩法統宗，分印單行。当时印了多少部不可知，可知的，除叢書目录外，很少論著。清祁承㸁澹生堂書目詩文評类載詩法統宗本緣情手鑑，題僧虛中撰，張冠李戴，知恐未見原書。叢書書目对于王叡、李洪宣、王玄、文彧、王夢簡、徐寅、徐衍、保暹、虛中，都标为明人，知沈乾一及其所依据的他种叢書目录的編者，恐也未見全書。

藜光閣所送售吟窗杂录題南宋陈应行編，宋明著录皆謂为北宋蔡傳撰，俟后詳論，兹不預及。三書所收詩格，特別是五代人所作十一种，旧唐書經籍志全然不載，新唐書艺文志和崇文总目只載王叡一种，宋史艺文志亦仅載王叡神彧（卽文彧）二种。宋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別集类載王叡詩格和僧虛中詩物象疏类手鑑二种，文史类載疏类手鏡、雅道机要論，和风騷要試三种，疏类手鏡盖卽詩物象疏类手鑑，所以实只四种，而且每种下都注有"闕"字。直齋書录解題云："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其闕者注闕字于逐書之下。"可見在宋代已經极少流傳。至后人补修的史志，顧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仅載雅道机要論一种，別有郑谷齐己黃損三人同撰的詩格一种。考黃朝宗緗素杂記云，"郑谷与齐己黃損共定今体詩格"，但今已亡佚。盧文弨宋史艺文志补，一种不录。專門輯补五代和宋史艺文志的尙且如此，其他不問可知。但直齋書录解題及通考經籍考著录甚詳，知不是后人伪作。

四 王叡炙轂子詩格

全唐詩謂王叡是"元和(八〇六——八二〇)后詩人。"考詩格中引及李郢詩，全唐詩話說李郢是"大中进士"，全唐詩也說是"大中十年进士"。大中为宣宗年号，其十年当公元八五六年。詩格既引及李郢，当然更在其后，說是"元和后詩人"固不誤，但失之寬泛。

吟窗統宗作炙轂子詩格，指南只作詩格。考新唐志宋志崇文总目皆作炙轂子詩格，与吟窗統宗同。晚唐五代的詩格書，似以此为最早。惟其如此，所以此書所提出的"詩格"，大概都比較普通，比較适用，与他書之过于繁密微細者不同。書中首"論章句所起"，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言等詩的起源。次論詩的体裁，計分为三韵、連珠、側声、六言、三五七言，(以上指南无)一篇血脉条貫、玄律、背律、計調、双关、摸写景象含蓄，兩句一意，(指南无此体)句病，句內叠韵，共十四体。十四体中有的是尽人熟知的，如連珠、双关之类，有的是可以因名知义的，如一篇血脉条貫、兩句一意之类；比較生疏的只有玄律、背律、計調三体。

玄律体的詩例是上四字全用側声、上四字全用平声，律全用平、律全用側四种。背律体的詩例是第五句合用側声帶起，却用平声，及不拘常格二种。計調的詩例是李郢的"青蛇上竹一种色，黃叶隔溪无限情，"說："种字合用平，而用側，是計調。"可知三种都是不守格律的格律，近于普通所謂"拗体"。至三种的区别：玄律似是平声或側声的連用；背律則是应用平者用側，或应用側者用平，計調同于背律，不过律指一句的前半句，調指后半句，(就炙轂子詩格言，似是如此)故背律之拗在一句的"帶起"之字，計調之拗則在一句的"計調"之字而已。

五　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

緣情手鑑詩格，吟窗統宗題樵人李洪宣撰，指南亦題李洪宣撰，惟无"樵人"二字。陈振孙直齋書录解題（以下簡称陈录）云："題樵人李宏宜撰，未詳何人，当在五代前。"洪宏音同，宣宜形近，未知孰是。書中所引詩人，止有方干和杜紫薇，都是晚唐人，无五代以后人，謂"当在五代前"，庶几近之。

他所提出的詩格，屬于消极避忌者：如說"詩有五不得：一曰不得以虛大为高古，二曰不得以緩漫为淡泞，三曰不得以詭怪为新奇，四曰不得以錯用为独善，五曰不得以爛熟为隐約。"又說："詩忌俗字'摩挲''抖擻'之类，是也。"（以上指南无）屬于积极提倡者：一、束散法，引詩曰："山暗云凝树，江春水接天。"說："云字，水字，是束散法也。"二、审对法，引方干詩："鶴盤远势投孤嶼，蟬曳殘声过別枝。"說："此卽深失力也，切宜忌之。"三、自然对格，引杜紫薇詩："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須插滿头归。"說："人世菊花，是也。"又說："詩有三格，一曰意，二曰理，三曰景。"（此条指南无）也大都是普通的格律。

六　齐己風騷旨格

炙轂子詩格及緣情手鑑詩格所提出的"詩格"很少，大批的"詩格"的提出，要推齐己的风騷旨格，这或者就是风騷旨格所以风行的原因。書中首說六詩：

一曰大雅，二曰小雅，三曰正风，四曰变风，五曰变大雅，六曰变小雅。

次說詩有六义：

一曰风，二曰賦，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頌。

次說詩有十体：

一曰高古，二曰淸奇，三曰远近，四曰双分，五曰背非，六曰无虚，七曰是非，八曰淸洁，九曰复粧，十曰闔門。

次說詩有十势：

獅子返擲（津逮秘書諸本作擲）势、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毒龙顧尾势、孤鴈失群势、洪河側掌势、龙凤交吟势、猛虎投澗势、龙潛巨浸势、鯨吞巨海势。

次說詩有二十式：

一曰出入，二曰高逸，三曰出尘，四曰回避，五曰幷行，六曰艰难，七曰达时，八曰度量，九曰失时，十曰靜兴，十一曰知时，十二曰暗会，十三曰直拟，十四曰返本，十五曰功勳，十六曰抛擲，十七曰背非，十八曰进退，十九曰礼义，二十曰兀坐。

次說詩有四十門：

一曰皇道，二曰始終，三曰悲喜，四曰隱显，五曰惆悵，六曰道情，七曰得意，八曰背时，九曰正风，十曰反顧，十一曰乱道，十二曰抱直，十三曰世情，十四曰康救，十五曰貞（津逮秘書諸本作眞）孝，十六曰薄情，十七曰忠正，十八曰相成，十九曰嗟叹，二十曰俟时，二十一曰淸苦，二十二曰騷愁，二十三曰眷恋，二十四日想像，二十五曰志气，二十六曰双拟，二十七曰向时，二十八曰伤心，二十九曰鉴戒，三十曰神仙，三十一曰破除，三十二曰蹇塞，三十三曰鬼怪，三十四曰紕繆，三十五曰世变，三十六曰风雅，三十七曰歎羡，三十八曰是非，三十九曰理义，四十曰淸洁。

次說詩有六断：

一曰合題，二曰背題，三曰即事，四曰因起，五曰不尽意，六曰取时。

最后說詩有三格：

一曰上格用意，二曰中格用气，三曰下格用事。

每一种后都沒有解釋，而举出兩句或四句詩为例。如上格用意后举詩曰："那堪怀远路，尤自上高楼。"又詩："九江有浪船难济，三峽无猿客自愁。"

六詩与六义是傳統的旧話，其余是齐己的新說。新說中如十体、十势、二十式、六斷及三格，是作詩的方法；四十門是作詩的題材。自然这是大体的分别，实則題材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选材亦是方法之一，方法亦决定于題材。十体中有背非，四十門中也有背非，所举詩例，同样是"山河終决胜，楚汉且横行"，一方面可見他分門别类的不精确，一方面也可以知道方法与題材的关系密切，所以致使一种跨居兩类。

七 虛中流類手鑑

虛中是齐己的詩友，齐己詩中有謝虛中上人寄示題天策閣詩、謝虛中寄新詩等作。宋秘書省四庫闕目（以下簡称宋闕目）别集类著僧虛中詩物象疏类手鏡一卷，文史类又著疏类手鑑一卷，叶德輝考証謂系重見。今案"疏"字蓋为"流"字形誤。陈录作流类手鑑，吟窗、統宗、指南亦俱作流类手鑑。

書中所提示的，大部分是"物象流类"，共有五十五类之多。头一类是"巡狩，明帝王行也。"最末一类是"土，比信与長生也。"随后是"举詩类别"，大概就是"物象流类"的擇要举例。如举馬戴詩"日落月未上，鳥棲人独行。"說："以上比小人获安，君子失时也。"

又此書重在討論比体，所列物象五十五类，都是比某某也。发端有近似序文的一段話云："夫詩道幽远，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为淺近。眞詩之人，心合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此則詩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

哉?"不过比体固是詩法之一,而无处不用比,无物不作比,甚至以"梧桐比大位",以"羊犬比小物",一則比之不以其类,二則也晦暗不明。

八 徐衍風騷要式

宋闕目文史类著徐衍风騒要試一卷,叶德輝考証云:"按陈录試作式。"陈录云:"风騒要式一卷,徐衍述,亦未詳何时人。"考書中每以齐己、郑谷、虛中諸人詩为例,知在諸人之后,或者是五代宋初人。首云:

> 夫詩之要道,是大圣古人之樞机,故可以頌,可以諷,邇之事父,远之事君。今之辭人,往往自諷自刺而不能覺。前代詩人亦曾微露天机,少彰要道。白乐天云:"鴛鴦綉了从交看,莫把金針度与人。"禅月亦云:"千人万人中,一人兩人知。"以是而論,不可妄授。

知此書与流类手鑑相似,不重在示人以詩的艺术方法,而重在示人以美刺方法。此种方法共分五門:一、君臣門;二、物象門;三、兴題門;四、騷意門;五、琢磨門。(指南,琢磨門为第二,所举詩例亦有倒置。)

君臣門似提示君臣美刺,如举齐己春日書怀:"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謝无私。"說"此是大雅,美帝王盛德之形容也。"举郑谷登渭阳樓詩:"后車能見前車复,今日难忘昔日忧。"說:"此乱时已兆,君暗小人竞进也。"

物象門引虛中云:"物象者,詩之至要,苟不体而用之,何异登山命舟,行川索馬,虽及其时,岂及其用?"足証他頗受虛中的影响。所引当出于流类手鑑,今本失载,知已有殘缺。

兴題門似就題寓諷刺之意,如謂:"野步野眺,賢人观国之光也;……病中,賢人不得志也。"

淑意門原有界說云："美頌不可情奢，情奢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

琢磨門亦有界說云："夫用文字要清濁相半，言虽容易，理必求險，句忌凡俗，意便質厚。"

大概晚唐五代的詩人，虽躲在"象牙之塔"，創作消遣玩味的文艺，而社会喪乱的感发刺激，詩主美刺的傳統見解，使他們不能完全忘世。既不能完全忘世，又懲于元白諷刺詩的遭忌受禍，由是想出种种的微妙的諷刺法。风騷要式固然如此，流类手鑑又何尝不然。从結果言，此种諷刺法幽隐难明，难生实効；从动机言，則已大費苦心了。

九 徐寅雅道机要

宋闕目載雅道机要論一卷，不著作者。陈录載雅道机要二卷，言"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寅撰。"今吟窗、統宗及指南皆一卷，亦題徐寅撰，不知陈录所謂前卷，是否在内？

五代詩話卷六引湧幢小品云："徐寅，莆田人，乾宁中进士。海内多故，依王审知。"旧唐書卷一三四亦称他因献賦梁祖，辞伤后唐武皇，庄宗告王审知使者，認为是父母之讎，不可同天，坐是終于秘書正字。然則他是后梁后唐时人。

雅道机要中首"明門戶差別"，計为隐显、惆悵、相成、乱道、抱直、世情、正教、嗟叹、俟时、清苦、騷愁、睢恋、志气、双拟、向时、伤时、鉴識、神仙、蹇蹇、动靜二十門。（指南不載，注云："后列齐己四十門之半。"）此二十門大体出齐己风騷旨格所說的四十門，惟彼无动靜門，又伤时彼作伤心，鉴識彼作鉴戒，蹇蹇彼作蹇蹇。次"明联句深淺"，共二十种句。（指南不載，注云："后列齐己二十式。"）略同于风騷旨格的二十式；不同者，只有不对句

和十字句兩种；又旨格无悲喜句，但四十門內有悲喜門。次“明勢含升降”，共八勢，洪河側掌、丹凤銜珠、孤雁失群、猛虎跳(旨格作投)澗、龙凤交吟、猛虎踞林六勢，全出风騷旨格的十勢；不同者只有云霧繞山、孤峯直起二勢。(指南不載，注云：“后列齐己十勢。”)次“明体裁变通”，共十体，出于风騷旨格的十体。(指南不載，注云：“后列齐己十体。”)陈振孙謂前卷不知何人，或者因为是录齐己之說，未便据为己有，故未标姓名。但前半虽出于鈔襲，却与后半脉絡联貫，知鈔襲者或者就是徐寅，所以吟窗，統宗及指南一概認为是徐寅所作。惜別无証据，不敢遽然断定。

“明体裁变通”以后是“明意包內外”。次有脫誤，就其所举例証而言，似在敍明題类。次“敍体格”，說：“詩有十一不：一曰不时态，二曰不繁杂，三曰不質朴，四曰不才調，五曰不閑縛，六曰不沈靜，七曰不細碎，八曰不怪异，九曰不浮艳，十曰不僻澀，十一曰不文藻。”次“敍句度”，說：“或語，或句，或含景語，或一句一景，或句中語，或破題，或頷联，或腹中，或斷句，皆有勢向不同，南宗則二句見意，北宗則一句見意。”(原无見意二字，以意校补。自或語以下，指南无。)次“敍搜覓意”，次“敍磨鍊”，次“敍血脉”，次“敍通变”，次“敍分部”，最后“敍明斷”，按名可以知义，故不一一闡敍。虽前半有鈔襲风騷旨格之嫌，但全書所說到的方面較多，所提示的方法亦較細，比风騷旨格、流类手鑑等書，更进步了，同时也更瑣屑了。

十　王玄詩中旨格

陈录无詩中旨格，而有拟皎然十九字一卷，說是：“称正字王元撰，不知何时人。”今詩中旨格亦題正字王玄撰，最后一部分标为拟皎然十九字体，或陈振孙所見不全，否則是全書亦名拟皎然

十九字。观其他部分，与拟皎然十九字体所引詩人略同，知其他部分亦出王玄之手，不是后人伪作。所引詩人，若貫休、莫休、僧扂、僧可、李昌遇、处倫、陈兄、韓熹、西蟾、李鹗、何景山、番复之类，一时别无可考，益知决非伪造，因为伪造者很难找到这多的不甚知名的詩人。至有时代可考者，除王維、孟浩然、戴叔倫、賈島、姚合外，都是晚唐五代人。惟刘昭見宋詩紀事补卷七十六，元昉見宋詩紀事卷九十三，但都无年代行历，与此書所引，不知是否一人？全唐詩載王玄听琴一首，列在"无世次爵里可考者"之下。然則大概是五代时人，宋初或犹生存。

書中发端云："予平生于二南之道，劳其形，酷其思，粗著于篇，虽无遺格之才，頗見隧騷之志。且詩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詩，时明則詠，时暗則刺之。"知全書重在提示詠时刺时的方法，与流类手鑑、风騷要式略同。固然他說："今具詩格于后"，但并不同其他詩格書的提举許多的格律，只是举了八十多首詩例，而于每一詩例后，加上詠时或刺时的考語。如举杜荀鶴詩云："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渾身着苧蔴？"說："此比君子志未就也。"举齐已鶯詩云："曉来枝上千般語，似向桃花話旧情。"說："此得时之意也"。

拟皎然十九字体，是就皎然所提出的高、逸、貞、忠、节、志、气、情、思、德、誠、閑、达、悲、怨、意、力、静、远十九字，加以解釋，实以詩例。如謂："风韵朗暢曰高"，举廖融寄天台逸人："又聞乘桂楫，載月十洲行，"說："此高字格也。"他类是，不具引。

十一 王夢簡詩要格律

陈录載詩格要律一卷，题进士王夢簡撰。今吟窗統宗及指南，亦题进士王夢簡撰，惟書名作詩要格律，未知孰是。

所引詩人，与詩中旨格略相仿，可知者大半是晚唐五代人，不見全唐詩者，有康道、郄殷象、李穎、欧阳皓四人，亦不見宋詩紀事及宋詩紀事补，所以王夢簡大概也是五代时人，是否宋初犹存，也不可知。

晚唐五代的詩格書，可以分为兩大派：一派注重艺术技巧的方法，如风騷旨格与雅道机要；一派注重諷詠时政的方法，如流类手鑑、风騷要式及詩中旨格。此書也許是因为較后出的緣故，兼采兩派之說，旣注重艺术技巧，也注重諷詠时政，所以先言六义，后列二十六門，說："六义合于諸門，卽尽其理也。"

六义就是风、賦、比、兴、雅、頌，不过他的解釋比較异样。他說："风，与諷同义，含皇风，明王业，正人倫，归正宜也。賦、賦其事体，伸冤雪苦，紀功立业，旌著物情，宣王化，以合史籍者也。比、事相于比，不失正道，易明而难辨，切忌比之不当。兴、起意有神勇銳气，不失其正也。雅、消息孤松，白云高僧，大儒雅也。頌、贊詠君臣有道，百执有功于国。"知他所謂六义都离不开政治，而应用六义以作詩者，自然要諷詠政治。所以他的提出六义，是在示人以諷詠政治的方法。

二十六門与风騷旨格的四十門同者，有礼义（旨格作理义）、嗟叹、終始（旨格作始終）、是非、鬼怪五門，但所举詩例不同。又旨格有皇道門，所举詩例为："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此有君臣門，亦举及此詩。其余二十門为高大、忠孝、富貴、怨刺、歌頌、含畜、物理、齐物理、性情、映帶、造化、进退、象外、今古达观、宇宙达观、高逸、了达、大古意、隐靜、恐怖。門类的提出，自然在示人以艺术的技巧方法，但各門都无解題，只举兩三个人的詩为例，而于后面注明合六义的某一种。如宇宙达观門举郑谷詩句："春为沙罗客，家在鷓鴣天。"注明合賦。又举黃損詩句："水憎武

陵門，山忆武陵深。"注明合雅，則艺术的技巧，与六义的諷詠，冶为一爐了。

十二　桂林淳大師詩評

陈录著录一卷，言"桂林僧□淳撰"。僧下注"原闕"二字，吟窗、統宗及指南直題桂林淳大师，或者因为既不知叫什么淳，遂逕題为淳大师。淳大师是何时人不可考。宋詩紀事卷九十二釋子下云："景淳、元丰初桂林僧。"但与此似乎不是一人。因为詩評所引詩，可知者大都是晚唐五代詩，所以作者似是五代宋初人。元丰(一〇七八——一〇八五)是宋神宗的年号，距五代宋初（九六一)已百数十年，与書內所显示的时代不相应。

此書与詩要格律相仿，一方面講詩的含蓄，一方面講詩的格律。講含蓄者如首云："夫(統宗作天，蓋誤)緣情蓄意，詩之要旨也。"又云："詩之言为意之殼，如人間果实，厥狀未坏(統宗作壞，疑誤)者，外殼而內肉也；如鉛中金，石中玉，水中鹽，色中膠，皆不可見，使天下人不知詩者，視至灰劫，但見其言，不知其意，斯为妙也。"后来严羽滄浪詩話称贊"盛唐詩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为千古講詩学者所称誦，显然受詩評的影响；然則詩評的价値已于此可見了。

至講到詩的格律，詩評先分为象外句、当句对、当字对、假色对、假数对、十字句、十字对、鏤水八格。惟鏤水格下有解題云："著句輕淸，好看也。"(統宗无著字，好上有暫字。)其余皆只举詩句例，幷无解題。大概因为义甚明显，所以不用解題。又云："凡为詩要識体勢，或狀同山立，或勢若河流。"因此又立二勢格，一是盤古格，一是騰驤格。二种勢格，各举了若干詩例。于盤古格

詩例后云："以上幷是形勢，但不得动。"于騰驤格詩例后云："以上幷是語勢，不定作用者也。"二者比而观之，或者狀同山立者曰盤古格，勢若河流者曰騰驤格。至此二格与前八格不同者，前八格說"句"，此二格說"勢"。

句格勢格以外，又說："詩有三体，一曰詩人之体为上，二曰騷人之体为中，三曰事流之体为下。"（指南无）又說："詩有二断，一曰离題断，二曰抱題断。"又說："詩有四題体，一曰第一句見題，二曰第二句見題，三曰第三句見題，四曰第四句見題。"題体是入題，題断是結題，其义甚明，无庸申述。至就全篇而言，則別列独体、摘縱二格。独体格举廖处士游般若寺上方詩，說："此詩只說寺中意，別无作用，故名独体。"然則独体近于賦比兴的賦体。至摘縱格則近于文章家所謂大开大合，发端离題很远，最后才急轉扣題。

十三　文彧詩格

吟窗、統宗題文彧詩格，沙門文彧撰；指南只題詩格，僧文彧撰。宋詩紀事卷九十一云："文彧号文宝大师，有詩格。"但陈录、通考、宋志，均作神彧，諒即一人。宋詩紀事沒有說到他的生卒，詩格所引詩，标明作者都是晚唐五代人，知或是五代宋初人。

書中共分八部分：

一論破題，謂詩有五种破題：一曰就題，"用題目便为首句是也。"二曰直致，"就題中变其事以为首句是也。"三曰离題，"外取其首句，免有伤触是也。"四曰粘題，"破題上下二句，重用其字是也。"五曰入玄，"取其意句綿密，只可以会意，不可以言宣也。"

二論頷联云："一曰句到意不到，二曰意到句不到，三曰意句俱到，四曰意句俱不到。"

三論詩腹云:"亦云景联,与頷联相应,不得錯用。"

四論詩尾云:"亦云断句,亦云落句,須含蓄旨趣。"

二种皆未細分。論詩尾引春閨詩:"欲寄迴紋字,相思織不成。"說:"此乃意句俱到也。"知詩腹詩尾亦按意句分为四种,以已詳頷联,故未重說。

五論詩病云:"为詩者难得全篇造于玄妙。"知是泛言詩中的毛病,并不同于六朝隋唐的声病說。

六論詩有所得字云:"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义。"

七論詩势云:"詩有十势:一曰芙蓉映水势,二曰龙潛巨浸势,三曰龙行虎步势,四曰獅擲(疑夺一势字),五曰寒松病枝势,六曰风动势,七曰惊鴻背飞势,八曰离合势,九曰孤鴻出塞势,十曰虎縱出群势。"龙潛巨浸势已見风騷旨格,獅擲势或即同于风騷旨格的獅子返擲势,孤鴻出塞势或即同于风騷旨格的孤雁失群势。大概是因风騷旨格而又别增几势。

八論詩道云:"至玄至妙,非言所及,若悟詩道,方知其难。"可謂不道之道了。

十四 保暹處囊訣

宋詩紀事补遺卷九十六云:"保暹字希白,金华人,普惠院僧。喜为詩,著有青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陈充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光緒金华县志卷十一人物傳,与此略同,惟青囊訣作处囊訣。(储皖峯先生告知)陈录、通考,亦皆作处囊訣,今吟窗、統宗亦皆作处囊訣。

其他詩格書率注重艺术技巧或諷刺方法,处囊訣則注重詩之用,首云:"夫詩之用,放則月滿烟江,收則云空岳瀆,而情忘道合,父子相存;明昧已分,君臣在位;感动神鬼,天机不測:是詩

之大用也。”又云:“夫詩之用也,生凡育圣,該古括今,恢廓含容,卷舒有据,是詩之妙用也。”又云:“詩有五用,一曰其靜莫若定,二曰其动莫若情,三曰其情莫若逸,四曰其音莫若合,五曰其形莫若象。”其所謂用并不同于普通的以詩刺政治,或以詩察民风,而是一种神密的不可思議的享受之用。这当然与保暹是僧人有关,但晚唐五代本以詩为消遣玩味的艺术,神密的享受主义不过是消遣玩味的进一步而已。

至講到格律,他以为“詩有七病:一曰駢經之病,二曰鈎鎖之病,三曰輕浮之病,四曰剪辞之病,五曰狂辞之病,六曰逸辞之病,七曰背題离目之病。”又云:“詩有四合題目:一曰放意远,二曰得句新,三曰語常用事密,四曰莫与古人用事同。”又云:“詩有眼。”所謂眼,就是詩中的主眼,如举賈生逢僧詩:“天上中秋月,人間半世灯。”說:“灯字乃是眼也。”盖又由五代的体势比兴的格律,进于宋代的詩病詩眼的格律了。

第三章　詩　格（下）

一　舊題魏文帝詩格

除了上章所述的十一种詩格以外，还有伪托的魏文帝詩格、賈島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詩格、金針詩格、梅堯臣續金針詩格、詩評六种，伪托的时代大概也在五代以至北宋。

吟窗，統宗，指南都收有魏文帝詩格。四庫提要卷一九七詩文評类存目，吟窗杂录下云："开卷魏文帝詩格一卷，乃盛論律詩，所引皆六朝以后之句，尤不足排斥。"考文鏡秘府論，未引及此書，知伪托的时代，大概在遍照金剛以后。書中的八病条平头下引及梅圣俞，知伪托的时代，直然在伪托的續金針詩格之后。但八病条所述即沈約所立八病，見于秘府論西卷的文二十八种病。（詳三篇五章一节）八对条所述为：正名、隔句、双声、叠韵、連綿、异类、迴文、双拟八对，見于秘府論东卷的文二十九种对。（詳四篇一章三节）还有六志条，亦与秘府論地卷的六志类，大致从同。茲校列于下：

直言志（詩格无志字，下同）——"直言志者，（此句詩格无）謂的中物体，指事而言，不借余风，别論其詠。（二句詩格无）即擬作（三字詩格作如）屏风詩曰：'綠叶江中夏，紅花雪里春。（二句詩格无）去馬不移迹，（詩格作足）来車岂动輪。'"（詩格作尘）

二、比附志——“比附志者，（此句詩格无）謂論体写狀，寄物方形，意托斯間，流言彼处。（二句詩格无）即擬作（三字詩格作如）贈別詩曰：‘离情絃上怨，別曲雁边嘶。低（原注別本行）云百种（原注又作千过）鬱，垂露几（原注又作千）行啼。’”（二句詩格无）

三、寄怀志——“寄怀志者，（此句詩格无）謂含情鬱抑，語帶譏微，事列膏肓，詞褒譎詭。（二句詩格无）即擬作（三字詩格作如）幽蘭詩曰：‘日月虽不照，馨香要自丰；（二句詩格无）有怨生幽地，无情（秘府論作由）逐远风。’”

四、起賦（詩格作賦起）志——“起賦志者，（此句詩格无）謂行行論古事，指列今情，模春秋之旧风，起笔札之新号，或指人为定，就行以題篇；或立事立成規□□□□。由不遣笔，附申名号，論志浮言，例此之徒，皆名起賦。即擬作賦得魯司寇詞，詩曰：‘隐見通荣辱，行藏备卷舒。避席談曾子，趋庭誨伯魚。’”（詩格作：“賦起謂就迹題篇，因事遣笔。如讚魯司寇詩‘避席談曾子，趋庭誨伯魚。’”）

五、貶毁志——“貶毁志者，謂指物实佳，兴文道惡，他言你是，我說官非，文笔見貶，言詞致毁，証善为惡，因以名之。即擬作田家詩曰：‘有意嫌千古，无心羡九卿，且悅邱园好，何論冠盖生。’”（詩格作：“貶毁謂指物实佳，兴文要毁其美。如田家詩‘且悅邱园死，未甘冠盖荣。’”）

六、讚誉志——“讚誉志者，謂心珍賤物，言貴者不如意重，今人先賢之莫及。詞褒笔味，玄欺丰岁之珠，語讚文峯，剧胜飢年之粟。小中出大，短內生長，拔滯昇微，方云讚誉。即擬作善人詩，詩曰：‘宋獵何須說，虞姬未足談。頰态花翻愧，眉成月例慚。’”（詩格作：“讚誉謂小中出大，短內生長。如古詩‘糚罢花更

愧，眉成月对暫。’”）

由此知伪托的时代虽然很晚，征存的詩説則或者很早。

二 舊題賈島二南密旨

新唐志、崇文总目，俱載賈島詩格一卷，宋志作詩格密旨，陈录及通考俱作二南密旨，蓋即一書。陈录云：“凡十五門，恐亦依托。”今本亦作二南密旨，四庫提要卷一九七詩文評存目一据“于陈氏所云十五門外，增立四十七門，”且“輾轉推寻，数皆不合，”断为“伪本之重儓”。实則謂不是賈島作是对的，因为与賈島时的詩风不相应；謂是“伪本之重儓”，則不見得。王玄的詩中密旨，陈录只載拟皎然十九字一部分，但其余部分，我們知道也不是后人的伪作。（詳前章十节）二南密旨最末題云：“以上十五門，不可妄傳，”陈氏或据此說是“凡十五門”，不知十五門外，还有其他部分。这是因为陈氏对这些詩格虽惠予著录，但非常卑視，由是不細細翻閱，便草草“解題”。因此，如沒有別的証据，只据陈录断为“伪本之重儓”，是很危險的。

四庫提要又詆其“以盧綸‘月照何年树，花逢几度春，’句为大雅；以錢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句为小雅；以卫风‘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句为变大雅；以‘綠衣黃裳’句为变小雅；以召南‘林有朴遬，野有死鹿’句，及鮑照‘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昇’句，錢起‘竹憐新雨后，山爱夕阳时’句为南宗；以卫风‘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句，左思‘吾爱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盧綸詩‘誰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句为北宗，皆有如囈語。其論总例物象一門，尤一字不通。”但五代前后的詩格却正是如此。即如尽人皆知的风騷旨格即以“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謝无私”为大雅；以“天流皓月色，池散芰荷香”为小雅；以“蟬离楚树鳴犹少，叶到嵩

山落更多”为变大雅；以“寒禽粘古树，积雪占蒼苔”为变小雅，与此毫无兩样。以四庫館臣的眼光看来，也应当是“有如囈語”。近儒多謂，“雅”指語音歌調而言，但过去的学者偏要說“风正四方謂之雅”。以今視之，何尝不是“有如囈語”。不过我們要知道，就对詩經上的风雅頌的解釋而言，固是穿凿附会；若就倡此說者的見解而言，正是他的一种主張。过去的中国著述界，本来是“以述为作”的，如認为是“述”，那自然有点文不对題；但我們不要忘記，他本来是借以表現自己的見解的。

“南宗”“北宗”之分，也是那时的說法。如流类手鑑便說：“詩有二宗，第四句見題是南宗，第八句見題是北宗。”这种說法的来源，未曾深考；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类云：“司馬迁为北宗，賈生为南宗”，可見至晚在中唐便已經有了。“总論例物象”是一种比況的抒写方法，如举天地、日月、夫妇、說是“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虽然我們也嫌其晦澀难明，但这也是那时流行的詩說，如流类手鑑便差不多全是这种方法的提叙。所以作者虽不是賈島，但大概出于五代前后，决不是“伪本之重儓”。

書中首論六义，次論风之所以、风騷之所由、二雅大小正旨、变大小雅；次論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四庫提要都提过了。次論立格淵奥，說詩有三格，一曰情，二曰意，三曰事；就題可以知意，无庸贅叙。次論古人道理一貫，是說“詩教古今之道皆然”的。次論題目所由，說題目“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則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窺万象。”次論篇目正理用，是說各种篇目的作用，如說“夢游仙、刺君臣道阻也，水边、趋进道阻也。”此类末有“以上四十七門略举大綱也”十一字，四庫提要說“輾轉推寻，数皆不合。”今案此类共举二十九門，前边論六义六門，自論风之所以至論变大小雅共四門，論南北二宗及南宗例、北宗例共三門，詩格

情、意、事三門，古今道理一貫一門，題目所由一門，恰为四十七門，或卽指此。次論物象是詩家之作用，次論引古証用物象，次总論例物象，都是講以物象比况"君臣之化"的。次論总显大意，次論裁体升降；前者是論詩意的，后者是論詩体的。最后有"以上一十五門，不可妄傳"十字，与陈振孙所言相合。但如除去前边的四十七門，实只五門，不知是否"十"字衍文，假使"十"字是衍文，則"一"字当然是后人所加了。

三 舊題白居易金針詩格及梅堯臣續金針詩格

金針詩格和文苑詩格的不作于白居易，續金針詩格和詩評的不作于梅堯臣，是无問題的，問題在伪作的时代。胡仔苕溪漁隐叢話前集卷八引詩眼云："世俗所謂乐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煉句不如煉意'，非老于文学者，不能道此。又云：'煉字不如煉句'，則未安也，好句須有好字。"今金針詩格托白居易云："自此味其詩理，撮其体要，为一格目，曰金針集。"可見詩眼所謂金針集，就是金針詩格。所引"煉句不如煉意"，"煉字不如煉句"，在書中的詩有四煉条。（詩学指南本无，因彼非全本。）漁隐叢話未言詩眼作者，考郡齋讀書志、直齋書录解題、通考經籍考幷著潛溪詩眼一卷，或卽此書。晁公武云："范温元实撰。温、祖禹之子，学詩于黃庭坚。"詩眼已引及此書，則其年代更在前可知。至續金針詩格，实是金針詩格的改裝。二書的异同如下；

（金針詩格）	（續金針詩格）
詩有內外意。	同。
詩有三体。（以声律为竅，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	詩有三本。（声律为竅一，物象为骨二，意格为髓三。）
詩有四格。（十字句格，十四字	同。

句格，双字句格，拗背字句格。）	
詩有四煉。（煉字，煉句，煉意，煉格。）	同。（缺煉格，蓋由脫誤。）
詩有五忌。（格弱，字俗，才浮，理短，意杂。）	同。（惟格弱作格懦。）
詩有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鶴膝，大韵，小韵，傍紐，正紐。）	同。
詩有五理。（美，刺，規，箴，誨。）	同。
詩有三体格。（頌，雅，风。）	詩有三体。（同。）
詩有喜，怒，哀，乐四得之辞。	詩有四得。（喜，怒，哀，乐。）
詩有上中下。	同。
詩有四齐梁格。（四平头，余三种缺。）	詩有齐梁格。（四平头格，双側双平格，兩平头格，余一种缺。）
詩有扇对格。	詩有扇对。
詩有三般句。（自然句，容易句，苦求句。）	同。
詩有七义例。（一曰說見不得言見，二曰說聞不得言聞，三曰說远不得言远，四曰說靜不得言靜，五曰說苦不得言苦，六曰說乐不得言乐，七曰說恨不得言恨。）	詩有七不得。（說見不得言見，說聞不得言聞，說远不得言远，說靜不得言靜，說苦不得言苦，說乐不得言乐，說恨不得言恨。）

詩有物象比。　　　　　　　　　　　同。（解例不同。）

此外金針詩格有，而續金針詩格无者，惟詩有四不入格，（輕重不等，用意太过，指事不实，用意偏枯）詩有魔有癖，詩有数格，（葫蘆、轆轤、进退）詩有六对，（上官仪六对說）破題，落句，詩有二家，（詩人、詞人）几条而已。所以續金針詩格大概是金針詩格的改裝。

改裝的年代不可考。但既托之梅圣俞，当然在梅圣俞之后。南宋初年的晁公武所作郡齋讀書志已載有此書，当然在晁公武之前，然則虽不知确切的年代，而約略的年代可知了。

大概宋初承晚唐五代之緒，頗講究格律，所以有許多"詩格"書。至欧阳修等改革詩体以后，才換一个新局面。但新局面来了，也还有人留恋于旧的窠臼，此書便是其中的一例。不过风燭殘年，命运极短，所以稍后的詩眼，便加以駁斥了。

四　舊題白居易文苑詩格

此書也当然是伪品，——是欧阳修等改革詩体以后的留恋于旧窠臼的伪品。陈录云："称白氏，尤非也。"

作者似頗重意境。第一条为叛結束，而起首却云，"为詩須叛意解題"。又云，"不离叛意"。此外若影帶宗旨，抒折入境意，招二意境，語旁意远，叙旧意等条，也都是講意境的。

意境以外，就是对屬。如依帶境条云："为詩实在对屬，今学者但知虛实为妙。"菁华章条云："詩有对屬，方知学之淺深。"其次是雕藻文字。其次是精頤以事，就是普通所謂用事。

此書所以名文苑詩格者，盖以不只論詩格，且及于文苑。如精頤以事条云："若古文用事伤浮艳，不用事又不精华；用古事似今事，为上格也。"益見其伪作时代，在欧阳修等提倡古文以

后也。

五　舊題梅尧臣梅氏詩評

陈录著詩評一卷，謂“不知作者”。不知是否卽梅氏詩評？梅尧臣是宋初的革新詩人，他革除刻鏤格律，提倡自由抒写，当然不作“詩格”“詩評”書，所以其伪无疑。至其伪作的年代，大概与文苑詩格諸書相先后，也是詩体改革以后而仍留恋于旧窠臼的作品。

首言詩有八势，而只列毒龙势、灵凤合珠势、猛虎出林势、鯨吞巨海势，疑今本或者不全。所举四势，都見风騷旨格，不过此另举詩例，不尽襲旨格而已。次言詩稟六义，亦各举例詩。次举賈公、周朴、齐己、賈島、杜寂諸人詩，而于后加一二句的解釋。所以名为詩評者，或卽在此。除沿襲晚唐五代人的意見外，毫无新解。可見卽沒有欧阳修一班人改革詩体，此种詩体也已自掘墳墓了。

六　惠洪天厨禁臠及林越少陵詩格

欧阳修等改革詩体以后而仍留恋于旧窠臼的詩格，还有僧惠洪的天厨禁臠、林越的少陵詩格，也姑附述于此。我們就采用四庫全書总目提要的提要吧。天厨禁臠二卷，总目提要列于詩文評类存目，言：

> 是編皆标举詩格，而举唐宋旧作为式。然所論多强立名目，旁生支节。如首列杜甫寒食对月詩为偸春格，而謂黄庭坚茶詞叠押四“山”字为用此法，則风馬牛不相及。又如苏軾“芳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归”句，黄庭坚“平生几兩屐，身后五車書”句，謂射鴈得苏武書无“鴻”字，故改謝灵运“春草池塘”为“芳草”，五車書无“身后”

字，故改阮孚"人生几兩屐"为"平生"，謂之用事补綴法，亦自生妄見。所謂古詩押韵換韵之类，尤茫然不知古法。严羽滄浪詩話称天廚禁臠最害事，非虛語也。

少林詩格一卷，亦列詩文評类存目，言：

是篇发明杜詩篇法，穿凿殊甚。如秋兴八首第一首为接項格，謂"江間波浪兼天涌"，为巫峽之蕭森，"塞上风云接地阴"，为巫山之蕭森，已牵合无理。第二首为交股格，三首曰开合格，四首曰双蹄格，五首曰續后格，六首曰首尾互換格，七首曰首尾相同格，八首曰單蹄格，随意支配，皆莫知其所自来。后又有詠怀古蹟諸將諸詩，亦閑及他家，每首皆标之詩名，种种杜撰，此眞强作解事者也。

惠洪在徽宗大观中游張商英之門，当北宋末年；林越别有汉雋十卷，前有高宗紹兴壬午自序，当南宋初年。这时已經不是詩格的时代，而他們还在大作詩格書，大半是由于过去历史的影响，不是由于当时文学的需要，就著作的动机而言，也只有附述于五代前后的詩格書，为比較恰当。

七 已佚的詩格書

五代前后的詩格書，我們能較世人多見到十种以上，不能不認为是意外的收穫，同时也意外的欢喜。但不要过分的自鳴得意，我們并沒有見到五代前后的詩格之全，这是无可如何的，因为已經散亡了。茲將略可考見者列下：

一、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見新唐志及通志。宋志載王枳詩格一卷，枳下注云一作起，疑卽一書。

二、郑谷国风正訣一卷——見宋志。

三、僧齐已玄机分明要覽一卷——見宋志。

四、又詩格一卷——見宋志。疑卽风騷旨格。

五、郑谷僧齐己黄損今体詩格——湘素杂記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損等，共定今体詩格云：'凡詩用韵有数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进退。葫蘆韵者，先二后四；轆轤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录載唐介为台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庙怒，謫英州别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众，独李师中待制一篇，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輕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此正所謂进退韵詩也。按韵略难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还字又在二十七，一进一退，誠合体格，岂率尔而为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当时唐李对答語言，乃以此詩为落韵詩，盖渠伊不見郑谷所定詩格有进退之說，而妄为云云也。"（引見詩人玉屑卷二，又詩林广記卷四李师中送唐介詩后）又苕溪漁隐叢話后集卷三十四，苕溪漁隐曰："郑谷等共定今体詩格。"惟只載一进一退韵，无葫蘆轆轤二格。宋闕目載有今体詩格一卷，未著作者，不知与此是否一書。

六、任藩文章元（玄）妙一卷——見陈录及通考。陈录云："言作詩声病对偶之类。"通志文史类載任博文章妙格一卷，未知是否一書？

七、任博新点化秘术一卷——見通志、宋闕目。通志"新"作"詩"。

八、齐陆机分别六义訣一卷——見宋闕目。

九、徐三极律詩洪范一卷——見宋闕目、通志。

十、徐蜕詩律文格一卷——見宋闕目、通志。宋志載徐蜕詩格一卷，盖即此書。崇文总目載詩律大格一卷，未著作者。"大"疑为"文"之誤，果尔，亦即此書。

十一、閻东叟风雅格五卷 見通志。

十二、張天覺律詩格——苕溪漁隐叢話后集卷三十四云："梅圣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范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庙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类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国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飞远，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飞远"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处昏乱朝廷而乐道也。"芳草有情皆碍馬，好云无处不遮楼。""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力之輩，"云"喻諂佞之臣，"楼"比鈞衡之地。若此之类，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风骚之体也。'其說数十，悉皆类此。

十三、李邯鄲詩格——許彥周詩話云："李邯鄲公作詩格，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尽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又滄浪詩話詩体反复条下注云："举一字而誦皆成句，无不押韵，反复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二字詩。"(詩人玉屑引作二十字)又藏头歇后等体条下注云："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臠，最为誤人。今此卷有旁参二書者，蓋其是处不可易也。"李公蓋卽李邯鄲。滄浪詩話自云："今此卷有旁参二書者"，知其詩体一卷，很多是本之李公詩格的，不过李公詩格既佚，无从比勘罢了。

十四、杜氏十二律詩格一卷——見宋闕目。通志載杜氏詩律詩格一卷，蓋卽一書。

十五、夏侯籍詩評一卷——見宋闕目。

观此，更可見五代前后講究詩格之盛了。

八 詩格總集——李淑詩苑類格

一种学問的既經发达之后，便有人集合各家之說，加以系統的类述或研究。如先秦諸子发达之后，便有"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兩宋詩話发达之后，便有阮閲詩話总龟、胡仔苕溪漁隐叢話一类的詩話总集。同样，五代前后既有大批的詩格書，当然的要在北宋产生总述詩格之書。就今所知，一为李淑的詩苑类格，是詩格总集；一为蔡傳的吟窗杂录，是詩格叢書。

詩苑類格已經散亡。尤袤遂初堂書目无卷数，晁志、陈录皆作三卷。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作宝元詩苑类格，言："(仁宗宝元)二年(一〇三九)，翰林学士李淑，承詔編为三卷。上卷首以眞宗御制八篇，条解声律为常格，別二篇为变格。又以沈約而下二十二家評詩者次。中卷叙古詩杂体三十門。下卷叙古人体制，別有六十七門。"此說是宝元二年，晁志則云："宝元三年，豫王出閤为王子傅，因纂成此書上之，述古賢作詩体格。"(鈔本。袁本及通考有"总九十目"四字。)

略可考見者，如詩人玉屑卷五引称："詩有三偸：偸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淸'陈王'日月光天德'，是也。偸意事虽可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树秋，'沈約'小池殘暑退，高树早涼归，'是也。偸势才巧意精，各无朕迹，蓋詩人偸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归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双鯉魚，目送千里雁'是也。"提倡偸势，似出五代前后的詩格書。

詩人玉屑卷七又引称："唐上官仪曰，詩有六对，……又曰詩有八对。"(詳四篇一章四节)則是初盛唐人的对偶說。本来从历史的源流而論，五代前后的詩格說，实出于初盛唐的对偶說，所以对偶說与詩格說是一貫的。困学紀聞卷十八上云："詩苑类格

謂回文出于竇滔妻所作。”其說源出何書不可考，約之也是講体格的。惟詩人玉屑卷十六引称：“白乐天諷諭之詩長于檄，閑适之詩長于遣，感伤之詩長于切，律詩百言以上長于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于情。”其說源出于元稹的長庆集序，固然也是講詩体的，但与五代前后所講的詩的体格不很一样。盖以李淑作詩苑类格时，已在北宋的中叶，格律之說虽仍盛行，而所謂詩体改革命的反格律者，已逐漸滋長，故虽以格律为主，而所收实較宽泛了。㊀

九　詩格叢書——蔡傳吟窗雜錄

我所購藏的明刊本吟窗杂录內容如下：

卷一　魏文帝詩格

卷二　鍾嶸詩品

卷三　賈島二南密旨

卷四、五　白乐天文苑詩格、王昌齡詩格

卷六　王昌齡詩中密旨、李嶠評詩格

卷七　僧皎然詩議、中序

卷八、九　僧皎然詩式

卷十　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徐衍风騷要式

卷十一　齐己风騷旨格

卷十二　沙門文彧詩格

卷十三　金华保暹处囊訣、釋虛中流类手鑑、桂林淳大师詩評

卷十四　李商隐梁詞人丽句、正字王玄詩中旨格

㊀ 此外王靜安人間詞話卷下云：“李淑詩苑伪造沈約之說，以双声叠韵为詩中八病之二。”未悉何本，待考。

卷十五　炙轂子王叡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

卷十六至十八上　徐寅雅道机要

卷十八上、下　白居易金針詩格、梅堯臣續金針詩格、詩評

卷十九至二十九　历代吟譜

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古今才妇

卷三十二　古今詩僧

卷三十三、四上　古今武夫、夷狄、本朝詩人

卷三十四下　古今杂体、联句、謎

卷三十五、六、七　句图、句对、續句图

卷三十八至四十　詩品

卷四十一　杂序、叙录

卷四十二、三、四　續句图

卷四十四、五　續事志

卷四十六　寄僧、神仙

卷四十七　高逸、夢、幼悟

卷四十八　譏憤、嘲戏、歌曲

卷四十九　琴、棋、書、画、香、乐、茶、酒、硯、紙、笔、杂題

卷五十　杂題、杂詠、契員、詩余

收录这么多的詩格，所以可推为詩格叢書。此題陈应行編，陈录通考皆称蔡傳撰，毛晋亦称蔡氏著，知原出蔡傳，而此本或由陈氏重編。陈录云："莆里蔡傳撰。君謨之孙也。取諸家詩格詩評之类集成之。又为吟譜，凡魏晋而下，能詩之人，皆略具其本末，总为此書。"毛晋跋风騷旨格云："莆里蔡氏著吟窗杂詠，載諸家詩格詩評类三十种。大略眞贋相半，又脱落不堪讀。丙寅春，从云間公予內父遺書中，简得齐己白蓮集，末載风騷旨格一卷，与蔡本迥异，急据之以正諸本之誤云。"通考亦作吟窗杂詠，知当时有

杂詠一名。陈录通考都作三十卷，此本作五十卷，或者"三十"是"五十"之誤；否則蔡傳原書至吟譜而止，古今才妇以下，出陈应行續补，所以陈录未曾提及。此本至吟譜共二十九，其余一卷当为卷三十五以下之句图及卷四十二以下之續句图。陈录于杂句图一卷下注云："自魏文帝詩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見吟窗杂录。"檢魏文帝詩格而下，杂句图而上，所著录者，除无名氏詩三話一卷，欧阳修詩話一卷，司馬光續詩話一卷，不是詩格，理应除外，其余为王昌龄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李嶠評詩格一卷，賈島二南密旨一卷，白居易文苑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五卷，詩議一卷，齐己风騷旨格一卷，种或(泽案即文彧)詩格一卷，保暹处囊訣一卷，盧中流类手鑑一卷，□淳詩評一卷，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王叡炙轂子詩格一卷，王夢簡詩格要律一卷，李宏宜緣情手鑑詩格一卷，徐衍风騷要式一卷，不著名氏琉璃堂墨客图一卷，徐寅雅道机要二卷，白居易金針詩格一卷，梅堯臣續金針詩格一卷，不知名氏詩評一卷，宋太宗眞宗御选句图一卷，張为詩主客图一卷，李洞句图一卷，任藩文章元妙一卷，李淑詩苑类格三卷，林和靖摘句图一卷(未詳作者)，黄鑑楊氏笔苑句图一卷，惠崇惠崇句图一卷，孔道輔孔中丞句图一卷，幷魏文帝詩格及杂句图共三十家，較二十七家多出三家。毛晋亦謂"載諸家詩格詩評类三十种"，則似以三十家为是。但与此本多不合，或者也是出于陈应行的增删。

十　賦格及文格

五代前后，不惟有大批的詩格書，还有賦格書和文格書，也姑附述于此。

賦格書，中唐已經有之，如張仲素賦樞三卷，范傳正賦訣一

卷，浩虛舟賦門一卷，白行簡賦要一卷，紇干俞賦格一卷。（詳四篇一章二节）这是因为赋是富丽的唯美文学，不容易跟着文章載道，也不容易跟着詩歌刺时，所以在文以載道、詩以刺时的中唐时代，独自躲在社会的一角，适应科举的以賦取士，講講格律，弄弄声調。固然那时也以詩取士，但因为詩人要以詩刺时，——就是以詩“洩导人情”，“补察时政”，所以不能跟着賦講格律。

五代前后的賦格書，現在可以見到的，只有毛友左傳类对賦六卷，載于宋史艺文志。我購得清初刻本一部，書中將左傳事文，制为偶語，以供賦家采用，并沒有講明格律，不能算是眞正賦格書。眞正賦格書可以考見者，有下列三种：

一、和凝賦格一卷——見宋志。

二、宋祁賦訣二卷——見宋闕目。

三、馬稱賦門魚鑰十五卷——見宋志、宋闕目、陈录、通考。宋闕目作二卷，疑誤。陈录云：“集唐蔣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諸家律賦格訣。”

此外陈录及通考俱著宾朋宴話三卷，陈录云：“太子中舍致仕貴溪邱昶孟阳撰。南唐进士，归朝宰数邑。著此書十五篇，叙唐以来詩賦源流。天禧辛酉，邓賀为序，”又新唐書艺文志著刘蘧应求类二卷，（詳四篇一章二节）通志載李淑制朴三卷，大概都是講科場文学格律的。唐宋試士皆有賦，所以大概也講到賦格。惟刘蘧虽当然是唐人；但在唐代何时则不可考。

文格書可考見者，有下列四种：

一、孙郃文格二卷——見新唐志、宋志、崇文总目及通志。

二、馮鑑修文要訣二卷——見宋志、宋闕目、遂初堂書目、晁志、通考及通志，通志无卷数。晁志云：“杂論为文体式，評其謬誤，以訓初学云。”

三、王瑜文旨一卷——見宋志、崇文总目及通志。宋志作王瑜卿。

四、王正范文志龟鑑五卷——見宋志。倪宥的文章龟鑑疑为詩句图，(詳下章七节)此談詩談文不可知，姑附于此。

此外若任藩文章玄妙一卷，陈录云，"論詩而若此，岂复有詩矣，"当然是詩格，故列于已佚的詩格書中。然通志分文史、詩話二类，詩格書皆列入詩話类，此独列入文史类，又似为文格書。或者兼論詩文，亦未可知。

十一　反詩格的言論

中唐的社会詩和社会詩論，抵不住封建統治者的压迫，逐漸的或逃于色，或逃于艺。逃于色，便鼓吹色情的文学理論；(詳一章六节)逃于艺，便制造詩格及詩句图。到赵宋統一天下，政治又由分而合，社会又由乱而治，所需要的文学，又逐漸的不复是肉感的满足和艺术的欣賞，而是世俗的教导和性情的陶冶，所以有欧阳修等的改革詩体。改革的对象，无疑的就是五代前后的恣情声色和究极格律的詩以及这种詩的理論与方法，所以极力的反对詩格。如蔡寬夫詩話云：

> 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为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擲、毒龙顧尾等势。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尘。"目曰調笑格，以为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欄干更上处，結締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語突兀，声势蹇澀。此岂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陈振孙直齋書录解題于文章玄妙下云：

論詩而若此，岂复有詩矣！唐末詩格汙下，其一时名人著論傳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

这眞是对五代前后詩格的一种当头棒喝。严羽滄浪詩話謂"李公詩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臠，最为誤人，"(詳七节)也是反詩格的言論。五代前后的詩学書率名为"詩格"，欧阳修以后的詩学書率名为"詩話"，也显然的說明了"詩話"是对于"詩格"的革命。所以詩話的兴起，就是詩格的衰灭，后世論詩学者，往往混为一談，最为錯誤。

第四章　詩句圖

一　詩句圖的淵源

五代前后有大批的詩格書，同时还有大批的詩句图。詩格的目的在提示作詩方法，詩句图的目的在提示詩句典型，二者是相輔而行的。

詩句图的淵源，大概出于唐人的摘选秀句。在詩格的第一个时代，——就是初盛唐的講对偶的时代，已有元兢撰古今詩人秀句二卷，僧元鉴和吳兢合撰續古今詩人秀句二卷。（詳四篇二章三节）此后的詩，大半側重描写社会，諷詠政治，所以沒有詩格書，也沒有詩人秀句書。至五代前后，因了社会的关系，又逼着詩走到艺术技巧一方面，詩格書及詩人秀句或詩句图，也遂应运而生。在中晚唐之交，姚合作有詩例一卷，其書已佚，无从查考。但既以"例"名，似乎重在提示例句，果尔，与秀句及句图的性質也很相近。他又有极元集一書，韋庄据而"采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也是注重"清詞丽句"的。吟窗杂录載有李商隐梁詞人丽句一卷，書名已經标明"丽句"。此外黃滔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按名思义，当然也是集秀句的書籍。王起有文場秀句一卷，通志艺文略列在詩話类，新唐書艺文志則列之总集类，大概是在撰集文場詩賦秀句。可見撰集丽句，在五代前后已形成一时的风气，所以产生了專門选集丽句的詩句图。

二　李商隱梁詞人麗句

李商隐集的梁詞人丽句，見吟窗杂录卷十四，四庫全書提要斥为依托。（詩文評类存目，吟窗杂录提要）然所集蔡延休游道上观二句，褚珪歲暮二句，岑之元夢韋琳所贈鬼詩四句，都不見全梁詩；王衡（原作主衡，蓋誤）宿郊外曉作四句，王湜贈情人四句，全梁詩虽載入，但注明見梁詞人丽句；惠慕道士犯虜將逃八句，亦注明見梁詞人丽句，又注云，"文苑英华作顏之推"，題云"从周入齐夜渡砥柱"，由是又收入全北齐詩顏之推名下。㊀儲皖峯先生校云：

> 峯按此詩，詩記作北齐顏之推詩，題为"从周入齐夜渡砥柱"，似可信据，拙編汉魏六朝詩选从之。文鏡秘府論卷三"东""論对"，"第二十八叠韵側对"末引"今江东文人作詩，头尾多有不对，如：'俠客倦艰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关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花劍影，月出宝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孙宾。'"秘府論所謂江东文人，似亦不認为顏作，岂引書記忆之誤耶？㊁

似此書頗有来历。惠慕道士不可考，如为江东人，则与秘府論相合；古詩紀盖本之文苑英华，皆題为顏之推詩，与此完全不同，似此書編集在文苑英华之前。李商隐本来是取法齐梁的，樊南甲集自序云，"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間，"（引詳一章二节）集梁詞人丽句，并非不可能，所以不一定是伪書。

㊀ 在中央大学图書館当时未借得八朝全詩，此系托由李炳墉先生在迁江津白沙的国立編譯館查校。

㊁ 本篇各章作于一九三五年秋至一九三六年春，于时尚未購得吟窗杂录；吟窗杂录之購得在一九三七年夏；未及补入，遭"七七"事变，凡引及杂录各章节，皆南来后，友人儲皖峯先生鈔寄据补者也。本节所引儲先生云云，亦鈔寄时所附校語。謹此誌謝。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迁渝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書中首列献乐安公启云：

世宗頗好文詞，享国仅及二紀，文武之代，（原作伐，依儲皖峯先生校改）篇什成风。至于裨將清吟，群公讓胜；緇衣奋藻，时王嫉能；咸著在縹緗，（原作沖湘依儲，校改）动盈卷帙。洎隋取宝器，陈受降旗，逸調空在，全篇莫存。

大概用为代序，据知重在裨將緇衣之作，所以沒有一个有名的詞人，就是他所推崇的任、范、徐、庾，也未曾采录。除了前述蔡延休、褚珪、岑之元、王衡、王湜、惠慕道士以外，还有李孝胜詠安仁得菓四句，談士云詠安人得菓四句，僧正惠偘詠独杵擣衣八句，聞侯方儿来寇四句，蕭欣还宅作四句；陈初童謠五言四句，杂言四句。

三　張为詩人主客圖

在典型的詩句图未兴起以前，先有唐末張为作了一本詩人主客图，可以算是性質稍异的詩句图。四庫提要詩文評类文选句图下云："摘句为图，始于張为。"不过張为虽也摘句为图，但重要的用意是在講詩人的主客派别。自序云：

若主人門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

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况、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况元膺、徐凝、朱可名、陈标、童翰卿。

以孟云卿为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应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刘猛、李涉、胡幽正；（詩图作貞）升堂李观、賈馳、李宣古、曹鄴、刘駕、孟迟；及門陈潤、韋楚老。

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苏郁；入室刘畋、僧清塞、（即周賀）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无可、姚合；升堂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厉元、項斯、薛寿；及門僧良乂、潘誠、于武陵

詹雄、卫準、僧志定、喻鳧、朱庆餘。

以孟郊为淸奇僻苦主：上入室陈陶、周樸；及門刘得仁、李溟。

以鮑溶为博解宏拔主：上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馬退之、張为。

以武元衡为瓌奇美麗主：上入室刘禹錫；入室赵嘏、長孙佐輔、曹唐；升堂盧頻、陈羽、許渾、張蕭远；及門張陵、章孝标、雍陶、周祚、袁不約。（全唐文卷八一七，普通本詩人主客图不載）

就淵源而言，盖出于鍾嶸的以三品論詩的高下，以派別論詩的源流。淸李怀民有中晚唐詩人主客图，系仿此而作。

图中所举詩人，有的极不著名，如陈羽、張陵、雍陶……之类。这还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既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則上入室当然是元稹，今反以不知名之楊乘为上入室，而元稹只算做入室弟子；孟云卿可以为高古奥逸主，而韋应物反算是他的上入室，李賀杜牧反只算是他的入室弟子；不惟高下倒置，亦且时代倒置。但"宋人詩派之說，实本于此。"（函海本李調元序。按陈振孙直齋書录解題已云："近世詩派之說，殆本于此，"則李說源本于陈）就历史而言，也不无相当的价值。

每一位詩人之下，都摘列詩句，（今本有的詩闕）和詩句图相同，所以四庫提要認为是摘句为图之始。但詩句图只是摘句为图，此則有时列举全詩，如白居易下便列举了讀史詩第四首、秦中吟第二首、寓意詩第一首及第二首。所以姑不論他的用意在講明派別，只就图詩而言，也不是典型的詩句图。

四　李洞集賈島詩句圖

典型的詩句图，似以李洞的集賈島詩句图一卷为最早，新唐書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皆著录。惟唐志通志无"詩"字，总目宋志无"集"字。直齋書录解題及通考經籍

考俱载句图一卷，题唐李洞选，盖即此书。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云："(李)洞常集(賈)島警句五十联，及唐諸人警句五十联，为詩句图，自为之序。"似句图包括賈島及唐諸人警句，集賈島句图則只包括賈島警句，亦未可知。吟窗杂录卷三十五标为句图，中有賈島句对一种，共十三对：

送朱可文归越："吳山侵越众，隋柳入唐疏，"南台对月："僧归湖里寺，魚听水边經。"就可公宿："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聞。"寄董武："孤雁来半夜，积雪在諸峯。"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送天台僧："雁过孤峯晚，猿啼一夜霜。"寄正空二上人："老窥明鏡小，秋忆故山多。"哭孟郊："家近登山道，詩随过海舡。"晚晴見終南諸峯："半旬藏雨里，此日到窗中。"山中道士："养雛成大鶴，种子作高松。" 題李凝幽居："鳥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門。" 又詩："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頗疑采自集賈島詩句图，果尔，便是集賈島詩句图的殘存了。吟窗杂录賈島句对后为群公句对，但皆为徐凝詩，共五对，再后为梁周翰句对一对，黃夷簡句对一对，范杲(应依詩学指南作范栄)句对一对，郑文宝句对六对，恐非唐諸人警句的殘存，不一一迻录。

五 宋太宗眞宗御选句圖

直齋書录解題著御选句图一卷，通考經籍考亦有著录，惟"选"作"制"。解題云："太宗皇帝所选楊徽之詩十联，眞宗所选送刘综詩八篇。"案太宗皇帝所选楊徽之詩十联，今亦存于吟窗杂录卷三十五，言："太宗皇帝聞楊徽之詩名，尽索所著，得数百篇奏御，上和其所謝詩，选其中十联写故屏。"十联如左：

江行："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随苔岸洗衣僧。"寒食："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塞上："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長腥。"僧舍："偶

題岩石云生笔，閑繞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新露染楓叶，皓月借梨花。”哭江：“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嘉阳川：“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常圓。”元夜：“春归万年树，月滿九重城。”宿东林：“开尽菊花秋色老，落迟桐叶雨声寒。”

眞宗所选送刘琮詩八篇，我得之于釋文瑩玉壺野史卷一，言：“樞密直学士刘琮，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进呈眞宗，深究詩雅。时方竞务西崐体，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

晁迥云：‘宿騎都門曉，微凉苑树秋。’楊亿止选断句，‘关榆漸落边鸿过，誰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尘起夕阳。’李維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孙仅云：‘汾水冷光搖画戟，蒙山秋色鎖层楼。’錢惟演云：‘置酒軍中乐，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霜深思爱日，并門春暖詠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順风雕鶚远凌秋。’

上謂琮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写于佛宫道宇，纂集成篇日。太原事績，后不聞其作也。’琮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又見詩話总龟前集卷四一引古今詩話）

六 惠 崇 句 圖

直齋書录解題及通考經籍考皆載惠崇句图一卷，宋四庫闕書目載惠崇唐律詩句图一卷，盖卽一書。案所图皆惠崇自己的律詩，所以宋闕目的“唐”字应为衍文。此書久已亡佚，我得之于吳处厚青箱杂記卷九，言：

楊文公談苑称楚僧惠崇工詩，于近代釋子中为傑出。而欧阳公少师归田录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尝見惠崇自撰句图，凡一百联，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喜者。今并录之。

則所录犹是惠崇句图的全文。再考魏泰临汉隐居詩話云：“永叔

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时号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图刊石于長安，甚有可喜。"益知吳氏所录不誤。全图一百联，不能全举；举首四联于下：

> 訾楊云糾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阴井生秋草，明河轉曙迟。"送远上人西游云："地形吞蜀尽，江勢抱蛮迴。"江行晚泊云："嶺猨猱猨急，江寒白鳥稀。"……

七　已佚的詩句圖

現存的及可以在笔記中寻輯的詩句图，略尽如上；已佚而有書名可考見者，約列于下：

一、倪宥詩图一卷——見通志。按通志又載有倪宥文章龟鑑一卷，亦見新唐志、宋志及崇文总目。通志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詩。"既是集前人律詩，理应列总集类，而新唐志、宋志及崇文总目列之文史类，通志列之詩話类，知不是纂集全詩，而是选录秀句，疑即詩图的异名。宋闕目載有倪宥金体律詩例一卷，或者亦即此書。叶德輝考証云："按宋志作詩体"，然則宋志所載詩体也是此書了。

二、黄鑑楊氏笔苑句图一卷，□□□續句图一卷——見陈录、通考及通志。陈录及通考只題續一卷，无"句图"二字。通志作革鑑編，"革"盖"黄"之殘文。陈录云："黄鑑編，蓋楊亿大年之所尝举者，皆时賢佳句。續者不知何人，亦大年所書唐人句也。所录李义山、唐彥謙之句为多，崐体蓋出二家。"

三、强行父唐杜荀鶴警句图三卷——見宋志及宋闕目。

四、孔道輔孔中丞句图一卷——見陈录及通考。陈录云："中丞者或是孔道輔邪？"

五、蔡希遴古今名賢警句图一卷——見宋志。

六、僧定雅寡和图三卷——見宋志、宋闕目及通志。

七、僧惟凤风雅拾翠图一卷——見通志及宋闕目。宋闕目作二卷，又"拾"作"十"，疑誤。

八、林逋句图三卷——見宋志及陈录。陈录作林和靖摘句一卷，註云："林逋詩句。"按后村詩話說林逋自摘五言十三联、七言十七联，当即此書。

九、杂句图一卷——見陈录及通考。陈录云："不知何人所集。"

十、九僧选句图——見通志。

十一、詩林句範五卷——見通志及宋闕目。

十二、琉璃堂墨客图一卷——見陈录及通考，通考"客"作"家"。陈录云："不著名氏。"按詩句图，摘选詩句，書悬牆壁，就詩句言为詩句图，就書者言則为墨客图。陈录及通考旣以此書与詩格詩句图并列，知也是詩句图无疑。

此外宋志有許文貴（一作貢）詩鑑一卷，宋闕目有不著作者的騷雅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疑也是詩句图一类之書。

八 蔡傳句圖、續句圖及陈应行續句圖

吟窗杂录卷三十五及卷三十六前半为句图，卷三十六后半、卷三十七、四十二至四十四为續句图，可考知录自何書的有太宗御选句图及集賈島詩句图，已分别論述于四、五兩节，此外，卷三十六有孔中丞句图九联，疑录自孔道輔書，不过恐有节删。直齋書录解題于杂句图下注云："自魏文帝詩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見吟窗杂录"，則杂句图当然采入。同时琉璃堂墨客图、楊氏笔苑句图、林和靖摘句图、惠崇句图，亦皆疑采入。（詳三章九节）然惠崇只收有一联，（卷三十六）当然非惠崇句图之全，不知节删的是

蔡傳抑陈应行，因今本或已經过陈应行改編。又張为詩人主客图，亦疑采入，但只字不見，也不知是否由陈应行删去。

杂句图諸書早已亡佚，录入何卷，无法比勘，因亦无法使还原書，只有籠統的系于蔡傳名下。句图中除了太宗御选十联、集賈島詩句图十三联外，計有群公句对徐凝詩五联，梁周翰句对一联，黃夷簡句对一联，范杲（原作呆，依指南改）句对一联，郑文宝句对六联，（以上卷三十五）王禹偁句对一联，刘道师句对四联，李宗諤句对二联，李建中句对三联，路振句对二联，丁謂句对二联，呂夷簡句对二联，焦宗石句对二联，錢昭度句对三联，南郑殿丞句对二联，錢惟演句对二联，刘筠句对三联，惠崇句对一联，希書（原作画，依指南改）句对一联，宝通寺句对一联，簡長句对一联，智仁句对二联，休复句对一联，行肇句对二联。（以上卷三十六）續句图計有王維一联，司空曙二联，苏味道、李端、于良史（原作吏，依指南改）李約、張循、皎然、崔珏、楊衡各一联，宋之問句对二联，李嶠驪山高頂应制三联，韓翃丽句一联，刘禹錫丽句二联，刘長卿丽句五联，孔中丞句图九联，王隨（原作三隨，依指南改）十二联，李遘句图五联，柳开句图四联，陈元老句图四联，（以上卷三十六）梅堯臣句图二十七联，（以上卷三十七）王隨四十一联，梅堯臣二百三十联。（以上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顧龙振詩学指南收有陈应行續句图，除完全鈔录了吟窗杂录的句图和續句图外，还增加了欧阳修七联，王安石八联，苏軾十三联，黃庭堅八联，范成大十五联，陆游七十七联，楊万里一联，严羽四联。考宋史艺文志史鈔类有陈应行讀史明辨二十四卷，讀史明辨續集五卷，未注明时代。續句图既采及严羽，当然在严羽之后。由詩学指南的較吟窗杂录多欧阳修等百三十三联，知吟窗杂录虽經陈应行改編，但删削顚倒，容或有之，增益則

絕对沒有的。換言之，仍是蔡傳选輯的詩句图，不是陈应行选輯的詩句图，陈应行选輯的詩句图在詩学指南，是据蔡选增益欧阳修等百三十三联而成的。

九　高似孫选詩句圖

陈应行的續句图旣联帶的叙述于此，高似孙（淳熙进士）的选詩句图（四庫本題文选句图）也順便在这里叙述。首有壬午（一二二二）十一月二十一日高氏自序云：

> 杜公訓儿，熟精选理；儿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参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襲晋，齐沿宋，凡茲諸人，互相凭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为图詁，略表所以凭述者，法精且秘，悟其杜矣。姑畀儿，儿熟否？虽然，莫欺也，力諸！

所选都見于文選，也是在一首詩中选录相連的二句。如选顏延年詩"寢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蕪。"謝灵运詩"潛虯媚幽姿，飞鴻响远音。"惟有进于别家句图者，于所选詩句下每注列其他与此相类的詩句。如选陶潛詩"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注云："李顒离思篇'烈烈寒气严，寥寥天宇淸。'陆机詩'岁莫涼风发，昊天肃明明。'謝惠連詩'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惠崇詩句图皆惠崇自己的詩句，当然不必注列其他詩句，而集他人詩的詩句图又只存太宗眞宗御选句图一种，其他注列旁人詩句否不可知，因此高似孙的这种办法是自己新創的，抑繼承前人的，也未敢輕斷。四庫提要总集类存目一云："其句下附录之句，蓋即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录一兩首者，則莫喻其体例矣。"这或者是錯的。其句下附录之句，有的是前人作品，固可解为"即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有的是后人作品，如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华星出云間，"下附張載詩"朝霞迎白日，丹气臨湯谷，"决不

能說魏文帝的詩源出晋人張載。依我看，其目的在列相近的句子，以資参閱。这对于欣賞或取法，倒是很有益处。

十 詩句圖的評价

就諸家句图观之，知其目的在提示佳句，供人吟詠或效法。蔡寬夫詩話云："詩全篇佳者难得，唐人多摘句为图蓋以此。"刘攽中山詩話云："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詠风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見雄材远思之人也。"本来五代前后因注重詩的艺术技巧，所以才撰詩句图；加以当时的作品，又偏于"小巧美丽"，所以"皆指詠风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見雄材远思之人也。"但如选"雄材远思"的佳句为句图，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說創作是美好的制造者，批評是美好的寻求者。創作以美好为目的，而創作出来的作品未必完全美好，所以有待于批評家的揀擇去取，这样才可以使讀者不費力的得到美好的讀物，这样才可以使新进作家不費力的得到美好的典範。果尔，詩句图正是这种書籍，正有这种功能，虽选的都是單联只句，有点近于支离破碎，但也未可一笔抹煞了。

第五章　詩品及本事詩

一　司空圖的志業与詩筆

晚唐五代的詩說很发达，除"詩格""詩句图"外，还有講詩的品格的，如司空图的詩品；有講詩的本事的，如孟棨的本事詩及各家的續本事詩。就影响而論，当然首推詩品。

司空图（八三七——九〇八）字表圣，河內虞乡人。旧唐書入文苑傳，新唐書入卓行傳。新唐書云："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图弟有奴段章者，陷賊，执图手云：'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无牗死溝中。'图不肯。"又云："迁洛阳，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夷王室，召图入朝。图阳墮笏，趣意野耄。璨知无意于世，乃听还。图本居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不出。作亭观素室，悉图唐兴节士文人。名亭曰休休。"又云："哀帝弑，图不食而卒，年七十有二。"（参旧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本傳）就这几段的記載看来，他是一位忠心于封建皇帝、自命为"节士文人"的人，并不願意隐逸；隐逸是出于不得已。与惠生書云：

某聱于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蹟，慚企不暇，則又环顧尘蹇，自知不足为天下之聱也。噫！岂非才不足而自强耶？虽然，丈夫志业，引之犹恐自踊，誠不敢以此为憚。故文之外，往往探治乱之本，俟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万一之效。……当今之治，苟在

位者有間于愚，必先存質以究实，鎮浮而劝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不自奢以罪时焉。（文八〇七）

可是他的皇帝已被人民赶的随处逃避了，当然不可能再来欣賞他的"志业"。好在他有"先人田"在中条山王官谷，正可作避世的处所和資借，由是就隐逸起来，从事"詩笔"，"以自見平生之志"。中条王官谷序云：

知非子（即图）雅嗜奇，以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盖欲揣机穷变，角功利以古豪。及遭乱窜伏，又故无有优天下而訪于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捃拾詩笔，殘缺无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孙耳。（同上）

因此，尽管晚唐的作家与理論家，一般的都适于格律儷偶，綺縟淫靡，司空图却要"存質以究实，鎮浮而劝用。"前者反映了都市文人的沒落，后者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幻想。

二 詩境的建立

他的"存質以究实，鎮浮而劝用"，只是温和的陶冶，并不是急烈的改造。与惠生書說的明白：

唐虞之风，三代非不敝也，賴圣人先其极而变之不滯耳。秦汉而下，……文質莫辨，法制失中，侮儒必土，沈儒必削，則士大夫虽有自負雅道者，旣不足以振之，而又激时之怨耳。汉魏之际，其弊益极。懲馬融胡广之流，故李膺質而峻；誡何晏桓范之俗，則王衍簡而淸。矯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类聚相扇，終于浮党見嫉，而至家国皆瘁而不瘉也，悲夫！

这大概也是懲于急进派的失败，所以主張优游浸漬的存雅道，鎮浮华。假設表現于政治，当然不是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是无为自化的誘掖。由政治推移于詩，也当然不是急烈的刺譏时政的腐败，而是温和的轉移世人的习性。与王駕評詩書云："元白力勍

而气弱，乃都市中豪傑耳。"（文八〇七）虽然是就詩的风格而言，但对元白的急烈的"补察时政"的詩及詩論，大概也不甚贊同。所謂"矯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类聚相扇，終以浮觉見嫉"，虽不能确定所指，但元白諸人，未必不在其內。

一面以救世的志业移于詩，希望以詩轉移世人的习性；一面沒有改革斗爭的勇气，逃到中条山王官谷的休休亭，不得不以詩寄托自己的生命。兩者相反相成，殊途同归，結果都趋于建立詩境。所以与王駕評詩書力贊王駕五言詩的"長于思与境偕，乃詩家之所尙者。"王漁洋香祖笔記引詩品中的"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語，說是"形容詩境亦絕妙"，固然是斷章取义，但司空图的力謀建立詩境，則是千眞万确的事实。

三 二十四詩品

司空图把詩境說成改善人間世的理想国，与李生論詩書云："詩貫六义，則諷諭、抑揚、停蓄、淵雅、皆在其中矣，"（文八〇七）实則只是逃避人間世的极乐园。詩品提示的二十四种境界——雄渾、冲淡、纖穠、沈著、高古、典雅、洗鍊、勁健、綺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达、流动，也都充满了逃避意味：

一、雄渾——大用外腓，眞体內充，返虛入渾，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絕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長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二、冲淡——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飲之太和，独鶴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归。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三、纖穠——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見美人。

碧桃满树，风日水濱，柳阴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尽，与古为新。

四、沈著——綠杉野屋，落日气清，脫巾独步，时聞鳥声。鴻雁不來，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五、高古——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泛彼浩刼，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独，落落元宗。（元宗即玄宗）

六、典雅——玉壺买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書之岁华，其曰可讀。

七、洗煉——犹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爱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体素儲洁，乘月返眞。載瞻星气，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八、勁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峽千寻，走云連风。飲眞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終。

九、綺丽——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尽必枯，淡者屢深。露余山青，紅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罇酒满，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十、自然——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眞与不夺，强得易貧。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十一、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語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眞宰，与之沉浮。如淥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漚，淺深聚散，万取一收。

十二、豪放——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皇；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十三、精神——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靑春鸚鵡，楊柳池台。碧山人来，淸酒深杯，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誰与裁？

十四、縝密——是有眞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淸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犹春于綠，明月雪时。

十五、疏野——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十六、淸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十七、委曲——登彼太行，翠遶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风翶翔。道不自器，与之圓方。

十八、实境——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淸磵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十九、悲慨——大风捲水，林木为摧。意苦若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弥哀。蕭蕭落叶，漏雨蒼苔。

二十、形容——絕佇灵素，少迴淸眞。如覓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

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

二十一、超詣——匪神之灵，匪几之微，如將白云，淸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契，終与俗違。乱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声愈稀。

二十二、飄逸——落落欲往，矯矯不群，緱山之鶴，华頂之云。高人画中，令色絪縕。御风蓬叶，泛波无垠。如不可执，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二十三、曠达——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樽酒，日往烟蘿，花复茆簷，疏雨相过。倒酒旣尽，杖藜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二十四、流动——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岂可道，假体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載，是之謂乎！（津逮秘書本）

这是二十四种詩境，同时也就是詩的二十四种风格。以风格分品詩文，不始于司空图，刘勰已分詩文为典雅、远奥、精約、显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体。（詳三篇三章一节）但司空图所分与彼不同，用以显示的文字亦异，故不能断定直接的受彼影响；可以断定的，只是司空图以前有人分别詩文品格罢了。

四庫提要卷一九五詩文評类一云：司空图对于二十四詩品，“各以韵語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語，以为詩家之极則，其实非图意也。”这是很对的。后来許印林詩品跋謂“雄渾”“高古”等十二类为詩的品格，“实境”“精神”等十二类为詩的功用，（見詩法萃編卷六）也“非图意也”。至司空图的意思，不过是以比喻的品題方法，对二十四种独立的詩境，提示其意趣，形容其风格而已。苏軾書黃子思詩集敘謂司空

图“盖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識其妙。”（四部备要本东坡七集，后集卷九）司空图的詩是否具备这二十四种风格，虽难遽断，但这二十四种风格，总是司空图所体認的。

四 比喻的品題及其來源

四庫提要所謂“各以韵語十二句体貌之”，譯成現在的术語，就是用十二句比喻的韵語，提示二十四种詩品的意境与风趣。本来什么是“雄渾”，什么是“冲淡”，視之似易，說出实难，所以只好用比喻以体貌之。司空图是慣用这种方法的，詩品以外，如詩賦贊云：

> 知道非詩，詩未为奇，研昏練爽，戛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难狀，揮之八垠，卷之万象。河渾沇清，放恣縱横，濤怒霆蹴，掀鼇倒鯨。鑱空擢壁，琤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有嬉，补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絇。鼠革丁丁，抉之則穴；蟻聚汲汲，积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风雅，历詃（一作詆）自是，非吾心也。（文八〇八）

是以比喻的方法，提示詩賦的体性。如李翰林写眞贊云：

> 水渾而冰，其中莫瑩。气澄而幽，万象一鏡。躍然翔然，傲睨浮云。仰公之格，称公之文。

是以比喻的方法，提示詩人的风格。也許有人不滿意这种比喻的提示法。不錯，它沒有直凑單微的說明。但我們要知道，假設說明一种道理，則比喻固是討巧的遁辞；而指点一种境界，則非比喻不可。梁王曾謂惠施云：“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无譬也！”惠施云：“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則不可矣。”（引詳一篇三章八节）的确，提示各种境界是需要比喻的，尤其是文学上的境界，离了比喻便很难提示，怪不得司

空图以此为不二法門了。

但这种方法虽至司空图而其用大著，却不是司空图所創始，魏晋六朝已启其端緒。最早是用以品題人物。如山濤称贊嵇康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巖巖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篇)后来便用以品題文学。如湯惠休云："謝(灵运)詩如芙蓉出水，顏(延之)如錯采鏤金。"(引見鍾嶸詩品卷中)顏延之問鮑照，己詩与謝灵运詩孰优劣，鮑照云："謝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南史卷三十四顏延之傳)謝朓贊美王筠詩，引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續世說文学篇)此外，袁昂作古今書評，也采用比喻的品題。如謂："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虽皆充悅，而举体蹉跎，殊不可耐。"(太平御覽卷七四八；淳化閣帖卷五作評書，字句亦稍异)虽是書評，不是詩評，而这种品題的方法，据此更可知在六朝已甚风行了。

到唐代，这种品題的方法更盛行。如旧唐書文苑上楊炯傳，載張說云：

> 楊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万仞，濃云鬱兴，震雷俱发，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丽服靚粧，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騷，則罪人矣。……韓休之文，乃大羹旨酒，有典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丰肌膩理，虽穠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張九龄之文，如輕縑素練，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虽爛然可珍，而反有玷缺。

不过湯惠休与鮑照的品題謝顏是偶然的流露；張說的品題唐初詞人，也只是和徐堅的閑談，都沒有著为專文。著为專文的

要算中唐皇甫湜的諭业。题名"諭业"，文中又有"比文之流，其来尚矣"的話，无疑的是比諭的品題：

燕公之文，如榱木枅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文，如应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明神，享宗庙。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亙平野，如云如风，有貙有虎，闞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資以道义。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舉玉躞，雕龙彩凤，外虽丹青可掬，内亦体骨不饑。独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汉，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无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桥新構，鉄騎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权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气势雄敞，廊廡廪廐，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胜概，令人竦观。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广板作秋）注，千里一道，冲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阳之文，如燕市夜鴻，华亭曉鶴，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远。故友沈諫議之文，則如隼击鷹揚，灭沒空碧，崇蘭繁荣，曜英揚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奋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

（文六八七）

此文之作，当然受張說的影响，所以文中云："当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以下，試为子論之。"后来如杜牧讚美李賀的詩歌云："云烟綿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陣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园隊殿，梗莽邱隴，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虛荒誕幻也。"（文七五三，太常寺奉祀郎李賀歌詩集序）也是比諭的品題，或者又受了皇甫湜的影响。

張說皇甫湜的品題是以人为單位，而以比喻提示各个文人

的文品；司空图的品题则进而以詩为單位，而以比喻提示各种詩的境界。張說皇甫湜不过是偶然的借此評文，司空图則用此以全力說詩：因此这种方法的能在文学批評史上取得地位，仍是司空图的功績。

五　文字以外的風格

司空图对于二十四詩品，虽如四庫提要所言，“諸体毕备，不主一格”，但也寓藏着他的詩学見解。为了知道他的詩学見解，可先看他的詩品以外的詩学論文。与李生論詩書云：

> 文之难，而詩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于鹹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义，則諷諭、抑揚、停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于蹇澀，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文八〇七）

由此知他謂詩格之高者要有韵味。不过他所謂韵味，超于普通所謂韵味；是“韵外韵，味外味。”所以与李生論詩書又云：“足下之詩，时輩固有难色，儻复以全美为上，即有味外之旨矣。”与王駕評詩書也特别称贊王右丞韋苏州的詩，“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

韵味以外，还提倡景象，但也是“景外景，象外象”。与极浦書云：

>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談哉？（文八〇七）

无論"韵外韵、味外味,"或"景外景、象外象,"都是指文字声韵以外的风格。据此返讀詩品,如雄渾品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冲淡品所謂"遇之匪深,卽之已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典雅品所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含蓄品所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縝密品所謂"意象欲出,造化已奇。"……都有求之語言文字以外的意思,也就都是說的文字声韵以外的风格。

至这学說的来源,其远源可上溯于鍾嶸的提倡滋味(詳三篇九章四节)其近源則出于戴容州所謂"詩家之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四庫提要称"其持論非晚唐所及,"蓋指晚唐五代群趋于格律的講明,而司空图則講明詩的韵味。实則不惟此点不同,还有晚唐五代的一般詩論家,大都反道言情,司空图則謂"王右丞韋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豈妨于道学哉?"力主存雅道,去浮簡(詳二节),也不同。四庫館臣站在封建主义立場,就把不同說成不及。我們在这里,还应当指出他所謂"道学"是軟化了的道学,与古文家的簡易載道不可同日而語;他所謂"雅道"也是軟化了的雅道,与中唐詩人的質直复雅也不可同日而語。

六　文人之詩与詩人之文

旣謀建立詩境,又提倡文字以外的风格,尽管高标道学,显然仍是純粹的隐逸詩人的欣賞玩味的情趣。以同样情趣,特别欣賞詩人之文与文人之詩。題柳柳州集后序云:

> 金之精麤,考其声皆可辨也,豈淸于磬而渾于鐘哉?然則作者,为文为詩,才格亦可見,豈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为詩,詩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尙,所尙(全唐文所尙二字不重,兹据唐詩紀事校補)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功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愚尝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

驪羯气势，若掀雷抉电，奔騰于天地之間，物狀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为遒逸，非无意于深密，盖或未遑耳。今于华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抗精极思，則固非瑣琐者輕可拟議其优劣。又尝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厉，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笔也，豈相伤哉？噫！后之学者偏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文八〇七）

司空图欣賞柳宗元的文人之詩，柳宗元則謂詩文的源流，风格，皆"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詳四篇第七章八节）从創作而言，的确"罕有兼者"，所以柳宗元的話自然不錯。但文人如有余勇作詩，詩人如有余勇作文，不好者不必談，好者一定別有风味，所以司空图的話也不錯。从时代而言，中唐詩文分流发展，所以柳宗元謂詩文"乖离不合"；晚唐詩文又逐漸合流，所以司空图採合詩文。

七 孟棨本事詩

詩品一方面領导了后来的"文品""賦品""詞品"等等的著作，一方面又領导了后人的"意境""空灵"等等詩說，在晚唐五代的詩文評中，自然占重要地位。本事詩的价值，不及远甚，但自宋人以后的"詩話"，每偏于詩人及詩本事的探討，无疑的是受了本事詩的影响。"詩話"既蔚为大观，則数典及祖，本事詩的价值，也可以想見了。

本事詩的作者，新唐書艺文志題曰孟启，毛晋津逮秘書因之。四庫提要云："諸家称引并作棨，疑唐志誤也。"孟棨自序云：

詩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虽盈廚溢閣，其間触事兴詠，尤所鍾情。不有发揮，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詩。凡七題，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

憤、征异、征咎、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异傳怪录，疑非是实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

据知孟棨認为詩是緣情的，与晚唐五代的一般見解略相仿，所不同者，一般的所謂情率指男女之情，孟棨則謂"触事兴詠，尤所鍾情"，所以他特別重視詩本事，所以作本事詩。他說各类"咸为小序以引之"，今已亡佚，殊为遺憾。

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其来源則与笔記小說有关。唐代有大批的記录遺事的笔記小說，对詩人的遺事，自然也在記录之列。就中如范攄的云溪友議，王定保的唐摭言，其所記录，尤其是偏于文人詩人。由这种笔記的轉入純粹的記录詩人遺事，便是本事詩。我們知道了"詩話"出于本事詩，本事詩出于笔記小說，則"詩話"的偏于探求詩本事，毫不奇怪了。

八 續本事詩三种

本事詩不惟間接的影响了宋人詩話，且直接的領导了几种續本事詩。續本事詩究竟有多少，現已无从知道，我所知的有处常子，罗隐，聶奉先三种：

处常子的續本事詩，今已亡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总集类著录二卷，言："无为处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提七章，类而編之。'然皆唐人詩也。"知一依本事詩，也是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

罗隐的續本事詩，不見著录，也不見有人論列。惟詩話总龟前集卷二十一，僧齐己松詩条下注明出續本事詩，接着就是白傅柳詩二首条，注云："唐宋詩云，罗隐作續本事詩。"接着又列阴鏗

石詩，罗鄴水詩兩条，注并同前。知罗隐作有續本事詩，此四条便是殘存的材料。又卷六称罗鄴咏牡丹詩，續本事有全篇云云，又于詩后注明出續本事詩，或亦指罗隐此書。

陈振孙直齋書录解題文史类載聶奉先續广本事詩五卷，說"虽曰广孟启之旧，其实集詩話耳。"由此知前謂"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一点不錯，所以聶奉先集詩話的書，命名續广本事詩。五卷本的續广本事詩，不知何时亡佚，今所見到的說郛及唐宋叢書（出說郛）兩种本子，都只有十五条。罗隐的續本事詩，是否如处常子的續本事詩之一依孟棨旧列，分为七章，无从考索，聶奉先的續广本事詩，則当然与孟棨的体裁不同，所以陈振孙說："虽曰广孟启之旧，其实集詩話耳。"但既曰广孟棨之旧，則当然受孟棨的影响。至聶奉先的时代，今已无从查考，直齋書录解題未标朝代，或者是宋初人，亦未可知。

統一書号：10018 · 80
定价：0.85元